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 五 册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一九五五年一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目　　录

祝贺缅甸联邦国庆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日）

缅甸联邦总统巴宇博士阁下：

值此缅甸联邦国庆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缅甸人民和阁下致热烈的祝贺。并祝中缅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日　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一月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

一

少奇同志：

在第六页上加了一条[1]，请审阅，此外还有一些修改[2]。

毛　泽　东

一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必须指出，在强调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的时候，不要忘记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在民主人士中存在着的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错误倾向，必须加以分析，并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方式向他们指出，有些应当提出批评，或加以讨论，以达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改正错误的目的。认为

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可以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反对关门主义的“左”的偏向，又要反对同错误思想和平共居的右的偏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稿时加写的第七条，即本篇（二）。

〔2〕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稿除加写了第七条外，还将指示稿中的两处“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并在指示稿第三条谈到“政协各省、市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应开会一次，对于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民委员会的候选名单、政协地方委员会的各种名单等，应提到适当的会议上进行协商”之后，加写了“这种对重大问题的协商会议每年至少要有四次，即平均每季有一次；此外还应有一些对若干个别问题的协商会议”一段文字。

关于同意国家不为个人祝寿的建议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

退彭真。

同意这样处理。

毛　泽　东

一月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一九五五年一月三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信上。信中说：黄炎培副委员长曾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写信，提议国家不为个人祝寿。我觉得，借黄的提议，把国家做寿的例停止了为好，免得成了惯例，国家要一个接一个地为多人祝寿。如果中央决定接受黄的提议，废除已开之先例，我即把黄炎培的信在常委适当范围内传阅，并在和几个民主人士碰头时，用征求意见的方式作适当酝酿，非正式地和党外人士商得一致意见。

对中国作协关于公开印发胡风[1]给中央报告的部分内容的说明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

一

刘、周、邓[2]即阅，退陆定一[3]同志，照办。

毛　泽　东

一月十二日

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增改[4]。

根据手稿刊印。

二

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5]，经中共中央交本会主席团处理。本会主席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主要地是针对着一九五

三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⑹而作的反批判，因此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现在决定将胡风报告的上述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为便于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也重印附发。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

根据随《文艺报》一九五五年第一、二号合刊附发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⑴　胡风，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⑵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⑶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⑷　见本篇（二），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⑸　指胡风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⑹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写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载《文艺报》一九五三年第二号）和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写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载《文艺报》一九五三年第三号）。

关于不能由政府向党委下达内部命令的两个批语[1]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三日、十七日）

一

刘、周、邓、先念、陈毅、仲勋、尚昆[2]：

这是财政部党组写给国务院，请它“批转各省市党委”的一个报告。这种请政府命令党委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不止一个部如此，请作纠正。

毛　泽　东

一月十三日

二

刘、周、邓、先念、陈毅、习[3]、尚昆：

由国务院向各省市委下达命令的办法不妥，此类内部命令，似由国务院与党中央联名下达为宜。

毛　泽　东

一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毛泽东这两个批语，其一写在财政部党组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关于目前税务干部中贪污盗窃国家税款情况给国务院并报中央的报告上，报告末尾请求国务院将这个报告批转各省市党委；其二写在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关于全国财经会议拟讨论的主要议题和初步意见给各省市委、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并报中央的电报上。

⑵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⑶　习，指习仲勋。

在周扬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

刘、周、小平[2]阅，退周扬同志：

（一）这样的声明[3]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毛 泽 东

一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给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并转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昨晚胡风来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公开发表他一九五四年七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胡风，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⑶　指胡风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三日写的《我的声明》，主要内容是：一、一九五四年七月我向中央的报告中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本人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二、这个报告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的判断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觉有不切实际之处，因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对以上这些，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对中央关于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1]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可用。

毛　泽　东

一月廿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一九五五年一月下发的这一通知中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这些思想斗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向人民群众宣传唯物主义思想以提高他们的觉悟，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因此必须在大约五百万有阅读能力的党内干部和党外知识分子中认真地进行教育，具体地批判唯心主义思想，树立唯物主义思想，才能通过他们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为此，有必要采取演讲的方式，利用业余时间，向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讲解目前正在展开着的思想批判的重要意义，结合当地干部和

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具体办法是：一、在各大城市，由当地省市委负责，利用公共场所，指定一批有演讲能力的报告员，进行演讲，并组织全体干部和知识分子前去听讲。二、报告员除指定适当的党员担任外，也可请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担任。三、演讲的内容可以参照北京各报刊已发表的批判胡适、俞平伯、胡风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论文，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四、北京各报刊已发表的有关思想斗争的好文章，将在中央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上陆续介绍。五、好的演讲稿可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或寄交北京的报刊发表。六、此项演讲应在二月开始。七、应当把演讲的地点和时间逐渐固定下来，并增加新的内容，使之逐渐成为向知识分子和干部宣传唯物主义、时事问题和重要政策等的定期讲坛。

祝贺印度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印度共和国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阁下：

值此印度共和国国庆五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印度人民和阁下致热烈的祝贺。愿中印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日益巩固和发展，并祝印度共和国繁荣，印度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稿给陈云[1]的信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陈云同志：

看了一遍，作了些小的修改。有些打？号的地方还待商量。商业部分请你考虑是否改写一下。整个报告是很好的，看了觉得很高兴。

毛　泽　东

一月廿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代表中央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对梁漱溟[1]《告台湾同胞》一文的批语[2]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刘、周[3]阅，退陆定一同志。

陆拟各点均可不改，只在文尾倒数第三行第二删去“事不宜迟，……”几句。此文可以广播，并可在北京、香港两处报上发表。

毛　泽　东

一月廿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梁漱溟，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九日关于修改和发表梁漱溟《告台湾同胞》一文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陆定一在报告后附送了他对该文的几点修改意见。《告台湾同胞》后来发表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和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香港《文汇报》上。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接受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您所递交的芬兰共和国总统的国书，并感谢您所转达的芬兰共和国总统的友好愿望。

四年来，中芬两国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大家知道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交往几年来是以多种形式进行的，特别令人满意的是两国贸易关系和文化联系顺利发展的情况，两国贸易年年都有发展而且贸易协定都是圆满完成的。一九五二年中国杂技团的访问芬兰，一九五三年以吉科宁〔1〕夫人为首的芬兰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和一九五四年七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雷任民副部长应芬兰政府邀请访问芬兰都在两国人民中间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大大地增强了中芬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和平合作的信念；中芬两国的友好合作的关系充分证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现在我们两国已将双方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并互相派遣了大使，这标志着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的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中芬两国有着维护和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而两国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增进，也必将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和巩固。我们相信，中芬两国间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将不断加强和发展。大使先生，我对您所表示的两国代表人物多作直接接触的愿望，表示欢迎。

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芬兰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加强中、芬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定将获得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协助。

我预祝您在工作中获得成功，并祝芬兰共和国的繁荣、芬兰人民的幸福和芬兰共和国尤·库·巴锡基维总统的健康。

根据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吉科宁，一九五三年任芬兰共和国外交部长。

给杨树达[1]的信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遇夫先生：

惠书及大著数种收到，甚谢！尊恙向愈，极慰。待完全康复之后，欢迎先生来北京一游。

顺致敬意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一月廿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杨树达，字遇夫，早年在长沙任教时与毛泽东相识，后一直从事文字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当时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

给 章 士 钊[1] 的 信

（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日）

行严先生：

前后三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有关方面乞代致意。

毛　泽　东

一月卅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在金辒颖《自述》上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一月）

一

周总理阅，并请考虑是否须酌予处理。

毛　泽　东

根据手稿刊印。

二

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本篇是毛泽东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妹妹金辒颖的《自述》上的批语。其中：㈠写在毛泽东办公室工作人员关于《自述》的内容简介上；㈡写在《自述》的最后一页上。金辒颖在东北解放后曾在通化摆烟摊维持生活，一九四九年来北京，后参加街道工作。她写的《自述》由章士钊转送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一月章士钊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特献一满洲女子之自述册子，备公作太平广记观，为几余涤虑之助”，并请求对金辒颖“优予提振”。

关于改善法院审判作风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二月一日）

少奇同志：

此件[2]可以批发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及政府党组，并登党刊，借此引起法院——工作人员注意——改善审判作风。至于错判"放蛊"事件，不过是不良作风表现在若干案件上面而已，应使重点放在改善作风。

毛　泽　东

二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关于报送湖南省人民法院对绥宁县"放蛊"案件的检查给中央的报告上。

〔2〕　指湖南省人民法院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关于绥宁县"放蛊"案件的检查报告。报告中说，在湘西绥宁、靖县、会同等边远县份，自解放前就有"放蛊"的迷信传说，其中以绥宁最为严重。所谓"放蛊"，传说是把蜈蚣、乌烟虫、甲甲虫等有毒的昆虫烤焦碾成粉末，由"蛊婆"事先藏在指甲内，偷放在饮料和食物中，谁吃了就要中"蛊"。这个传说使绥宁一带群众深为恐惧，一些区乡干部也深信不疑。该县人民法院盲目受理了大量的所谓"放蛊"案件，在审理过程

中，又只重口供，不重证据，甚至采取逼供、诱供等错误的审讯方法，乱捕乱押，结果造成大量错判。不但对被告造成冤狱，而且由于对“放蛊”案件的判处，实际上在法律上承认了“放蛊”的存在，支持了迷信传说在群众中的传播。报告说，全省各级法院应对过去判处过的“放蛊”案件全部进行检查，凡属错判应即平反，并深刻检讨错误根源，认真订出改进审判工作的具体办法。报告还建议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请卫生部门配合宣传科学的医务知识，解除对“放蛊”迷信的疑惧，以遏止“放蛊”的继续流传。

关于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时我军不要向港口一带射击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日）

彭德怀[2]同志：

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毛　泽　东

二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一九五五年二月一日关于海岸炮兵使用的建议给中共中央军委的请示电报上。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对陆定一[1]关于处理保加利亚文版《毛泽东选集》稿费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

照办[2]。

毛　泽　东

二月三日

退回为好。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2]　陆定一一九五五年一月七日给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并报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外交部转来保加利亚共产党出版社付给毛泽东的保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稿费七百二十九万九千四百元支票一张，请示如何处理。过去匈牙利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也送过稿费，外交部征询我们意见，我们认为以转送匈牙利为宜。这次保方送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稿费，我们建议转送保共中央，并建议今后凡此类问题均将稿费转送各该国兄弟党。

给陈嘉庚[1]的信

（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

嘉庚先生：

一月十八日惠书及附件业已收到阅悉，甚为感谢！

敬颂大安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陈嘉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对周敦祥[1]来信的批语和复信

（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

一

将此信[2]转寄湖南省委统战部，看是否能在省参事室及文史〔馆〕给以位置。

毛　泽　东

二月三日

二

敦祥先生：

来信收到。尊况甚表同情。已请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酌量设法为助，未知能如愿否，你可就近接洽。如有急切困难，尚望见告。

顺祝进步

毛　泽　东

二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周敦祥，五四时期曾加入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一九五五年四月后被安排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⑵　指周敦祥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一九二一年她曾和张国基一起到南洋办教育，一九三五年回国。建国后因找不到正式工作，曾想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后因华北革命大学从第四期停办，学习未成，工作不得，经济困难，个人生活也无法维持，希望毛泽东能给她介绍一个工作。

对错发《华东军区首长电贺解放一江山部队》的新闻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二月六日）

彭[2]，并粟裕同志：

应召集有关人员（包括新华社）开一次会，具体规定实行军委一月十二日指示[3]的办法，并对华东军区有所批评与指示。

毛　泽　东

二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一九五五年二月一日给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并报军委、中央的检讨报告上。报告说，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华东军区首长电贺解放一江山部队》的新闻，是在主管首长不在的情况下，由秘书擅自答复同意发表的，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同时发布这个贺电也违反了中央军委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关于战报与军事新闻发布问题的指示，和周恩来总理关于此类贺电和嘉奖令对外发布宜用国防部名义、对内发布宜用军委名义的指示，造成了不良影响。今后当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

克服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⑵　彭，指彭德怀。

⑶　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关于战报与军事新闻发布问题的指示。

关于请邓小平[1]督促进行全党干部审查问题的批语[2]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

刘、周、陈、邓、彭真[3]同志阅。

此件值得看一下。全党干部审查问题，请小平同志督促进行。

毛　泽　东

二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谭政、傅钟、肖华、甘泗淇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关于军队审查干部工作的初步情况给毛泽东、彭德怀并中央、军委的报告上。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的命令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第六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

根据一九五五年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给毛森品[1]的信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

森品兄：

惠书收到。

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2]，以为尊恙医疗之助。为了实行你的节约主张，希望你不要来京。

顺祝进步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毛森品，毛泽东少年时期在湖南省湘乡县东山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　这里是以当时流通的人民币计算的，按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的新的人民币折算，合二百元（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给张之江[1]的信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一日）

之江委员：

惠书早已收到。本想约谈，因循未果。近日查询，知先生已返上海，只好待之将来了。

先生热忱爱国，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赐教。

顺致敬意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张之江，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关于公布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的命令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第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

根据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毛泽东等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
尼·亚·布尔加宁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值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五年来，中苏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合作有了广阔的发展，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了我们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以全面的、系统的和无微不至的援助。苏联政府先后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共达一百五十六项的巨大工业企业，派遣大批优秀专家帮助中国建设，几次给予中国优惠贷款，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和苏

联机关于一九四五年在中国东北境内由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的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将中苏合营企业的苏联股份出售给中国，并决定把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和该地区的设备交由中国完全支配，最近，又建议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这种友好的合作和真诚的援助，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并向全世界显示了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生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深切地感到这种兄弟友谊的无上珍贵，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伟大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苏两国友好同盟的巩固和发展，对保证我们两国的安全和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苏两国的和平政策，推动并促成了朝鲜的停战和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使国际紧张局势有了一定的缓和，鼓舞了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中国人民热烈地支持苏联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反对武装西德而进行的斗争。中苏两国愿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并积极支持日本人民走上独立发展和国际合作的道路。中苏两国的真诚合作不仅符合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亚洲、欧洲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它是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可靠保证。

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正在到处推行战争政策，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目前美国在台湾地区对中国的侵略行

为和战争挑衅，这是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它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正义谴责。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的斗争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中苏两国的友好同盟，在新的国际紧张局势下，在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事业中必将日益发挥它的重大作用。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一个伟大的和平条约，是中苏两国间伟大友谊的标志。五年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个条约在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方面的伟大作用，今后的生活和实践将更加显示出这个条约的巨大力量和无限光辉。

为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共同繁荣，为了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巩固，愿中苏两国间的伟大友谊日益发展。

中苏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四日）

我庆祝中苏两国的伟大的合作。

这种合作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合作，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的合作，是为了国际和平的合作。我相信，这种合作还会进一步加强。

在我们中苏两个伟大的国家的合作之下，我相信，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是要被粉碎的。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中苏两国的伟大合作下，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没有不能被粉碎的。它们一定要被彻底粉碎。只要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和全世界人民就一定要将它们从地球上消灭干净！

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身体健康干杯！

根据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给刘少奇等的信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日）

刘、周、陈、邓、彭真⑴同志：

五年计划纲要第二稿，我已看过一遍，有些意见，已告陈伯达⑵同志。请你们即于日内分别找伯达谈一次，将你们看过后的意见告诉他，或将你们修改的本子交给他，连同其他同志的意见，由他汇集起来，加以修改，加上地方计划一章，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印出第三稿。那时我们可以看第三遍，可于三月十日左右印第四稿，即可作为基本定论。

明后天我开始看高饶问题文件⑶，看完再集谈一下。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⑵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部

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3〕 指准备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等文件。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军队建军三十七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
尼·亚·布尔加宁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值此苏联军队建军三十七周年之际，请接受我们的热烈祝贺。

光荣的苏联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以无敌的威力摧毁了法西斯势力，保卫了欧洲和世界文明，对人类进步的事业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现在，正当帝国主义战争集团加紧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准备原子战争、进行战争挑衅、严重地威胁世界和平的时候，强大的和久经考验的苏联军队乃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根据中苏协定驻守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苏联军队，五

年来，在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的事业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对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了有力的支援。现在，当他们根据一九五四年十月中苏联合公报即将撤离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苏联政府和伟大的苏联人民及其军队，致衷心的感谢。

祝苏联军队在加强自己祖国的国防力量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事业中获得更光辉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邓小平[1]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2]

（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月）

一

刘、陈、彭真[3]、小平阅后，交恩来同志：

高、饶联盟文件已看了一遍，全文可用，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从第九页起括掉了两段[4]，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宜这样地在这里辩论，括掉后似乎要好一些，请你们斟酌。刘、陈、彭、邓各同志的修改意见，请于日内即交恩来，以便明日或后日谈一下。

毛　泽　东

二月廿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

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有些同志觉得高饶反党联盟是难以理解的现象，这是不了解党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的原故。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即送胡乔木[5]同志：

此件你阅后请送恩来同志阅，最好能于今天或明天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今晚或明晚即印发党代表会议参加者。

毛　泽　东

三月十二日

四

退邓小平同志：

在第二页，第十一页，第二十二页，第二十九页，第三十页上有点修改[6]。

毛　泽　东

三月廿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2]　本篇收入毛泽东对邓小平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

议上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的三个批语，其中：㈠写在中共中办办公厅机要室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印发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三次稿）上；㈢写在三月十日印发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第三次修正稿上；㈣写在三月十九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之一《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上；㈡是毛泽东在一月二十二日印发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三次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⑶　刘，指刘少奇。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⑷　毛泽东删掉的报告稿中的两段话，主要是批驳高岗捏造事实，制造谣言，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等问题的。

⑸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⑹　毛泽东对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九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之一《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所作的主要是文字上的修改，其中：在第二页上，毛泽东将原报告中“我们的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一句，改为“我们的党已经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在第十一页、第三十页上，将原报告两处说的“高岗、饶漱石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删去了其中的“个人主义”四个字。在第二十二页上，将原报告中“饶漱石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对山东省的工作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危害”一句，删去了其中的“特别”二字，并在旁边批道：“这里不要‘特别’二字，因为饶对上海的危害也许比山东还大些。”在第二十九页上，将原报告的第五项中“中央政治局认为”一句，改为“中央委员会认为”。

在达赖、班禅[1]为庆祝藏历木羊年新年举行的宴会上的祝酒词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毛主席也在宴会上致词。他说：当着藏族新年的时候，让我们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祝贺，向西藏全体在京人员祝贺，向西藏和其他地区的全体藏族人民祝贺！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最后，他说，让我们：

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健康，为西藏全体在京僧俗人员的健康，为我国民族的大团结而干杯！

根据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新闻稿刊印。

注　释

〔1〕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关于注意处理群众自愿入社问题给林铁[1]的信

（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

林铁同志：

此事[2]请你予以处理。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毛　泽　东

三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1]　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省长。

[2]　指毛泽东的卫士带回的一封群众来信中反映的河北省安平县一个村在实现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简单化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的问题。

给周敦祜[1]的信

（一九五五年三月六日）

敦祜同志：

　　二月廿八日的信收到。我对学生入学的事都不直接干与，因此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尚希鉴谅。是否可待今年暑期在北京报考，请你自己酌定。

　　顺祝健康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三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1]　周敦祜，早年在长沙读书时同毛泽东相识。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工作。

对卫立煌《告台湾袍泽朋友书》[1]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三日）

刘、朱、邓[2]（请小平办）：

此件以一字不改，照原文待卫到广州时即行发表为好。在广州发表时，即送香港登报，并登广州报纸。同时由新华社发来北京，播发北京及全国登报，并发口语广播，译成外文发表。此件完全可用，不须要修改。

毛　泽　东

三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卫立煌，原国民党军将领。解放战争后期，担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总司令，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被软禁于南京。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引退后卫去香港。一九五五年三月回国，并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全文载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和香港《文汇报》。

〔2〕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不要全国人大代表工作费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四日）

尚昆[2]同志：

此项工作费，我不需要使用，应交给中央。此次送来的以及以后的，均请你交给中央会计机关。

毛　泽　东

三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一九五五年三月七日关于津贴全国人大代表工作费给毛泽东的通知上。通知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费，从一九五四年九月份起算，至一九五五年三月份共七个月，计人民币三百五十元（每月五十元），特随函一并送上，请查收。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马祖等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军不要攻击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四日）

彭德怀⑴同志：

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确定，指示华东及福建。

毛　泽　东

三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给黄炎培[1]的信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四日）

任之先生：

三月十一日惠书[2]收读。民建开代表大会，很好，谨致祝贺。农村粮食问题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缓和下来，目前则仍有些紧张。

顺致敬意。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黄炎培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一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向毛泽东报告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将于四月一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情况，信后附有他对失业问题和农村粮食问题的意见。关于农村粮食问题，信中说：最近有人从家乡来，反映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农民特别苦，农民说：我们吃不饱，哪有力气去种田呢？而一些村干部工作作风不好，总疑心农民家有藏粮，致使民间有怨声。

对卫立煌来电[1]的批语和复电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七日）

一

尚昆[2]：

应发一电表示欢迎。由华南分局派适当干部好好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在广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处（或走上海天津）看看建设情况，应先电告各处好好引导招待，并表示热情欢迎态度。

毛　泽　东

三月十七日早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广州华南分局即送卫俊如先生：

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借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

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　泽　东

三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⑴　卫立煌，字俊如，原国民党军将领。解放战争后期，担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总司令，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被软禁于南京。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引退后卫去香港。一九五五年三月回国。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六日，卫立煌从广州致电毛泽东：“立煌昨日返回祖国，平安抵穗，谨电致敬，并问候刘委员长、周总理、朱副主席及中央各位先生。”

⑵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杨树达[1]来信的批语和复信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七日）

一

转科学院，请令有关单位予以注意。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遇夫先生：

二月十四日惠书[2]收读。序言已看过。并将大函转付科学院方面，请他们予以注意。此复。顺祝

健康！

毛　泽　东

三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杨树达，字遇夫，早年在长沙任教时与毛泽东相识，后一直从事文字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当时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

⑵ 指杨树达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四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要求毛泽东看一下他写的《耐林庼甲文说》自序，其中批评了中国科学院在审查该书稿中有官僚主义作风。

关于修改和印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一

尚昆[1]印若干份，在明天下午开会时，在会场上临时分发各代表，每人一份。校对清楚，勿使有错。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尚昆同志：

此件又有些修改，请重印，时间还来得及吧？

修改的地方是：第二页末行加了两个字；第六页第六行后加了一段；第七页第七行去掉两个字，第八行去掉六个字，加上一个字；第八页第五行加了四个字。请注意校对勿讹。

毛　泽　东

三月廿一日上午九时半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各位代表同志们：

我们这次全国代表会议有三个议事日程：第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第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第三，关于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就是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党的总路线以及党为着实现这个总路线而采取的各项重要的政策和办法，已经在事实上被证明是正确的。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我们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我们的许多办法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规定得很恰当，这应当

在实行中根据新的经验加以补充和修正。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应该根据实际经验，认真地讨论这个计划草案，使它的内容能够比较妥当，而成为切实可行的计划。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

我们经常说，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我感觉仍然需要重复地将这些话说一遍。鉴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事件，骄傲自满情绪在我们党内确实是存在着，在有些同志的身上这种情绪还是严重的，不克服这种情绪，就会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

同志们都知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

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为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个目的，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按照党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饶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目前的国际条件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内部是团结的；而帝国主义阵营则是虚弱的，在它们那里有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和危机。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应该了解：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如果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做了适当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的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

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

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所谓困难，无非是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界给予我们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历史，就会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在一九二一年刚刚建党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那样渺小，后来发展起来，居然把国内的强大敌人给打倒了。自然界这个敌人也是有办法制服它的。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

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印。
（有毛泽东修改件）

为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题词[1]

（一九五五年三月）

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

毛　泽　东

根据手稿刊印。载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文汇报》。已编入《毛泽东题词墨迹选》。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为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开幕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的题词。

对陈毅[1]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退陈毅同志：

你的发言稿，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可以和应该那样说，不算过火。在第廿一页上，我加了几个字[2]，我感觉，饶漱石[3]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4]小一些。

毛　泽　东

三月廿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2〕　陈毅发言稿第二十一页上讲到："反党分子高岗，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首脑人物，他的反党罪行比饶漱石更严重一些。"毛泽东把这句话改为："反党分子高岗，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首脑人物，他的反党罪行从某一点上看，或者可以说比饶漱石更严重一些。"

〔3〕　饶漱石，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五三年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被揭露。一

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

〔4〕　高岗，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九五三年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被揭露。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

关于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印发两篇文章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邓小平⑴同志：

两篇文章⑵送上，请即印发各代表。两篇印在一起，加上一个总题目叫《两篇可看的文章》。

毛　泽　东

三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⑵　指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载的胡琦、力峰写的《从红星工厂事件中看中共天津市地方国营工业局委员会的责任》一文和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择要刊载的苏联Φ·伊萨耶夫少将写的《实力政策的虚妄》一文。胡琦、力峰的文章介绍说，中共天津市地方国营工业局委员会，由于犯了只管业务不问政治的错误，致使所属的红星工厂厂长处处限制党支部的活动，把一批坏分子提拔为厂里的各级干部，打击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计划的完成。Φ·伊萨耶夫的文章节译自一九五五年

二月五日苏联《新时代》杂志，介绍了近年来美英等帝国主国家鼓吹所谓实力政策，即用假想中的美国军事优势来对全世界发号施令，事实证明这一所谓的实力政策是虚妄的。

对刘少奇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三月）

即退刘少奇同志：

题目可不要“提纲”二字。

毛　泽　东

根据手稿刊印。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的提纲[1]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就下面的问题讲几句话：

这次会议的评价；

五年计划；

高饶问题；

目前形势；

八次大会。

（一） 关于这次大会的评价：

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好，是从延安时期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我们互相了解更多，有了共同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更好地团结起来了。

这次会议证明：我们的水平是大进一步了，不但比十年前的七次大会时期大进了一步，而且比一九四九年的二中全会、一九五〇年的三中全会时期大进了一步。

我们是进入了这样的时期：

钻社会主义工业化，

钻社会主义改造，

钻近代化的国防，

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的时代了。

虽然钻的有深，有浅，也有些人并未钻进去，但大多数同志是在钻，看样子是有许多钻进去了，快要成为内行了，这是极大的好事。

反高、饶联盟的斗争，将促使我们党大进一步。

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和获得辨〈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

㈡ 关于五年计划：

⑴ 同志们认为大多数的发言很好，其中有一部分发言特别好，认为满意；但中央各部门发言中，有一部分内容较差，分析和批判均不够；另一部分发言对严重的浪费问题只揭露了现状，没有说明如何处理；对这后面两部分人的发言认为不能满意。

⑵ 地方要求中央解决的许多问题，由秘书处会同提议的同志研究处理办法，报中央处理。

⑶ 中各〈央〉各部门要求地方协助的事项，请地方同志注意解决。

㈢ 关于高饶反党联盟：

⑴ 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联盟，或者是两个独立国？

从财经会议高饶同时发动反对所谓刘少奇宗派的活动看来，

从组织会议饶漱石与张秀山配合反动〈党〉看来，

从饶漱石的话“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看来，

从高饶都利用安子文同志的那个名单看来，

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一事看来，

他们是有一个联盟，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

至于说，没有明文协定，说〈那〉是把阴谋分子的反党联盟，和公开的政治联盟，如像巴黎协定，东南亚协定等同起来。

须知高岗集团的张、张、赵、马、郭 ⑵ 等人之间，饶漱石和向明、杨帆之间，也没有明文协定。

⑵ 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和未受影响的同志各自应取的态度。

受影响的——有浅有深，少数尚未表示态度，但大多数已表示了态度，有表示得很好的，有表示得还好的，有表示得不充分的或有某些部分不妥当的，总之已有所表示，我们应一律表示欢迎，希望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少数问题不大，没有来得及发言的，可书面写出交中央。

未受影响的——不要骄傲，谨防害病。

⑶ 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即划清界线，立即挡回去，不能因为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不表示态度，不坚持原则。

⑷ 有些同志说，知道高饶一些坏事，但没有看出他们的阴谋，这是难怪的。中央到 1953 年才发现他〔们〕的阴谋，在此以前也是被骗的，瞎了眼睛，这种瞎眼睛的事还很不少。

从此得出一条经验：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⑸ 骄傲情绪很危险：

以为游水可以不害感冒了，称了几个月英雄，害了一次大感冒，可见英雄是称不得的。

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有作用，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没有你，地球还是照按〈样〉转，事业照样在进行，也许还要做得好些。

没有孔夫子，中国更进步了。

一种是老资格（像我这样的人），一种是新生力量，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当然是新生力量。

比较起来，如果说骄傲，倒是青年人值得骄傲一下。

据说，年纪越大，越有经骄〈验〉，因此中年以上的人应该谦虚些，让青年看到我们确有些经验的，否则就不像样子子。

⑹ 戒"左"，戒右：

有人说，"'左'比右好"；

其实又有人说，"右比'左'好"；

超过时代，冒进，乱斗，这是"左"，不好；

落在时代的后面，缺乏斗争性，也不好。

我们党内不但有喜“左”的，也有不少喜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

两条战线斗争。

⑷ 目前形势：

不论国际、国内、党内形势，都是光明面占优势，黑暗面占劣势。

为什么提出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重复发生？

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

⑸ 为胜利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

中央决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八〔次〕大会，有三个议事日程：

⑴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⑵ 修改党章；

⑶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明年七月以前完成代表的选举及文件的准备工作。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要求各方面的工作大进一步，已经揭露出来的各种缺点、错误，例如大屋顶，大浪费等等。

谢意

有人建议：一年或两年开一次这样的代表会议。可以交中央考虑，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迅速进步的好办法。

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可以相间着开。

请全党注意：为在一九五六年胜利地召开八次大会而

斗争，为胜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的记录整理稿，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2〕　张，指张秀山。张，指张明远。赵，指赵德尊。马，指马洪。郭，指郭峰。

为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一九五四年洪水题词

（一九五五年）

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毛　泽　东

根据手稿刊印。载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长江日报》。已编入《毛泽东题词墨迹选》。

关于同意王明[1]继续请假治病的批语[2]

（一九五五年三月、四月）

一

印发给各代表，并送一份给王明。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刘少奇同志阅后，交邓小平[3]同志印发各代表，并告王明可以继续请假治病。

毛　泽　东

四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王明，即陈绍禹，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

〔2〕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日，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吉林省委副书记富振声给毛泽东并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主席团写信说，这次会议在党的建设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陈绍禹身

为中央委员，应该参加这次会议，但陈绍禹不到会，对党的会议采取如此轻视的态度，说明他和党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毛泽东的第一个批语就写在这封信上。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王明给毛泽东并主席团写了复信，信中说，这次会议，因准假治病，未能得到很多的教益，感到莫大的损失，但自觉并未因病而和党疏远。今年一至二月又因肝胆、肠胃、心脏等处连续发病，至今未能起床，一直在等待手术。毛泽东的第二个批语就写在这封信上。

〔3〕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日）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伊斯特万·道比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代理主席安德拉希·赫格居斯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雅诺希·波尔多奇基同志：

值此匈牙利解放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十年来，匈牙利人民在自己的劳动人民党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胜利地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并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这种成就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鼓舞了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以极其欢欣的心情祝贺兄弟般的匈牙利人民的胜利。

谨祝匈牙利人民在自己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击破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新的战争计划和确保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刘少奇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关于通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情况和征求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给赫鲁晓夫[1]的信

（一九五五年四月五日、六日）

一

尚昆[2]同志：

五年计划，陈、邓两个报告，我的开幕词，少奇发言等五件[3]正译成俄文，准备十号送交尤金[4]转苏共中央，请其提意见。请你即于今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致苏共中央的信，于下午交我看。

毛　泽　东

四月五日一时

二

尚昆同志：

此件[5]请于本〔日〕下午三时以前打好送我签字。

毛　泽　东

四月五日早

三

尚昆同志：

打一份，于明日上午十二时送我。

毛　泽　东

四月五日

四

尚昆同志：

两件[6]都有文字的修改，请重打于本日下午交我为盼！

毛　泽　东

四月六日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五

苏共中央赫鲁晓夫同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召集了全国代表会议（不是代表大会），议程为下列三项：㈠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㈡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㈢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

关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公报和关于上述三个问题的决议，已在报上发表，想来你们或许已经看到了。现特送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和陈云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请求你们替我们加以审阅，提出修改的意见。你们的意见希望于六月一日以前通知我们，因为六月间我国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并要公开发表。自然，提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公布的计划，不应当和我们送给你们看的这个计划一模一样，有些机密的部分，我们是不准备公开的。亲爱的同志，要求你们看这样麻烦的文件，实在是过分的请求，但是你们的经验比我们多，为了少犯错误起见，还是请你们替我们看一下吧。

此外，在我们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还有邓小平同志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刘少奇同志关于目前国际形势问题的发言和我的开幕词，一并送给你们，作为参考，你们如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如有意见，也请向我们提出。这些都是不公开发表的，刘少奇同志的发言并且是机密的。

致以

同志的敬礼！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四月六日

六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三月二十五日来信收到。对于您的热情的邀请，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很愿意能到苏联和同志们聚谈和往各地参观。但因我近日身体有些不舒服，周恩来同志本月内又要出席亚非会议，因此不能成行，待以后再约时间吧。此复。

致以

同志的敬礼！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四月六日

根据修改件刊印。

注　释

⑴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⑵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⑶　五年计划，指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陈、邓两个报告，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开幕词，指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少奇发言，指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

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问题的发言。

⑷　尤金，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⑸　指经毛泽东修改后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六日对赫鲁晓夫邀请他访苏的复信，即本篇（六）。

⑹　即本篇（五）（六）。

关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命令

（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

由于希特勒德国发动破坏世界和平的法西斯侵略战争和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宣布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希特勒侵略者被消灭以后，一九四五年的波茨坦会议[1]决定了德国应当发展成为和平、民主、统一的国家和缔结对德和约的途径。

但是由于美、英、法三国一贯奉行分裂德国、使西德复活军国主义和加入侵略性的军事集团的政策，德国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对德和约仍然未能缔结。现在美、英、法三国积极图谋通过实施巴黎协定[2]进一步阻挠德国和平统一和缔结对德和约，使欧洲的和平和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全德人民以及苏联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争取德国和平统一、促进对德和约的缔结、保障欧洲集体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为了中国人民和全德人民的利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第九次会议的决议，宣布：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从此结束。两国之间的和平关系应当建立起来。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结束并不改变德国的国际义务。同时并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有关德国的国际协定而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

根据一九五五年四月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指苏、美、英三国首脑和外长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至八月二日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的会议，也叫柏林会议。会议根据苏联代表团的建议，讨论了设立外长会议，占领德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原则，德国赔偿，波兰西部疆界，控制黑海海峡，对意大利的政策，哥斯尼堡地区最后让予苏联，对罗、保、匈、芬的政策，战争罪犯，奥地利领土托管和参加联合国组织等问题，并签订了《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发表了《柏林会议公报》，这两个内容基本相同的文件，通称《波茨坦协定》。

〔2〕　指美、英、法等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同联邦德国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在法国巴黎签订的协定。主要内容是：重申《波恩条约》中有关美、英、法三国在联邦德国境内和西柏林驻军以及其他方面权利的规定；删去《布鲁塞尔条约》中有关防止德国侵略的词句，把该条约组织改为"西欧联盟"，并邀请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加入；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

接受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在过去的四年中，中巴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的友好合作关系获得了进展。我相信今后在贵大使努力下贵我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将在现有的基础上日益密切。这种友好关系的增进不仅将使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更加巩固，且将对于各国人民所努力争取的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我本人欢迎阁下出任巴基斯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在您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和维护国际和平的工作中，予以充分协助。

根据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

关于越南奠边府作战应注意事项给彭德怀、黄克诚[1]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彭德怀、黄克诚同志：

目前越南最大可能发生的危险，似乎不在奠边府以南，而在我军的后方交通线。如敌以两个伞兵营降落在我后方交通线上最扼要的地点，筑堡据守起来，整个交通将为之切断，如我军不能迅速歼灭此敌，旷日持久，奠边府我军即有被迫撤退之可能。军委去电已估计到敌有袭占交通线可能，但强调不够，并以之与琅勃拉邦方向并列。请你们再加考虑，叫越方迅调必要兵力位于适当地区，专门对付此种意外事变，以免奠边府作战功亏一篑。

毛　泽　东

四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黄克诚，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对国务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稿[1]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

刘[2]阅后发。加了一个尾巴[3]。

毛　泽　东

四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市委和省市人民政府，在接到本指示后的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内，将本指示的要点，结合当地情况，作出自己的指示和安排，一直传达到乡，并开始见之实行。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国务院、中共中央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关于加强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稿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近一时期粮食的销量大大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合理指标，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发展，这是极端反常和危险的，必须立即加以扭转。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入地发动群众，进行充分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使群众明了国家的政策和解决粮食问题的真正出路。指示稿还规定了解决粮食供应问题的具体方法。

⑵　刘，指刘少奇。

⑶　指毛泽东审阅国务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稿时，在末尾加写的一段话，即本篇（二）。

毛泽东等为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题词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捷克斯洛代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和文化在过去十年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的结果，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全体劳动人民为自己的幸福生活努力奋斗的结果。捷克斯洛伐克在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方面的迅速发展的事实大大地加强了我国人民对正在开始的工业化事业的信心，并且预示中捷两国贸易发展和科学技术合作的日见广阔的前景。祝捷克斯洛伐克日益繁荣强大，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间的友谊不断增进和巩固。

毛泽东　刘少奇　朱　德
陈　云　彭　真　林伯渠
董必武　康　生　张闻天
邓小平 (1)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根据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⑴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副部长。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给黄炎培[1]的信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任之先生：

四月二十五、六日惠书[2]收读，甚谢！

粮食问题，下一个月还会是紧的，六月以后将会好些了。

顺祝健康！

毛　泽　东

四月廿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黄炎培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和四月二十六日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四月二十五日的信汇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四月二十六日的信再次向毛泽东反映农村粮食问题，信中说：根据最近收到的各地人民来信，最严重的还是农村粮食问题，我曾选取可靠性较高的五封信送给陈云同志，并与其长谈达四小时。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此时正临“农忙”，人为的丰和歉将取决于这一关头，似须经过正确了解后及时处理。

给陈嘉庚[1]的信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嘉庚先生：

迭接惠书，论及粮食和飞机场二事[2]，均已转付有关机关研究去了。盛意甚感，谨此奉复。顺祝

兴居佳胜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陈嘉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指陈嘉庚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建议全国食用较粗糙的“九二”、“九五”米（即每百斤脱壳的糙米，再加工后得九十二斤或九十五斤米）以节约粮食，和建议福建省晋江青阳机场改建在青阳公路以南。

给周世钊[1]的信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惇元兄：

三月惠书收读，甚谢！学校部署很好。规程和经费均不要同他处立异，但在教学内容方面多做工作，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我情形如去年那样，游水颇有好处。顺颂

教安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周世钊，字惇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给蒋竹如[1]的信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竹如兄：

　　二月惠书收读，甚谢！兄作语文学研究，提出不同意见，我虽未能同意，但辩论总是会有益的。来书已付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去了。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此复。顺问

教安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1〕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给文炳璋[1]的信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炳璋同志：

二月十五日的信收到。你可去找毛泽荣（逊五）毛仙梅[2]二人，和他们一道来京一行，即持此信为证。其他各人均不要来。请你转告文梅清、文东仙[3]二同志，他们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他们不要来京。韶山方面有要来的，除泽荣、仙梅二人可以来之外，均不可来。问你母亲及各位朋友的好！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此信给毛泽荣、毛仙梅二人一阅。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文炳璋，毛泽东的表侄。

〔2〕　毛泽荣，又名逊五，毛泽东的堂弟。毛仙梅，毛泽东的堂弟。

〔3〕　文梅清、文东仙，毛泽东的表弟。

给张沛民[1]的信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沛民先生：

二月十五日的信收到。寄上二百元，聊助涓滴，不要还的。如有困难，尚可续告。

顺祝健康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张沛民，当时在长沙市当保姆。其丈夫刘政谋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已病故。

给谭世瑛[1]的信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世瑛兄：

去年夏历十二月廿八日来书收读。情况困难，甚表同情，寄上人民币三百元，聊为杯水之助。如有所需，尚望续告。年老出门，颇多不便，似以无动为宜。如体健兴高，亦可出门看看。此复。顺候

教祺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谭世瑛，毛泽东在湖南省湘乡县东山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给张四维[1]的信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四维兄：

三月二日的信收到。你说的事，我不能答复。生活困难，付上二百元，以为小助。

顺祝进步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张四维，毛泽东少年时的邻居。当时在中国盐业公司湖南省公司工作。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解放十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同志：

值此德国人民获得解放十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兄弟般的德国人民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德国人民在苏联军队粉碎希特勒法西斯统治后，在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下，进行了各种民主改革，建立了自己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五年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胜利地建设着新的生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德国人民争取统一、和平、民主和独立的坚强堡垒。

美英统治集团不顾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积极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加深德国的分裂，企图把西德变成新的战争策源地。最近巴黎协定〔1〕的批准，使新战争的危险大大增

加，欧洲和世界的和平遭受着严重的威胁。中国人民完全支持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欧洲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为保障自身安全和维护欧洲及世界和平所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并深信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强大团结一定能够彻底粉碎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德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一定能得到胜利。

谨祝德国人民在阻止巴黎协定实施的斗争中，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设事业中，获得新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刘少奇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指一九五四年十月美、英、法等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同联邦德国在法国巴黎签订的协定。参见本册第 88 页注〔2〕。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五月七日）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萨波托斯基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威·西罗基同志：

值此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获得解放十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特向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十年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和苏联的无私援助下，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基础方面已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是很大的鼓舞。

目前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正在力图实施巴黎协定[1]，积极复活德国军国主义，使欧洲以至全世界人民面临新战争的威胁。中国人民完全支持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欧洲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保障自身安全和欧洲和平所采

取的一切必要措施，并深信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在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下，一定能够粉碎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

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五月七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⑴　指一九五四年十月美、英、法等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同联邦德国在法国巴黎签订的协定。参见本册第 88 页注 ⑵。

关于肃反工作要提高警惕、防止偏差的方针[1]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二日）

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

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在这份手稿旁，毛泽东还批有："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二日最高国务会议通过。存"。毛泽东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讲了这两句话。

关于编辑、发表胡风问题[1]材料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月）

一

周扬[2]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3]，请你和陆定一[4]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

毛　泽　东

五月十一日

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

二

定一、周扬同志：

社论[5]尚未看。对“第三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

点，增加了几段。请你们两位，或再邀请别的几位同志，如陈伯达、胡乔木、邓拓、林默涵⑹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毛　泽　东

六月六日

请再打清样送我看一次。

清样打出来后（最好今天下午打出），除送你们认为要送的人以外，请送刘、周、小平、彭真、彭德怀、董老、张闻天、康生⑺各一份，（朱、林、陈云⑻同志不在家）并请他们提出意见。又及

三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社论和“材料”两件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请你们酌定。请照此再打清样送各政治局同志看。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也是逻辑问题）。废话应当尽量除去。

请定一务于今天下午四时前将胡风分子简历送交我为盼！

毛　泽　东

六月八日上午八时

此信和两件清样请给乔木同志一阅。

四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写了一个序言[9]，两条按语[10]，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请你们看后打清样交上次会议那些同志看过，加以修改，然后付印。

毛　泽　东

六月十二日二时

五

尚昆[11]同志转交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遍，如无错误，即可付印，并打纸版送各地照印。

此书出版的时候，可将《序言》一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目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12]，以期引起人们注意。其他的，不要登报。

毛　泽　东

六月十六日上午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参见本册第113页注〔1〕。

〔2〕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副主席。

⑶　指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发表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写的编者按。见本册第112—113页。

⑷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⑸　指《人民日报》社论稿《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后来发表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人民日报》。

⑹　陈伯达、胡乔木，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林默涵，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

⑺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老，即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⑻　朱，指朱德。林，可能指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⑼　指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的序言。见本册第168—170页。

⑽　指毛泽东为收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补写的两个按语。见本册第171—175页。

⑾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⑿　这篇序言后来发表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上。

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1]的一些材料》等写的编者按

（一九五五年五月）

胡风的这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

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根据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注　释

〔1〕　胡风，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编委。一九五四年七月，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系统地陈述他对文艺思想和文艺工作方面的意见。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

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中宣部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同年四月前后，胡风给舒芜的一批书信受到注意，被整理成一份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起，于五月十三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为此写了这篇编者按，将胡风及有关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同年五月二十四日、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一九五五年六月将陆续发表的三批材料编印成书，题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为该书写了序言。一九六五年，胡风被判处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一九六九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一九七八年底撤销对胡风的无期徒刑的判决，宣布释放。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宣布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通知说：“‘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从平反之日起恢复原工资待遇，本人历史上有其他问题的，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作结论，并由原单位妥善做好对他们的安置工作。凡经过法律程序判决的，建议由原经办的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一九八一年，胡风被补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

协会顾问。一九八五年五月，公安部对胡风政治历史中遗留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复查，予以平反撤销，并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向有关部门发了通报。一九八八年六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通报了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的有关胡风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的复查意见。关于“五把刀子”问题，补充通知说，“经复查，这个论断与胡风同志的原意有出入，应予撤销”。关于“宗派活动”问题，补充通知说，“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作出政治性的结论。这个问题应从《通知》中撤销”。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补充通知说，应“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这个问题也从《通知》中撤销”。

对中央关于人民代表到各地视察工作的通知稿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

尚昆[2]用电话（问）周、陈、彭真[3]有无意见，如无，立即发出。

退尚昆于十七日发出，并立即印发给来京的各省市代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毛泽东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为送审中央关于人民代表到各地视察工作的通知稿给毛泽东的信上。中央通知中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初召开。在开会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将分赴各地或就近在城市和乡村视察。这次视察的重点，在城市主要是粮食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浪费问题；在乡村主要是粮食统购统销、社会治安、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等问题。各地对于代表的视察，应该采取积极和欢迎的态度。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3〕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关于印发彭一湖[1]反映农村工作的信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

一

即送杨尚昆[2]同志：

请将彭一湖的信[3]立即印发给明天（十七）到颐年堂的会[4]的各同志。

毛　泽　东

五月十六日

各省市同志可能于十七日夜车或十八日早车回去。

小平[5]修改的中央的那个通知[6]（全国代表下去考察问题），亦请于明日印发给各同志。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彭真[7]发表给常务委员及常委一些工作人员及政协在京常委委员。[8]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彭一湖，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⑵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⑶　指彭一湖一九五五四月二十四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转给国务院的一封信。信中反映了他的家乡所在的湖南省东部地区农村中的一些情况：一、留粮点过低。一九五四年办统购的时候，由于给农民留下的粮食数量过少，使农民吃不饱，体力不足，生产情绪低，影响了生产，农民无力养猪，副业也受到打击。二、定产量的问题。一九五二年查田定产的时候，由于对平地水田的产量定得过高，加之一九五四年雨水过多，实际产量降低，使规定产量与实际产量之间出现空额。统购时由于对这一点估计不足，使农民留粮进一步减少。三、区乡干部作风问题。一些区乡干部遇事不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不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为了完成任务，往往用强迫命令的方式去执行，引起群众的反感。

⑷　指中共中央准备召开的十五个省、市委书记会议。

⑸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⑹　指中共中央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关于人民代表到各地视察工作的通知。参见本册第 116 页注　⑴。

⑺　彭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⑻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印发的黄炎培为报送彭一湖的来信给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的信上。黄炎培在信中还谈到了他对当时粮食问题的一些看法，说：“以我综合各方面报告，推想起来，到底有粮者叫是少数，无粮者叫是多数，而且前者是跟随着后者而发生的。要分别处理，但断不可不处理。”

给杨树达[1]的信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

遇夫先生：

违教多年，最近两接惠书，甚为感谢！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的。此复。

顺致

敬意！

毛　泽　东

五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杨树达，字遇夫，早年在长沙任教时与毛泽东相识，后一直从事文字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当时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

关于调查谭世瑛的历史情况给湘乡县委的信和给谭世瑛的复信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六月八日）

一

湘乡县委，并转第二区区委、石洞乡支部各同志：

石洞乡的谭世瑛，四十多年前，曾在湘乡东山学校和我有过同学关系。解放后来过几次信，我亦回过几封信，因他叫困难，最近又寄了一点钱给他。最近因患眼病，到汉口找谭政[1]同志求治，谭不在，到北京找我。现正进医院治眼，两三星期即回乡。我嘱他好好听区乡党政干部管教。据他说，他有两个儿子在三年前镇反斗争中被枪决，一个是营长，一个是排长，听说有血债被枪决的。他本人也被剥夺公民权，管制一年，现已解除管制但仍不能入农会。他的妻和他的其他两个儿子则有公民权并入了农会。他说，他的成分是贫农。他又说，他教了几十年书，只在二十七年前在国民党的邵阳县政府当过五个月的科员，并未作坏事云云。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盼。

祝你们工作顺利。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

二

世瑛兄：

六月四日的信及大作一首收到，甚谢！我赞成你于日内返乡。

中共湘乡县委有信（乡支部也有一信）给我，对于你家情况有所说明。据称：你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这是因为他们在几次宽释之后还要犯罪，而且犯了严重罪行的原故。因此，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是应该的。你则只有一些旧社会带来的缺点和在对待你两个儿子的态度上有些不当，故给以一年管制，现已解除。县委来信认为你无其他罪行。我认为县委对你的评语，是公道的。

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地把你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更好些了。

如你认为必要的话，此信可给县区乡负责同志一阅。

祝你平安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日

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有手稿）

注　释

⑴　谭政，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这时已调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对《人民日报》拟发的一组批判胡风的文章[1]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五年五月）

一

提高警惕，揭露胡风。[2]

二

按语不用，另换一个。[3]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不把他们的问题弄清楚，不把他们的破坏活动加以制止，而让他们继续不断地“联络人”、“争取人”、“从事开辟工作”、“大大地加强实力”，即是说让他们一天一天发展和扩大下去，他们就要用他们的

“集束手榴弹”给我们的革命事业以严重的损害。

根据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⑴　指《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晚十时报送毛泽东审阅的一组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的清样。这组文章的总标题原为《胡风的反党反人民集团必须彻底批判》。

⑵　这是毛泽东为这组文章重拟的总标题。这组文章后来发表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上。此后，《人民日报》又以这个标题开辟专栏，陆续发了几组批判胡风的文章。

⑶　这个批语写在邓拓送审的为发表这组文章而写的《人民日报》编者按上。后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另拟了一个。本篇（三）就是毛泽东对另拟的编者按中一句话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这个按语载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对黑龙江省人委关于森林火灾和扑火情况报告[1]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五月）

一

参谋部绘图送我看。

毛　泽　东

五月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送朱、周、邓、贺、子恢、彭真[2]阅，退叶子龙[3]。

黑龙江林火图。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关于森林火灾和扑火情况给国务院并抄致林业部、中共黑龙江省委的报告。报告说，一、鹤岗地区小兴安岭的山火，数日来经组织两万群众奋勇扑救，现已基本扑灭，开始撤人并进行彻底检查，以防复燃。二、

呼玛县境大兴安岭的火灾，共有三处：一是盘古河西、岭木尔站西南，该处有十一个火头，火势较大。二是在额木尔河东南，亦有十一个火头。三是在马纶东南，有大小两个火头。整个火场是在依陵古鲁河与盘古河之间，火场约长六十公里，宽十五公里。我们准备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扑救，除呼玛已有四百五十人在火场，三百三十人在途中，现正动员七百五十人赶赴现场外，准备再从嫩江动员一千二百人，黑河动员一千人赶赴火场。

⑵　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贺，指贺龙，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⑶　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对粟裕关于部署部队进驻福建新建机场的请示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九日）

退贺[2]、粟照办。

请注意研究周总理所提意见[3]。

毛　泽　东

五月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二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上。报告说，福建地区新建机场将于六月底竣工，为配合外交斗争，保护浙闽沿海航线的安全，防止和打击敌机对福建沿海主要城市的空袭，并为解放金门、马祖创造条件，当上述基地竣工后，我即应进驻部队。

[2]　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3]　周恩来在粟裕的报告上批有以下意见："各项均妥，只第四项执行时应注意时机和有利条件。""摧毁敌人雷达后，敌人仍可再设，因之必须在我较有把握条件下方可进行空炮联合作战，否则易遭过多损失。"粟裕报告的第四项，是关于马祖敌设雷达的处置方法。

祝贺胡志明[1]六十五岁寿辰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九日）

亲爱的胡志明同志：

当您六十五岁寿辰时，请接受中国人民和我个人的热烈祝贺。

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您的卓越领导下，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您数十年来所作出的光辉贡献，不仅受到越南人民、而且也受到中国人民的敬爱。

谨祝您在争取越南的和平、独立、统一、民主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光荣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九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人民共和国主席。

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1]的第二批材料》的编者按语稿中加写的两段话

（一九五五年五月）

一

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二

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

根据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注　释

⑴　参见本册第 113 页注 ⑴。

关于发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决议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此件[1]即送新华社立即发表，今天（廿六日）在北京及各地见报。

毛　泽　东

五月廿六日早一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联席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开除胡风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并撤销他担任的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职务等的决议，载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转发山西省委关于不许在干部调动时请吃饭、照相、送礼的通知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刘、邓[1]：

山西此项决定[2]很好，可转发全党。请为中央写一指示，放在前面。

毛　泽　东

五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2]　指中共山西省委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关于不许在干部调动时请吃饭、照相、送礼给所属并报中央的通知。通知说，至今有不少单位在干部调动时，沿袭腐朽的地主、资产阶级作风，请吃饭、照相、送礼，不仅浪费了国家财产，而且对干部的思想意识有严重的腐蚀作用，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因此，省委决定：今后无论任何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在干部调动时，均不许请吃饭、照相、送礼。

对中央关于征求党内外对继续镇压反革命和举行大赦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

即送刘、周、朱、彭真、小平[1]阅发。

毛　泽　东

五月廿六日

改了一点[2]。

根据手稿刊印。

二

鉴于应否大赦及如何大赦的问题，是一个关连到广大群众的政治行动，必须在党内党外更多地交换意见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因此，请各省市委对这个问题作一次专门的讨论，同时以政协为主体举行一次座谈会，然后将党内党外对这个问题（即应否大赦及如何大赦的问题）的意见，于六月

廿日以前报告中央，以便确定是否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大赦的议案。或者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不举行大赦，以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反革命气焰高涨，人民不高兴），过几年再谈这件事，这种意见，民主人士中也有不少人提出。〔3〕究以何者为宜，请你们征询电告。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见本篇（二），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3〕　经过向党内外征求意见，中央决定不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关于举行大赦的议案。过了四年，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特赦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对上述罪犯实行特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日发布特赦令。最高人民法院于同年十二月四日特赦释放了首批战犯三十三名。

转发潜山县模范乡整顿粮食统销的经验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少奇、小平⑴同志：

可用中央名义写一简短指示，转发安徽这个经验⑵，叫各地普遍仿办；并催督各地务必全党动员，在一切乡中普遍做好定销工作，压低总供应量，充分供应少数真缺粮户。

毛　泽　东

五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⑵　指中共安徽省委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向所属通报的潜山县模范乡整顿粮食统销的经验。主要是：一、依靠积极分子排队摸底，使干部心中有数。二、进行深入细致的教育，先开中心社的社员大会进行动员，讲清统购统销的好处，揭露坏分子的活动，表扬节约粮食的群众。然后分别召开小型漫谈会，算细账，找增产节约的办法，具体解决思想问题。三、中心社的问题解决后，召开全乡干部大会，介绍经验，推广到全乡。结果农民自动卖出节余粮食，使群众安了心，生产有了劲。

对黄炎培[1]来信的复信和批语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

任之先生：

五月二十五日惠书[2]收读。凡重要问题不厌求详地征求意见，总是有好处的。最近我又找了十五个省市的负责同志征询了关于粮食、镇反、合作社等项问题的意见，得了更多的材料，证实了我在最高国务会议所说的那些。但还要进一步研究，看到底是否如此。先生此次下去考查，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民建会议材料[3]我已看过，很有兴趣，拟发各党派参考。

顺致敬意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二

此件，各同志阅后请彭真[4]同志印发给人代常委、政

协常委各人作参考。

毛　泽　东

五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⑵　指黄炎培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中国民主建国会昨天召集京津两地常委、中委座谈会，传达了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关于加强镇压反革命和实行大赦问题的讲话精神。大家对毛主席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二十四字结语一致表示拥护。对于大赦，大都主张可在适当时期进行有教育性的有原则的赦免。对毛主席博采众议、高度民主的精神，一致表示感佩。

⑶　指黄炎培信后附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召集的京津两地常委、中委座谈会记录。

⑷　彭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中央关于调查粮食问题的各项情况的通知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一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

关于粮食问题的情况，请于接电后一个月内将下列各点调查清楚报告我们（计算的范围，除第六项问题外，其余五项都是除去盐民、林民、渔民、牧民、船民、灾民和经济作物的农民，即专算产粮农民，并以省为单位计算平均数）：㈠去年定产偏高的占百分之几，偏低的占百分之几，恰当的占百分之几；㈡缺粮户（以缺一个月粮为起点计算）占百分之几，自足户占百分之几，余粮户占百分之几；㈢缺粮户供应方面，该供应的真缺粮户占百分之几，不该供应而供应了的假缺粮户占百分之几（除去周转粮不计在内），本粮食年度内因对假缺粮户盲目供应而耗费的粮食共有若干；㈣以叫唤缺粮的人为一百，真缺粮而又供应不足或供应不及时因而引起叫唤的占百分之几，假叫唤的占百分之几；㈤销售补课工作，已经做好的占乡或户的百分之几，

尚未做好的乡或户占百分之几，何时可以做好？(六)各省市销粮肯定应当减少，下一粮食年度究竟可减销若干。以上六项问题，如因时间来不及，请根据若干可靠的典型材料加以估算，于七月五日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以前)先行报来。精确调查，留待下半年做。

中　央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二

刘、周、邓⑴阅发。发后抄邓子恢，廖鲁言，李先念，陈国栋，毛、刘、周、朱、陈、邓⑵。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⑵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李先念，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五办公室主任。陈国栋，当时任粮食部副部长。毛，指毛泽东。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

在印尼驻华大使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华举行的招待会上的祝酒词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我提议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间友好合作的日益发展，

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的健康，

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的访问中国和他及他的夫人的健康，

为今天宴会的主人莫诺努图大使的健康，

干杯！

根据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中宣部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1]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刘[2]阅后照发。

毛　泽　东

五月廿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一日在给中央的这一报告中说，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自去年十一月开始到现在，已展开为全国规模的运动。这是我党领导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思想斗争。经过这次批判运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毒害作用已初步揭露出来，开始引起人们对世界观问题的注意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在我国学术界发生了深刻影响，对于形成党的理论队伍，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部分旧学者也参加进来，受到了一定的教育。这次批判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从开始到现在，运动的发展一般是健康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第一、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影响还不够深广。第二、在各学术部门中发展还不平衡。第三、由于理论工作基础薄弱，虽

然发表的文章很多，水平也逐渐提高，但好的文章太少，有的文章论证不多，说理不够，结论武断。针对上述情况，应进行下列几项工作：一、扩大这次批判运动在广大知识分子中的影响，除继续发表文章外，应同时做好演讲工作。二、要注意针对旧学者在批判中暴露出来的错误观点，把胡适思想中欺骗性最大、迷惑人最深、影响最广的所谓治学方法等等，进一步组织文章深入地进行分析和批判。三、对批判已经充分展开的学术领域，应提出进一步深入的方向；对批判尚未充分展开的学术领域，则应提出重点，订出计划，坚决展开批判。四、要逐步扩大范围，对近几十年来其他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至今还有影响的，亦应进行批判。五、在报刊上发表论文，提倡在一篇文章内集中分析一个问题，而不是泛泛地概论一切问题；提倡进行正面的充分阐发，而不只是揭发和批判；提倡通俗、精炼、明白易懂；提倡科学性和准确性；提倡充分的说理和严格论证；提倡深入研究，力求理论上有所建树。六、经常性的讨论会要坚持下去，但不必太多，要有计划，有准备，题目集中，以求在讨论中真正提高水平，不应为讨论而讨论。七、从现在起即着手准备几篇较有份量的总结性的论文，作为这一阶段集中批判的结果。

〔2〕 刘，指刘少奇。

在姜黄族英来信[1]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五月）

似可酌予帮助，请统战部徐冰[2]同志处理。罗迈[3]知姜济寰为人。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姜黄族英，早年从事小学教育工作，是姜济寰的妻子。姜济寰在二十年代与毛泽东相识，曾参加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去日本，于一九三五年病故。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姜黄族英给毛泽东写信说，她年已六十，生活困难，请求帮她安排一个工作。后被安排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2〕　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3〕　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查处胡风分子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

陆定一〔1〕同志：

请考虑用中央名义将此件〔2〕通报各地党委及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要他们注意在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凡有胡风分子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几个可靠同志（例如五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专门注意处理此事。前谈指示〔3〕，可后发，先发此件。请于日内拟好，交我，为盼。

毛　泽　东

六月一日

此件用后退毛。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五人小组组长。

〔2〕　指中共北京市委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日关于查处胡风分子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市委根据中央对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召开了党员干部会，布置了这一工作，并成立了办公室专

门理处“胡风集团”问题。现已在高等院校和市属机关、人民团体中发现与胡风关系密切的有六人，并发现了若干可疑线索。对其中问题严重的人，已令其停职反省，其余的正在继续调查了解。

⑶ 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给各地党委的指示。

转发曾山[1]关于南昌市鸿泰百货专业代销店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六月二日）

少奇、小平[2]同志：

此件[3]很有用，请你们看看，可否用中央名义转各省市（委）及中商部、合作总社党组，叫他们通知各地试办。

毛　泽　东

六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曾山，当时任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指曾山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日关于南昌市鸿泰百货专业代销店情况给商业部党组并报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周恩来、各副总理、中央、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我们在南昌市了解市场情况时，看到南昌市鸿泰私营百货专业代销店的一些做法，对我们如何使私营商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为社会主义商业很有启发。该店解放时有资金三亿九千万元（旧币），职工四十人。解放后因经营不善，人员过多，营业额下降，亏累日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向市百货公司申

请代销，在严格的合同督促下，改善了经营管理，扩大了营业额，职工的主人翁觉悟进一步提高，商店的内部关系已起了变化，为将来向国营店过渡创造了条件，值得研究重视。一九五五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向上海局，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委并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商业部、合作总社党组转发了这个报告。

对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1]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2]

（一九五五年六月三日）

一

刘、周、邓小平、彭真[3]阅后即发。

毛　泽　东

六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

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参见本册第113页注〔1〕。

〔2〕　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央指示稿中加写的第六条。此外，在指示稿第一条中，讲到"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种机关中，和厂矿学校中，其所有人员，包括起义人员、留用人员在内，绝大多数是好人"中的"绝大多数"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百分之九十几"；在讲到"但同时，这些机关厂矿学校中，也都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在全体人员中是绝对少数"时，毛泽东在"绝对少数"后面加括号写了"占百分之几，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在指示稿第五条讲到各省市委应一律成立五人小组来领导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工作一段的后面，毛泽东加写了"党委书记和常委对此事应积极注意抓紧领导"。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给 陈 云[1] 的 信

（一九五五年六月五日）

陈云同志：

来信并附你父陈昌[2]烈士略传，均收到了。去年一信也收到了。略传已转付党史资料机关作参考。此复。

祝你学习进步！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六月五日

问你母亲好。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陈云，当时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当教员。

[2] 陈昌，新民学会会员，中共早期党员，大革命时期在湖南从事工人运动，曾任水口山工会主任。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继续坚持斗争。一九三〇年在去湘鄂西贺龙部工作途中被捕，遂被解往长沙杀害。

对中央关于建立省、市委书记处的决定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六月七日）

少奇同志：

此事似应由政治局通过，然后方好发出[2]，请酌定。

毛　泽　东

六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一九五五年六月四日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审阅的中央关于建立省、市委书记处的决定稿上。

[2]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中央于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正式发出关于建立省、市委书记处的决定。

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

（一九五五年六月九日）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六月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题词墨迹选》。

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1]的第三批材料》写的按语

（一九五五年六月）

一

从这一类信里可以看出，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仇恨一切人民革命力量。胡风分子张中晓说，他“几乎恨一切人”。许多人认为“胡风不过是一个文化人，胡风事件不过是文化界的事件，和其他各界没有关系”，看了这类材料，应当觉悟过来了吧！[2]

二

芦甸这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后来胡风果然实行了，这就是胡风到北京来请求派工作，请求讨论他的问题，三十万字的上书言事，最后是抓住《文艺报》问题放大炮。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

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打开一个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将他们战而胜之。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⑶

三

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⑷

四

胡风集团分子和其他许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大都采取方然在这封信里所讲的两面派策略，特别是他的二、三两条策略，很可以欺骗许多人。但他们总有漏洞可以给人们找到，胡风集团的被揭露，就是一个证据。特别是在大多数人

的觉悟程度和警惕性提高了以后，他们的两面派策略就更易被揭露了。⑸

五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们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一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些人口称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重视批判唯心论这一斗争，或者说自己没有唯心论，或者说自己和胡适无关系，因而最好避开不谈。但胡风集团却是重视的，他们在研究如何对付的方法。“这里存在着矛盾和困难”。批判唯心论果然给了胡风集团以“矛盾和困难”，这就可见批判的对了。革命队伍里的人，难道也有“矛盾和困难”吗？⑹

六

一大批胡风分子打入党内取得党员称号这一件事，应当引起一切党组织注意。绿原解放前曾经一度钻进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后因潜逃失去党籍。在一九五〇年，这个反革命分子又对我们的党组织“用最大诚恳写过三次报告，一次比一次详尽而老实”，除了文艺思想而外，“其余大体合格”，果然后来又被接受为“党员”了。这样的事，难道还不应当引起一切党组织的注意吗？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在用尽心思欺骗了我们之后爬进党内来的，他们把这当作“一场斗争”看

待，他们斗胜了我们，他们进来了！⑺

七

共产党员的自由主义倾向受到了批判，胡风分子就叫做“受了打击”。如果这人“斗志较差”，即并不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而愿意接受党的批判转到正确立场上来的话，对于胡风集团来说，那就无望了，他们就拉不走这个人。如果这人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斗志”不是“较差”而是“较好”的话，那末，这人就有被拉走的危险。胡风分子是要来“试”一下的，他们已经称这人为“同志”了。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当引为教训吗？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⑻

八

从这一类的信里，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不要让他们“滑过去了”。⑼

九

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很怕整风，可见整风是有益的。怕整风的人不都是反革命分子，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是思想上或政治上犯有某些错误的人，对他们的方针是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但反革命分子很怕整风，对他们的方针则是进一步挖出他们的反革命根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面目，是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几次整风，即过去的几次思想斗争中逐步地暴露出来的。由于那几次整风，才产生了胡风集团内部的分化，才迫使胡风集团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 三十万字的上书言事，才有最后的大揭露。[10]



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在强大的人民革命力量即人民民主专政面前，只要这个专政提高了群众的觉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那就不管有多少暗藏的反革命集团，也不管每个反革命集团的内部纪律如何森严，攻守同盟如何坚固，总有一些人可以分化出来的，而这种分化是于人民有利的。舒芜从胡风集团分化出来一事使得胡风集团大伤脑筋，就是一证。近日各地许多胡风分子们纷纷坦白，自动地或被迫地交出密件，揭露内情，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11]

十一

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里是有人偷窃机密的。这种人就是混入这些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内的反革命分子，有些自由主义分子则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该引起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的严重注意吗？[12]

十二

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一种策略。他们的本意是"几乎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由于这种情况，他们"就规定了战斗的坚苦性和长期性"。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他们在三十万字上书中只攻击林默涵、何其芳、周扬同志等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弄坏了一切事。有些在阶级本能上同情胡风的人，也照着这样替胡风瞎吹，说什么"这不过是周扬和胡风争领导权的个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在肃清胡风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这一点也是应当注意的。[13]

十三

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胡风集团在他们的三十万字上书和其他一切的公开言论中，好像他们主要只是反对共产党的作家而不反对其他的人。他们当然从来不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其他人物（只在有时小骂几句以作幌子，即所谓“小骂大帮忙”），但不反对其他人则是假的。原来他们对鲁迅、闻一多、郭沫若、茅盾、巴金、黄药眠、曹禺、老舍这许多革命者和民主人士都是一概加以轻蔑、谩骂和反对的。这种不要自己集团以外的一切人的作风，不正是蒋介石法西斯国民党的作风吗？〔14〕

十四

如同我们经常在估计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经常估计这种形势。但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亲眼看到了许多的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日本军国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蒋介石，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他

们犯了并且不可能不犯思想和行动的错误。现在的一切帝国主义也是一定要犯这种错误的。难道这不好笑吗？照胡风分子说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呜呼完蛋"的，这种力量不过是"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而胡风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虽然"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冲开"什么东西而要"茁壮地生长起来"。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我们看，胡风分子为什么狂妄得那么可笑呢？原来他们是按着他们阶级本能的曲调走路的。〔15〕

十五

这个胡风分子是比较悲观的。他说"也许"要"再过几十年"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即是说，要有几十年时间，蒋介石王朝才有复辟的希望。几十年之后，蒋介石王朝回来了，一切人民革命力量都被压倒了，那就是"人与人没有矛盾"了。"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了，这个"人"指的是一切反革命的人，包括胡风分子在内，但是一个也不包括革命的人。"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上

人指革命的人，下人指反革命的人。胡风分子写文章，即使是在写密信，也会有些文理不通的。这也是被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他们无法像我们替他们作注解的时候这样，把文理弄得很清楚。[16]

十六

这封信里所谓‘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乃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于我国人民革命力量镇压反革命力量的伟大斗争感觉恐怖的表现，这种感觉代表了一切反革命的阶级、集团和个人。他们感觉恐怖的事，正是革命的人民大众感觉高兴的事。“史无前例”也是对的。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只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被消灭的阶级无论如何是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而人民大众则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只有这时，才有这种必要，也才有这种可能。“斗争必然地深化了”，这也说得一点不错。只是‘封建潜力’几个字说错了，这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一语的反话，如同他们所说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

论'的反话一样。[17]

十七

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在这个对比上，我们的好些人，比起胡风集团里的人来，是大大不如的。我们的人必须学习，必须提高阶级警觉性，政治嗅觉必须放灵些。如果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18]

根据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刊印。其中：二、三、七、十四、十六、十七等六个按语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部按语均有毛泽东手稿。

注　释

〔1〕　参见本册第113页注〔1〕。

〔2〕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胡风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九月二十八日、十月一日给阿垅的信和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阿垅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3〕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

录的芦甸一九五二年五月七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⑷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绿原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八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⑸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方然一九五四年五月五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⑹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阿垅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⑺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绿原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三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⑻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欧阳庄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⑼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路翎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十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⑽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芦甸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八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⑾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芦甸一九五二年六月九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⑿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欧阳庄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⒀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芦甸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给绿原的信写的按语。

⒁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路翎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五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⒂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阿垅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七月三十一日给罗洛的信和芦甸一九五×年六月二十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16〕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牛汉一九五二年二月三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17〕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张中晓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18〕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张中晓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七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在《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稿中加写的文字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

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

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

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

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

根据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关于收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情况给胡乔木[1]的信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

乔木同志：

请你将你所收集的关于河北、山西两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包括下面大发展，省委核减等数字），写一简要材料给我为盼。

毛　泽　东

六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为编辑《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1]的材料》一书写的序言、按语和注文

（一九五五年六月）

序　　言

为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现在将《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十日期间所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和《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的社论编在一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这本书中，我们仍然印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为读者研究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一项资料，不过把它改为附件，印在舒芜那篇“材料”的后面。我们对三篇“材料”的按语和注文，作了少数文字上的修改。我们在第二篇“材料”中修改了一些注文，增加了一些注文[2]，又增加了两个按语[3]。第一、第二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此外，一切照旧。

估计到本书的出版，如同《人民日报》发表这些材料

一样，将为两方面的人们所注意。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将注意它。一方面，广大人民将更加注意。

反革命分子和有某些反革命情绪的人们，将从胡风分子的那些通信中得到共鸣。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赏,并从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但是不论怎么样，总是无救于他们的灭亡的。胡风分子的这些文件，如同他们的靠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一切反对中国人民的反革命文件一样，并不是成功的纪录，而只是失败的纪录，他们没有挽救他们自己集团的灭亡。

广大人民群众很需要这样一部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他们的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的党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

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还因为辨别和清理坏人这件事，是要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而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凡此种种，都是教训。

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向他们推荐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

《人民日报》编辑部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六月出版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刊印。原载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毛泽东手稿)

按　　语

一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舆论一律’对于他们的不方便。他们感到不方便，正是我们的目的，正是我们的方便。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

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这个问题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好像振振有词；有些糊涂的人们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论调之后，也好像觉得自己有些理亏了。你看，"舆论一律"，或者说，"没有舆论"，或者说，"压制自由"，岂不是很难听的吗？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则总是理亏的。胡风又说："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

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内实现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结。胡风所说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艰苦斗争之后，才使得这些坏蛋感觉这么难受。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们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胡风又说：“文艺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这里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最省力”是他的瞎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胡风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三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加以详细驳斥的必要。胡风在这封信里还说到：“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他是在一九五〇年说的。那时，在大陆上刚刚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还有许多化为土匪的反革命武装正待肃清，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没有开始，文化教育界也还没有进行整顿工作，胡风的话确实反映了那时的情况，不过他没有说完全。说完全应当是这样：目前到处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

绪，到处有反革命对于革命的各种捣乱性的进一步的要求。[4]

二

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据说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理论”“造成独立王国”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视”和“迫害”，因此，他们要报仇。《文艺报》问题，“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很需要由此“拖到全面”，“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的问题”，而且是“宗派和军阀统治”。问题这样严重，为了扫荡起见，他们就“抛出”了不少的东西。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

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哪个地方有他们的人，哪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加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⑸

以上两个按语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六月出版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刊印。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毛泽东手稿）

注　　文

一

〔健康的愿望普遍存在〕健康的愿望，指反革命的愿望。普遍存在，指反革命分子各处都有。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已解放的地方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但反革命分子已感到很不自由，故说像“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的存在着”。⑹

二

〔五年为期〕这时中国大陆已接近全部解放，故胡风认

为反革命虽然"会胜利",但须要五年时间。⑺

〔咳一声都有人来录音检查的〕只有像胡风这样做贼心虚的人,才会有这种神经衰弱的感觉。⑻

三

〔大概一两年之内要大爆发〕这年一月胡风给路翎信中说,胜利要有五年时间,这里又说,一两年内要大爆发,这表示胡风对时局估计没有定准;同时他很怕贾植芳因受他哥哥影响发生动摇,故意在这里对时局说得有希望些。⑼

四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尤其重要的是,他会不会弄节外生枝的手段"这一句。所谓"节外生枝",就是揭露胡风集团的内幕,这是胡风们很怕的,后来果然由舒芜开始揭露了这个内幕。⑽

五

〔血流得不少了〕这是一九五二年的信。这时,不但国内革命局势日益巩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局面也已确定,反革命已经失败,所以胡风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想要"学得战术一些","保存力量",以待时机。⑾

六

〔但近来他们心里渐渐着慌了〕这是胡风错误地估计中

国共产党的文艺领导方面的心理状态的话。⑿

以上注文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六月出版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注　释

⑴　参见本册第113页注⑴。

⑵　见本篇注文部分。

⑶　见本篇按语部分。

⑷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摘录的胡风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给张中晓的信增写的按语。

⑸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摘录的胡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给方然的信增写的按语。

⑹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摘录的胡风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给路翎的信中“健康的愿望普遍存在”一句增写的注文。

⑺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摘录的胡风一九五○年一月十二日给路翎的信中“五年为期”一句增写的注文。

⑻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摘录的胡风一九五○年一月十二日给路翎的信中“咳一声都有人来录音检查的”一句增写的注文。

⑼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摘录的胡风一九五○年五月二十日给贾植芳的信中“大概一两年之内要大爆发”一句增写的注文。

⑽　这是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摘

录的胡风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二日给绿原信后的注文中增写的一段文字。

〔11〕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摘录的胡风一九五二年五月九日给路翎的信中“血流得不少了”一句增写的注文。

〔12〕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摘录的胡风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三日给张中晓的信中“但近来他们心里渐渐着慌了”一句增写的注文。

对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指示稿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

定一[1]同志：

此件[2]已看过，我看可用。可提到此次会议[3]征求意见，后有无须要修改的地方。

毛　泽　东

六月十八日

文件内鲁迅的例子可以不举[4]。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五人小组组长。

〔2〕　指陆定一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六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稿。

〔3〕　指准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4〕　陆定一送审的中共中央指示稿中原有一段话，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特点就是表面上顺着我们，甚至称赞我们，阿谀我们，并说胡风就是用这样的办法骗取了鲁迅的信任。

关于政治局会议讨论山东问题给刘少奇的信

（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少奇同志：

今天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山东问题，请考虑邀安子文，钱瑛，刘景范[1]三同志到会，听陈毅[2]同志的报告（先将陈毅的书面报告及总结发言两件发给他们看），因这个问题曾和他们有密切关系，宜使他们与闻中央的决定。请予酌定。

毛　泽　东

六月廿三日三时

如少奇同志已睡则于上午送交尚昆[3]同志。

又 :舒同[4]同志如在北京似亦宜请他到会。

毛　泽　东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钱瑛，当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刘景范，当时任监察部副部长。

⑵　陈毅，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⑷ 舒同，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在黄文欢[1]为胡志明[2]访华举行的宴会上的祝酒词

（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我提议：

为了中越人民亲密的友谊，

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为了胡志明主席和他所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中国，

为了胡志明主席的健康，

为今天宴会的主人—— 黄文欢大使的健康干杯！

根据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⑴　黄文欢，当时任越南驻中国大使。

⑵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在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您递交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的国书，并感谢您的祝贺。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人民对于南斯拉夫人民在争取祖国独立和建设幸福生活中所作的努力，表示衷心的祝贺。最近，南斯拉夫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举行的会谈和它的结果，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贡献。

现在，中南两国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在发展相互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合作有着一致的愿望。我深信，我们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友好关系的加强，不仅符合于中南两国的利益，而且对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使先生，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发展中南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的协助和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中获得成功。

根据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转发山东省委关于抗旱夏种的紧急通知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日）

小平[1]同志：

此件[2]请转发河南、陕西两省委作参考。

毛　泽　东

七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山东省委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抗旱夏种给所属地、市委并报中央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目前全省灾情严重，已播的春苗缺苗枯萎，如再有半月持续不雨，将造成大旱。因此要求在一切旱灾地区，全力突击抗旱播种。地、县委负责同志要深入灾区，大力发动群众，坚定干部群众的抗旱信心。同时要积极准备播种晚秋作物，力争减少损失。省委决定增拨各地抗旱贷款一百万元，专款专用。责成各地供销社大力收购晚秋作物种子，以保证晚秋作物及时播种。

中央转发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七月四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

现将北京国家机关党委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关于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专题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你们那里如有相同的偏向，望注意纠正。

中　　央

一九五五年七月四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刘、邓[2]阅，尚昆[3]用电报发去。

毛　泽　东

七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这个报告指出，国家机关党委所属的五十三个单位，已有三十六个单位由领导同志向机关全体干部作了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动员报告，其余单位也正在积极准备。经过公开动员的单位，群众斗志高昂，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受到很大打击。但运动中还存在缺点，主要是各单位运动的发展极不平衡，运动的领导还赶不上斗争形势的发展。因此目前急需解决以下问题：一、坚决克服部分领导干部中仍然存在的右倾麻痹思想和对运动采取的淡漠态度，这是目前开展运动的主要障碍。二、坚决克服某些单位不积极发动群众、不敢大胆让群众在小组会中开展思想斗争的倾向。三、层层负责，自上而下建立指挥斗争的机构，各部及各局必须建立五人小组的组织，以他们为核心，使广大积极分子围绕在领导核心的周围。

⑵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提高对台湾驾机起义人员的奖励标准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七月七日）

刘、周、陈、朱、彭真、小平[2]阅，退彭[3]办。

似应提高一些。如二万，一万五千，一万，八千等。

毛　泽　东

七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一九五五年七月七日关于对台湾驾机起义人员的奖励标准问题给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报告上。报告说，根据总政治部的建议，军委对台湾投诚起义人员奖励的具体标准作了研究，认为对起义人员给予物质上的奖励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在政治上对他们是一种鼓励，另一方面能解决他们的某些实际困难，减少他们对起义的顾虑。鉴于过去的规定没有具体的奖励标准，现拟按起义者政治上的自觉程度和驾驶的不同机种，分别给予不同的奖金：一、驾驶喷气式战斗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一万五千元。二、驾驶螺旋桨战斗机和轰炸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六千元。三、驾驶运输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五千元。四、驾骑教练机起义者，每

人奖人民币三千元。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军委将上述四类标准提高后，于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以总政治部名义下发了关于对台湾空军起义人员奖励标准的规定。

⑵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朱，指朱德。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⑶ 彭，指彭德怀。

关于调查山西省和顺、昔阳两县农民缺粮情况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七月八日）

小平[1]同志：

此件第五页所载山西两个县缺粮情况[2]是否属实，请转山西省委派人前往调查，以其结果报告中央为盼。

毛　泽　东

七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人民日报》总编室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编印的《人民日报情况》登载的《读者反映山西和顺、昔阳两县农民缺粮情况严重》的材料说：据六月中旬收到的读者来信反映，山西省和顺、昔阳两县农民缺粮情况十分严重，不少农民放弃了生产，成群结队到外地投亲或行乞，有的地方已出现卖子女、离婚等现象。由于粮食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怨言很多，反动地主、富农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趁机活动，各种谣言不断出现。读者在来信中要求党和政府迅速派人下去查明情况，解决农民的缺粮问题。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四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理外交部长斯·拉布丹同志：

值此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四周年之际，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以兴奋的心情注视着蒙古人民共和国三十四年来在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建设事业中所获得的光辉成就。祝蒙古人民在久经考验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下，在胜利地实现第二个发展国民经济及文化的五年计划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刘少奇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央转发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日）

一

各省市委、各自治区党委：

现将北京国家机关党委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专题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参酌办理。各省市情况，望仿此方式择要上报。

中　　央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刘、邓〔2〕阅，尚昆〔3〕用电报发去，并印发在京各中委

和军委各部门。

毛　泽　东

七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的报告说，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国家机关党委召开了所属五十三个单位的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七月二日又召开了司局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经过这两次会议，国家机关所属单位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运动，有了较大的开展。目前已经展开思想斗争的小组，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有计划地对某些重点人展开思想斗争。二、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右倾思想、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斗争，主要是检查和批判右倾麻痹思想，然后逐步使斗争深入扩大。至于少数尚未开展思想斗争的单位，则督促他们迅速发动群众，把运动开展起来。

⑵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五人小组[1]办公室关于中央一级机关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情况简报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

一

各省市委，各自治区党委：

关于北京方面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经验，前已将国家机关党委的报告两件[2]发给你们。现又有中央五人小组办公室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简报[3]一件，特再发给你们。此件内容虽然和前两件有一些重复，但仍有参考的价值。盼望你们的报告。

中　　央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刘、邓[4]阅，尚昆[5]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在京各中委，

军委委员，军委系统各部门首长，中央各部委，中央政府各党组及若干重要干部各一份。

毛　泽　东

七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一九五五年五月成立的中央处理胡风反革命案五人小组，组长陆定一，副组长罗瑞卿。同年七月，中央五人小组扩大为中央十人小组。

〔2〕　指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关于开展肃清一切暗蒙反革命分子运动的专题报告和七月六日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专题报告。分别参见本册第187页注〔1〕和第194页注〔1〕。

〔3〕　中央五人小组办公室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简报的主要内容是：一、中直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分别对所属单位传达了中央关于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后，运动较以前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仍有少数单位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或发动得很差，在开展得较好的单位，运动发展也不平衡。二、目前中央一级机关团体在开展这一运动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有些单位领导上还存在着右倾麻痹思想，顾虑太多，不敢广泛深入群众。第二，不少单位对在小组中有领导有重点地开展揭露反革命活动的思想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经验。有的对中央指示体会不够，把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完全对立起来，不敢在小组会上开展揭露反革命活动的思想斗争，只是进行一般的反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批判，因而这些机关的运动缺乏生气，达不到教育群众、搞出一批反革命

分子的目的。中直机关党委和国家机关党委现正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4〕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5〕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给陈叔通、黄炎培[1]的信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

叔通
任之先生：

送上浙江农村材料[2]一件，暇时可一阅，阅后掷还为荷！

顺致

敬礼

毛　泽　东

七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陈叔通，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五五年六月三日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端正互利政策问题所属并报中央、上海局的指示。指示说，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整顿后，今后巩固的关键在于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执行合作社内互利原则的各项具体政策，克服目前合作社内各项违反互利原则和政策的偏向。为此，省委要求各地委、县委应

认真严肃地对贯彻党的农村阶级政策和本地区农业合作社执行互利政策的情况进行详细的检查和讨论，并将检查讨论的结果和贯彻互利政策的计划，写成书面报告上报省委。

关于军队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八月二十三日）

一

少奇同志：

请提中央会议通过。

毛　泽　东

七月十三日

二

陈云、小平[2]阅，退军委照办。

毛　泽　东

八月二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毛泽东关于军队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的两个批语，其一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二日关于建议成立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

给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请示报告上；其二写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为送审总政治部关于在军队中成立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的通知稿给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报告上。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对肖华[1]关于进一步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五日）

周、朱、陈、邓[2]阅。退肖华：

此件[3]似可发给各级党委，至师党委为止。

毛　泽　东

七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肖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2]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指肖华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四日在总直机关和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作的关于进一步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报告。报告分析了近一年半以来军队内部发现的反革命问题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情况，指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对军队的破坏是严重的。全军必须贯彻党中央关于利用胡风事件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大张旗鼓地进行一次广大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以

保证国防和人民政权的巩固，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成功，保证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给杜润生[1]的信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八日）

杜润生同志：

请将上次农村工作会议（四、五月间）[2]的各项材料，如报告、各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为盼。

毛　泽　东

七月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杜润生，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

[2]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五月六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肃反斗争的两个文件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九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国家机关各党组：

河北省委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四日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计划⑴和张承先同志在省直与地市委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所作的结论⑵，都很好，现发给你们参考。

中　　央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九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刘、邓、陆定一⑶阅，尚昆⑷办。

此件值得过细看一下。我们谈过的一些问题，这里都

解决得很好。

毛　泽　东

七月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中共河北省委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四日报送的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一、全省开展这一斗争的重点放在省直机关与省辖市，到九月底基本告一段落。二、要求各地委把重点放在地直机关，在八九月份开展这一斗争，地委要建立五人小组，加强对这一斗争的领导。各县委应在九月开始，在地委帮助下分批集中县、区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提高警惕教育，为审查干部、清理反革命分子工作做好准备。三、各高等学校的全体师生与中等专业学校的教职员与毕业生，应在暑假考试完毕后，留校进行七天至十天学习；党校及各部门干部学校，可选择一定时间在学生中组织报告、学习、讨论，作检举坦白的一般号召；中小学教职员、各医院的医护人员要普遍进行提高警惕的教育，做好政治摸底，为清理工作做好准备。四、开展这一斗争的方针政策与具体做法，要严格按中央指示执行。省委批准张承先在省直、地市委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的总结，随同这一计划发各地、市委、省直各部委、各党组执行。五、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目前中心工作之一，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这一斗争的领导。

⑵　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一日召开的全省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作的关于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麻痹思想、提高革命警惕、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结论，主要讲了六点：㈠对过去开展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的检查。㈡进一步认识开展这一斗争的

重大意义，批判右倾麻痹思想。㈢要放手发动群众并实行领导上的严格控制，以便顺利地健康地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㈣关于审查和处理。要认真掌握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的反革命分子这一界限，注意调查研究，根据情节区别对待。㈤具体的部署和要求。㈥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这一斗争的领导。

⑶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组长。

⑷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中央警卫团战士的几份农村情况调查上写的文字

（一九五五年七月）

一

河南省兰考县六区小胡庄乡的情况[1]（一九五五年五月）

胡全德（党员）调查。

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

交吴芝圃[2]同志一阅。退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

二

河南延津县第五区阎屯乡

王文礼（党员）调查的情况[3]。

送吴芝圃同志一阅。阅后退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

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

三

新蔡县第八区新化乡

李好学（团员）回家调查的情况[4]。

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老中农）有320斤余粮，只卖出70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20斤，人民有意见。

送交吴芝圃同志一阅[5]，阅后，退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

四

扣留了两户不愿卖余粮的。合作社很好。[6]

五

中农叫苦是假的。钦县大旱灾。[7]

六

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8]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指中央警卫团战士胡全德一九五五年五月关于河南省兰考县第六区小胡庄乡北孙庄村的调查报告。报告说，由于连年水灾，该村大多数群众，尤其是贫农没有余粮，缺粮户达到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困难户太多，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群众普遍反映村干部传达政策不及时，因此不满意。有的农户甚至拔麦子吃，影响了明年的粮食生产。

⑵ 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河南省省长。

⑶ 指中央警卫团战士王文礼关于河南省延津县第五区阎屯乡王连屯村的调查报告。报告说，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统购时，有些农民想不通，干部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统销时，有三分之二的农户要购粮证，实际上现在没有吃的是少数。该村去年冬天组织了一个生产合作社，贫农占三分之二，中农占三分之一。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过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由于不注意喂养，社里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社领导力量薄弱，缺乏经验，影响了生产。

⑷ 指中央警卫团战士李好学一九五五年五月关于河南省新蔡县第八区新化乡的调查报告。报告说，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有些人为买粮食把农具、日用品都卖光了，农民的思想波动很大。在统购时，由于去年收成不好和部分干部工作中的偏差，使许多农户把口粮都卖了，而有些区乡村干部的余粮则未卖，农民有意见。

⑸ 吴芝圃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负责人写信说："主席批交我阅的河南三个乡的调查材料，我已经

阅过，感到这些情况很值得注意。”“为了便于回去进一步作调查研究和改正工作中的错误，已把这三个材料抄写了。兹把原件送回，请查收。”

〔6〕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警卫团战士叶遥一九五五年六月关于广东省南雄县第三区新田乡溯水村的调查报告上。报告说，该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去年成立的。一年来，战胜了自然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被评为全县二等模范社。许多去年有顾虑的社员今年纷纷要求入社，最后全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和一家单干外，全都入了社。在粮食统购方面，该村采取自报卖余粮的办法，农民都踊跃卖粮，特别是合作社有组织地把全部余粮都卖出去了。但也有极少数农民不愿意卖余粮，该村在自报余粮时，有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拒卖余粮，被工作干部扣留起来，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7〕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警卫团战士凌理德一九五五年七月七日关于广西省防城县东兴区松柏乡松柏村的调查报告上。报告说，该村对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经了解，十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个有真正的苦。报告还谈到相邻的钦县遭受大旱灾，粮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有人因此中毒身亡。

〔8〕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警卫团战士高碧岑一九五五年六月关于湖南省宁乡县第六区南竹乡的调查报告上。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九日）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斯坦尼斯瓦夫·斯克热歇夫斯基同志：

值此波兰人民共和国十一周年国庆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祝贺。

十一年来，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苏联无私的援助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六年计划的顺利实现，波兰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繁荣和富强，大大地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中国人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中国人民祝兄弟的波兰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祝中波两国人民的友谊在为继续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九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情况通报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

一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上海市委七月十八日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通报[1]一件很好，现发给你们参考。你们的好经验，望择要报来。

中　　央

一九五五年七月廿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刘、邓[2]阅，尚昆[3]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各单位。

毛　泽　东

七月廿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中共上海市委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八日的通报说，市委专门委员会七月十五日召集第一（财贸）、第二（工业）专门小组、卢湾区委、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五个单位的负责人作了汇报。在开展反对右倾思想斗争以前，这几个单位的领导认识不足，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大胆开展思想斗争。现在各单位针对具体情况，由领导带头作报告，带头检查，批判当前存在的右倾思想，使运动出现了新的气象。他们的经验是：一、坚决地反复地开展反右倾思想的斗争，领导带头，层层贯彻，对落后的单位和干部给予严厉的批评。二、放手发动群众展开斗争，加强对骨干分子的培养和教育，使骨干分子懂得党的政策，明确斗争的目的和方向。同时要注意动摇敌人，分化敌人，进一步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⑵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陆定一[1]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

一

送交陆定一同志：

除小平[2]修改的以外，我又修改了一些（打红画的），请你加以酌定。

毛　泽　东

七月廿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要求资阶〈产〉阶级和宗教信徒积极赞助和不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很难的。[3]

三

这一点[4]可在另外的地方讲，暂 时 不 要 在这个会

上讲。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陆定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⑵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他对陆定一的发言稿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⑶　陆定一发言稿上原有以下一段话："凡是希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得到成功的人，不管自己是唯心主义者或是唯物主义者，都应该积极赞助和不要反对现在正在进行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毛泽东审阅时将这段话删去，并写了这个批语。

⑷　指陆定一发言稿中的以下一段话："我们也应该在广大的青年群众中、妇女群众中、学生中、工人中，积极宣传无神论，这就是通俗化的唯物主义思想。"毛泽东在审阅时删去了这段话，并写了这个批语。

中央转发北京军区等单位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简报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一

刘、周、邓、彭德怀、谭政[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

毛　泽　东

七月廿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北京军区、公安军、各特种兵等单位开展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情况》[3]一件，发给你们参考。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希望你们和当地军事机关联系和配合进行，并给他们以帮助。你们的五人小组开

会时应邀军事机关的适当代表参加。

中　　央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⑵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⑶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审干办公室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四日的情况简报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北京军区等单位先后开展了反胡风斗争的学习，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了检查，初步发现了一些问题和线索。但前一段的工作还不深入，一般是停留在学习文件阶段。原因是：一、领导右倾麻痹，对这一斗争的严重性和内部不纯的情况认识不够。二、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怕发生“左”的偏差。三、有些单位首长没有亲自动手。根据这些情况，总政于七月八日召开总直和驻京机关部队负责干部紧急会议，已开始扭转过去不起劲、停留在一般学习阶段的情况，并把反胡风斗争扩展为向一切反革命分子展开斗争。各单位对运动的安排大致可分为三个步骤：第一阶段，学习文件，做好思想准备及组织与材料准备；第二阶段，展开坦白检举运动；第三阶段，转入审干，做出结论与处理。

对广东省委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一

刘、周、邓、彭真、陈云、陆定一[1]阅，尚昆[2]用电报发，另印发北京各单位。

此件[3]很好。内有关于历史的估计。

毛　泽　东

七月廿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广东省委七月十七日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这个文件是正确的。各地可能有同样的问题发生，可以参考广东的经验。

中　　央

一九五五年七月廿一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组长。

⑵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⑶　指中共广东省委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七日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广东省省直机关及广州市各机关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已进入坦白检举阶段，暴露了许多问题。广东自解放以来，干部队伍是特别复杂的，而纯洁内部的工作又做得差，三反与土改整队虽然都是大的群众运动，但当时只解决了内部贪污腐化分子与土改立场不坚定分子的问题，后来清理中、内层也未形成一个大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领导上花的力量太少。最近的审干也未解决问题。因此在广东没有一个大的运动和斗争，内部不纯、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根本不能获得解决的。省委决心彻底搞好坦白检举，扩大战果，务求在这次运动结束时能基本上解决一些主要工作部门的问题。

对廖鲁言[1]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即送陈云[2]同志：

请你即看一下，有无与你所讲相矛盾的地方。阅后即退廖鲁言同志。我觉得此件[3]很好。

毛 泽 东

七月廿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指廖鲁言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送审的准备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一）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的粮食、棉花、油料以及牲畜、水产等各项增产指标是比较可靠的，是可以完成并可以超过的，应该保证完成，力争超过。今年是完成这个计划的关键一年。（二）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所规定的工农业投资比例是适当的，是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也是符合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的具体条件的。由

于我国还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还不能广泛实行农业机械化，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也还不能全面展开，发展农业生产的途径，主要还是依靠互助合作，合理使用劳力，充分利用土地，改进耕作技术，发挥集体生产的优越性。改变我国农业落后的根本道路，是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行对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采取削减工业投资的办法来增加农业投资。㈢对几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应有恰当的估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绩是很大的。到今年春耕前，全国已发展到六十七万个合作社，互助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已成为农村中的主要潮流。对发展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也不隐讳，通过纠正错误，改正缺点，使农业合作化运动更健康地更有信心地胜利前进。今后两三年内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关键时期，必须在此期间内，为合作化运动打下坚实的基础。㈣关于农民生活问题。由于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紧接着就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发展了农业生产，农民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今后的任务是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资本主义的剥削。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引导农民到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为了更好的幸福的未来，农民必须和全国人民一起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

转发陕西省委关于批准逮捕人犯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罗瑞卿[1]同志：

此件[2]所说问题带一般性，请加注意。此件请你们商量一下，可否用中央名义转发各省市党委注意仿办。

毛　泽　东

七月廿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罗瑞卿，当时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副组长。

[2] 指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关于批准逮捕人犯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给所属并报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从最近反映的批捕人犯工作情况看，各地在原计划第一批逮捕的人数中，不少拟捕对象的罪证是失实的。其中有些是根本不该捕的；有些虽有一些过失，但也不属于捕办对象；有些是可疑分子，但在关键问题上缺乏材料和证据，尚需查对。存在这些问题是由于过去工作中存在轻敌麻痹思想和工作不深入，对可否逮捕的政策界限不

清，因而在将要进入大批逮捕时，唯恐难以按原计划完成，产生了急于凑数的思想。根据这种情况，各级党委必须注意：一、严格掌握中央公安会议规定的应捕和不应捕的政策界限，切实纠正为了完成任务马虎凑数和对该捕的犹豫动摇的错误偏向。二、各地已组织起来的联合办公机构，应切实加强工作，特别是加强审查批捕人犯名单的工作。三、大捕以前除了加强审查工作外，还需做好一系列组织工作。四、鉴于各地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部分地区逮捕工作的时间应有所推迟。一九五五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党委转发了这个报告。

中央转发黑龙江省委、省人委关于粮食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粮食问题极为重要，各地必须抓紧处理。现将黑龙江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

中　　央

一九五五年七月廿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五日关于全省粮食会议情况给中央、国务院的报告。报告说，黑龙江省于七月六日至十日召开了粮食会议，传达了全国粮食会议精神，与会同志一致拥护中央提出的“坚决压缩销量，适当减低购量”的方针，表示一定要从全局出发，积极想法克服困难，挖掘潜力，坚决把粮食销量压缩下来。具体办法是，动员城市浮闲人口、剩余牲畜下乡生产；查清供应人口，消灭重复供粮；划清农业户与半农业户；调低口粮和城镇饲料标准，并供应一部分土豆代替粮食，适当控制熟食业用粮；深入贯彻节约，严格控制机关、企业等集体伙食单位用粮等。会议对全面实行“以人定量”的供应制度进行了充分

的讨论，一致认为这是压缩销量的重要措施，也是粮食工作的基本建设。为了加强对粮食工作的领导，在省委统一领导下，组成领导小组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并抽调有关部门人员设立办公室，联系各地，综合情况，督促检查，交流经验，解答问题。会议强调了任务要服从政策的原则，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在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觉悟的基础上，正确贯彻政策，防止急躁简单、强迫命令等偏向。

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上写的文字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

小平[1]同志：

此件[2]请即印发各省市委书（记）及应到会的人（政治局委员加若干在京干部），原件用后退我为盼。

毛　泽　东

七月廿九日

我在此件表上的侧面及背面所写的字[3]不要印。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改善耕作法：（1）深耕；（2）密植；（3）复种；（4）高产作物；（5）早熟作物；（6）选种；（7）除虫等。

改善劳动组织：推行包工制。

增加生产：必须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

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

要反对右的和“左”的错误观点：⑴ 在发展问题上，“不进”与“冒进”。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十五年）造成这种优势。⑵ 在改变所有制的问题上，即端正政策的问题。“揩油”问题已经发生，应当教育农民不要“揩油”，应当端正各各项政策，并以发放贷款的办法去支持贫农，这是一方面。但同时应当教育中农顾大局，只要能增产，只要产量收入比过去多，小小的入社时的不公道，也就算了。要教育两方面的人顾大局，而不是所谓“全妥协”，全妥协就没有社会主义了。又团结、又斗争是我们的方针。⑶ 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

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粮食问题：是否能实行三定，是否定到户，秋收以前是否能完成三定？

浙江有一个材料⑷是否适当？我觉是好的。

今年一定要比过去两年大进一步。

两次检查，今年十月和明年五月，全国人民代表，各省市人民代表都下去检查。主要检查：⑴粮三定；⑵合作社是否增产；⑶各城市的浪费问题。

增加生产资料，改善经营管理（端正政策、改善耕作法、推行包工制）和增加生产。

是否有把握（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即是否冒进？

去年是否冒进了10万个社？

今后一年又由65万个社，增至103万个社，即增加了近40万个社；户数由1690万户，增至2920万户，即增1230万户，是否可以？

关键是在今后三年，重点在今明两年。

必须认真整社、建社；整社不是一年整一次，而是一年整几次。

训练干部和派遣干部，当地为主，外来为辅。

整社建社，必须从整党建党入手。

增加生产资料：⑴土地（深耕、开小荒、去阡陌等）；⑵

牲口；⑶ 农具；⑷ 肥料；⑸ 水利。

改善经营管理，端正政策：⑴ 牲口入社问题；⑵ 大农具入社问题；⑶ 土劳分配比例问题；⑷ 投资问题；⑸ 附（副）业和社员自由使用一部分劳动力问题；⑹ 地富入社问题；⑺ 社员中贫农比例问题（应为贫农、新中农的下中农和中中农、老中农的下中农这几部分人中的积极分子；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不收这几部分人中的消极分子；更不要收富裕中农——不管是老中农中间的富裕中农，还是新中农中间的富裕中农；坚决不收地富）。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⑵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向毛泽东等报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主要内容是：一、今年春耕时全国有六十七万多个农业合作社，经过近几个月的整顿，有增有减，现有约六十五万个。二、各地对巩固与发展合作社的工作均作了部署，采取的主要措施是：集中力量巩固现有社，主要抓端正政策，做好社的生产工作，合理组织劳力，推行包工制；做好互助组工作，为建社建立基础；训练办社干部及准备建社的互助组骨干；抽调干部下乡帮助社的工作。各省的发展计划大体确立后，逐级向下分配任务，并由县区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修正意见，然后定案。三、一九五五到一九五六年度的发展计划是，由现有的约六十五万个社发展到一百零三万余个，入社户数由一千六百九十余万户发展到约二千九百二十万户。这个材料还附有一份《全国各省现有

社及一九五六年建社计划表》。

⑶　指毛泽东在《全国各省现有社及一九五六年建社计划表》的各栏侧旁填写的各省市一九五六年入社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比率较一九五五年增长的数字，和在此表背面写的一篇文字，文字部分即本篇（二）。

⑷　可能指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关于农业合作社端正互利政策问题给所属并报中央、上海局的指示。参见本册第198页注⑵。

给黄守湜[1]的信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守湜兄：

七月四日惠书收到。深表同情。寄上人民币二百元，聊为杯水之助。再有困难，望续告。

顺祝健康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七月廿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黄守湜，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

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都应该向他们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是简单地去进行斥责。简单的斥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必须由上面派出大批经过短期训练的干部，到农村中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运动中才能学会怎样做工作。光是进了训练班，听到教员讲了几十条，还不一定就会做工作。

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二

现在，全国合作化运动已经在大规模进展中，我们却还需要辩论这样的问题：合作社能不能发展呢？能不能巩固呢？就某些同志来说，看来问题的中心是在他们忧虑现有的几十万个半社会主义的一般地是小型的（每社平均只有二十几户）合作社能不能巩固。如果不能巩固，当然谈不到发展。某些同志看了过去几年合作化发展的历史还是不相信，他们还要看一看一九五五年这一年的发展情况怎么样。他们也许还要在一九五六年看一年，如果更多的合

作社巩固了，他们才会真正相信农业合作化是可能的，他们也才会相信我党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所以，这两年的工作很要紧。

为了证明农业合作化的可能性和我党中央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的正确性，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也许不是无益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中，我党已经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那时，在江西是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在陕北是变工队，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是互助组。那时，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也已经个别地产生。例如，在抗日时期，在陕北的安塞县，就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过，这种合作社在当时还没有推广。

我党领导农民更广泛地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开始成批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现在，又已经有了差不多六年的历史了。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党中央做出第一个先向地方党组织发布并且在各地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2〕草案的时候（这个文件到一九五三年三月，才在报纸上以正式决议的形式发表），已经有了三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过了两年，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党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3〕的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

已经发展到一万四千多个，两年时间增加了四十六倍。

这个决议指出，要在一九五三年冬季到一九五四年秋收的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一万四千多个，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多个，即只准备增加一倍半，而其结果，这一年却发展到了十万个合作社，成为一万四千多个合作社的七倍多。

一九五四年十月我党中央决定，由十万个合作社增加五倍，发展到六十万个合作社，结果完成了六十七万个合作社。到一九五五年六月为止，经过初步整理之后，缩减了两万个社，留下了六十五万个社，较计划数字超过了五万个社。入社农户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平均每社二十六户。

这些合作社，大部分是在北方几个解放较早的省份。在全国大多数解放较晚的省份中，每省都已经建立了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安徽、浙江两省建立的较多些，但是其他各省建立的数目还不很多。

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的大型社，每社有的七、八十户，有的一百多户，有的达到几百户。

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半社会主义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发展成了社会主义的高级社。

同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同时，我国已经有了少数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到一九五七年，国营农场将达到三千零三十八个，耕地面积将达到一千六百八十七万亩。其中，机械化农场将达到一百四十一个（包括一九五

二年原有的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增加的），耕地面积将达到七百五十八万亩；非机耕的地方国营农场二千八百九十七个，耕地面积将达到九百二十九万亩。国营农业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将有大规模的发展。

一九五五年春季，我党中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万个。这个数目字同原有的六十五万个社比较，只增加三十五万个，即只增加半倍多一点。我觉得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比原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除了某些边疆地区以外，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作榜样。这些合作社，过一两年就有经验了，就成了老社了，别人就会向它们学习了。由现在到一九五六年十月秋收以前，还有十四个月，完成这样一个建社计划，应当是可能的。希望各省区的负责同志回去研究一下，按照实际情况定出一个适当的计划，于两个月内报告中央。那时我们再来讨论一次，最后定案。

问题是能不能巩固。有人说，去年的五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太大了，冒进了，今年的三十五万个合作社的计划也太大了，也冒进了。他们怀疑建立这样多的合作社不能巩固。

究竟能不能巩固呢？

当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要将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确有很多的困难；但

是我们应当相信，我们党是能够领导群众克服这些困难的。

就农业合作化问题来说，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⑴ 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

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⑵ 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我们党已经胜利地领导了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方面，也同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已经有了足以说服人的有力量的证据。请看第一批三百个合作社，第二批一万三千七百个合作社，第三批八万六千个合作社，以上三批共有十万个合作社，都是一九五四年秋季以前建立起来的，都巩固了，为什么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的第四批合作社（五十五万个），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第五批合作社（暂定控制数字为三十五万个，尚待最后确定）就不能巩固呢？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三

为了使全国农村逐步地完成合作化，必须认真地整顿已有的合作社。

必须强调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合作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偏向。因此，必须注重整社的工作。

整社不是一年整一次，而是一年整两次至三次。有些今年上半年已经整了一次的（有些地方似乎整得很粗糙，还没有下大力去整），我建议今年秋冬再整第二次，明年春夏再整第三次。现有六十五万个合作社中，有五十五万个是去冬今春建立的新社，其中有一批比较巩固的所谓“一类社”⑷。加上以前的十万个已经巩固了的老社，那末，已经巩固的社是不少的。可以不可以由这些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带领其余尚待巩固的合作社逐步地获得巩固呢？应当肯定地说是可以的。

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我们应当同合作社社员、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们的积极性。

要下决心解散的合作社，只是那些全体社员或几乎全体社员都坚决不愿意干下去的合作社。如果一个合作社中只有一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那就让这一部分人退出去，而

留下大部分人继续干。如果有大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干，那就让大部分人退出去，而将小部分人留下继续干。即使这样，也是好的。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⑸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⑴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⑵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四

必须认真地做好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

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

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这是我党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口号。这个口号也可以用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来。要有把握，就要有准备，而且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在一个省、一个专区和一个县里面建设一批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事前做好许多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大体是：⑴ 批判错误思想，总结工作经验。⑵ 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在向农民作宣传的时候，不但要解释合作化的好处，也要指出合作化过程中会要遇到的困难，使农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⑶ 按照实际情况，拟定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和全乡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从其中拟定年度规划。⑷ 用短期方式训练办社干部。⑸ 普遍地大量地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促使许多互助组互相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的联合组，打好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合作社的基础。

有了这些条件，就有可能使合作社发展的数量和质量统一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还要在一批合作社建成以后，跟着就去进行整顿工作。

看一批合作社建立起来以后能不能巩固，第一就看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做得好，第二就看建社以后的整顿工作是不是做得好。

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依靠党和青年团的乡支部。因此，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同在乡村中的建党建团工作和整党整团工作密切地相结合。

不论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应当以乡村中当地的干部为主要力量，鼓励和责成他们去做；以上面派去的干部为辅助力量，在那里起指导和帮助的作用，而不是去包办代替一切。

五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已经建立起来了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这是极好的情况，证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

为了要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就必须：⑴坚持自愿、互利原则；⑵改善经营管理（生产计划、生产管理、劳动组织等）；⑶提高耕作技术（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复种面积、采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同病虫害作斗争

等）；⑷ 增加生产资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农具等）。这是巩固合作社和保证增产的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坚持自愿、互利原则，现在必须注意解决以下各项问题：⑴ 耕畜和大农具是否以迟一两年再入社为适宜，入社作价是否公道和还款时间是否过长；⑵ 土地报酬和劳动报酬的比例是否适当；⑶ 合作社所需要的资金如何筹集；⑷ 某些社员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力去从事某些副业生产（因为现在我们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地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所以，上述四个问题必须注意解决得恰当，才不至于违反贫农和中农之间的互利原则，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自愿）；⑸ 社员的自留地应有多少；⑹ 社员成分问题；等等。

这里谈一个社员成分问题。我以为在目前一两年内，在一切合作社还在开始推广或者推广不久的地区，即目前的大多数地区，应当是：⑴ 贫农；⑵ 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⑶ 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几部分人中间的积极分子，让他们首先组织起来。这几部分人中间暂时还不积极的分子则不要勉强地拉进来。等到他们的觉悟程度提高了，他们对于合作社感到兴趣了，然后再分批地把他们吸收进合作社。这几部分人的经济地位是比较接近的。他们的生活或者还是困难的（贫农，他们分得了土地，比较解放前是好多了，但是还因为人力畜力和农具的不足，生活仍然感到困难），或者还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有一种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虽然如此，他们中间的积极性的程度，由于种种

原因，仍然是不同的，有些人很积极，有些人暂时还不大积极，有些人还要看一看。因此，我们对于一切暂时还不想加入合作社的人，即使他们是贫农和下中农也罢，要有一段向他们进行教育的时间，要耐心地等待他们的觉悟，不要违反自愿原则，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

至于新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一切经济地位较为富裕的中农，除开若干已经有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真正自愿加入合作社的，可以吸收他们入社以外，其余暂时都不要吸收，更不要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这是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只有等到农村中大多数人都加入合作社了，或者合作社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同这些富裕中农的单位面积产量相等甚至更高了，他们感到再单干下去在各方面都对他们不利，而惟有加入合作社才是较为有利的时候，他们才会下决心加入合作社。

这样，先将经济地位贫苦或者还不富裕的人们（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按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在几年内，组成合作社，然后再去吸收富裕中农。这样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

在最近几年内，在一切还没有基本上合作化的地区，坚决地不要接收地主和富农加入合作社。在已经基本上合作化了的地区，在那些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内，则可以有条件地分批分期地接收那些早已放弃剥削、从事劳动、并且遵守政府法令的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参

加集体的劳动，并且在劳动中继续改造他们。

六

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感觉，已经在广大的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间迅速地发展起来。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只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们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面说过，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间也有许多人，因为觉悟不高，暂时还是观望的，他们也有摇

摆；但是同富裕农民比较，他们是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这是实际存在的情况。而我们的有些同志却忽略了这种情况，认为现在刚刚发展起来的几十万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已"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看见了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这是第一种错误思想。

这些同志还对于共产党在农村中的领导力量和广大农民对于共产党的热忱拥护这样一种情况，估计不足。他们认为我们的党对于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都难于巩固，大发展更不敢设想。他们悲观地描写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现时状况，认为"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不错，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新的革命。过去我们只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但是怎样去取得这种经验呢？是用坐着不动的方法去取得呢，还是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呢？不实行五年计划，不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我们怎么能够取得工业化的经验呢？五年计划中就有农业合作化的部分，我们不去领导农民在每乡每村都办起一个至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试问"干部的经验水平"从何处得来，又从何处提高呢？显然，所谓现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这样一种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这是第二种错误思想。

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

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我们必须相信：⑴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⑵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如果缺乏这种信心，我们就不可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

七

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鼓舞着我国人民，它使得我国人民对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可是，就在这个国际经验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而这种方针，曾经在苏联证明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在工业化的问题上可以采取现在规定的速度，而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则不必同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而应当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这就忽视了苏联的经验。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

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苏

联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也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孤立地互不联系地去看这些问题。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这种经验，苏联也已经提供给我们了，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八

有些同志,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找到了根据,拿来批评我国目前的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急躁冒进。《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是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许多地

方党组织，曾经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在一个时期内，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吗？我们难道不应当注意这一项国际经验吗？

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但是我们不应当容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

我党中央是怎样决定在中国进行农业合作化的呢？

第一、它是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计划的。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到一九五二年，这三年多一点的时间，是为完成恢复我国经济的任务度过了的。在这个时间内，在农业方面，我们除了实行土地改革和恢复农业生产这些任务之外，我们还在一切老解放区大大地推广了农业生产互助组的组织，并且着手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得了一些经验。接着是从一九五三年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现在已经实行了差不多三年，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向全国范围内推广，我们的经验也增加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共有时间十八年。我们准备在这个时间内，同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的改造。这是可能的吗？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可能的。苏联是在一九二〇年结束国内战争的，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共有十七年时间完成了

农业的合作化,而它的合作化的主要工作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六年时间内完成的。在这个时间内,虽然苏联的一些地方党组织,如像《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上所说的,犯过一次所谓'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但是很快就被纠正。苏联终于用很大的努力胜利地完成了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农业方面完成了强大的技术改造。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

第二、我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第一步,在农村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为一起或者十几户为一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然后,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地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现在已有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是增产的,百分之十几的社是不增不减的,百分之几的社是减产的。这

后面的两类情况是不好的，特别是减产的一类最不好，必须用大力去整顿。因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合作社是增产的（增产的数量由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又因为那百分之十几的合作社虽然第一年不增不减，但是经过整顿，第二年可能增产；最后，那百分之几减产的合作社，经过整顿，第二年也有可能增产，或者进到不增不减的地位。所以，就整个说来，我们的合作化的发展是健康的，是可以基本上保证增产而避免减产的。这些步骤，又是训练干部的很好的学校。经过这些步骤，大量的合作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就可以逐步地训练出来。

第三、每年按照实际情况规定一次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控制数字，并且要对合作化的工作进行几次检查。这样，就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成绩的好坏，决定各省各县各乡的每年具体发展的步骤。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也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有些地方应当大量地建立新社，有些地方可以只在老社中扩大农户的数目。各省各县，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至于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检查工作，中央、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和地委必须十分抓紧，每年不是进行一次，而是应当进行几次。一有问题就去解决，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去作一次总解决。批评要是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

评。例如今年七个月内，单是中央召集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农村合作化问题的会议，连同这次会议在内，就有了三次。实行这种因地制宜、及时指导的方法，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工作少犯一些错误，犯了错误也可以迅速纠正。

从上述种种情况看来，难道不可以说我党中央对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因而足以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吗？我想可以这样说，并且应当这样说的，将这种方针估价为‘冒进’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九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

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



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

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末尾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开头，即在一九五八年春季，全国将有二亿五千万左右的人口——五千五百万左右的农户（以平均四口半人为一户计算）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就是全体农村人口的一半。那时，将有很多县份和若干省份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并且将在全国各地都有一小部分的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变为全社会主义。我们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半期，即在一九六〇年，对于包括其余一半农村人口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那时，由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改变为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数目，将会加多。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而社会改革则将在一九六〇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十一

要有全面的规划，还要加强领导。

要有全国的、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全乡的关于合作化分期实行的规划。并且要根据实际工作的发展情况，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规划。省、专、县、区、乡各级的党和青年团的组织，都要严重地注意农村问题，切实地改善自己对于农村工作的领导。各级地方党委和团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要抓紧研究农业合作化的工作，都要把自己变成内行。总而言之，要主动，不要被动；要加强领导，不要放弃领导。

十二

一九五四年八月（这已经不是新闻了），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委的报告[6]说："随着农村合作化高涨形势的形成和发展，农村各类互助合作组织和各阶层群众，已经程度不同地普遍地动起来了。现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筹划和酝酿扩大社员，作为建社对象的农业生产互助组正在筹划和酝酿扩充自己的户数，不够条件的农业生产互助组也要求进一步地发展和提高它们自己。群众有的张罗入新社，有的张罗入老社。今年不准备入社的人们，也在积极地酝酿插入互助组。动的面很广。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运

动。这是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一个新的突出的特点。但由于某些县、区有的领导同志，未能适应这个新的特点，及时地加强领导，因此，部分村屯（按：黑龙江省的村是行政单位，等于关内各省的乡。黑龙江省的屯，不是行政单位，等于关内各省的村。）在群众自找对象中，已经开始产生‘强找强，排挤贫困农民’，‘争骨干，争社员，相互闹不团结’，‘骨干盲目集中’，‘富农和资本主义思想较严重的富裕农民趁机组织低级组或富农社’等等不健康的现象。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在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情况下，光是从建立新社这个范围和角度出发，考虑贯彻执行党的政策，领导这个运动，已经不够了，必须从全村范围（按：即全乡范围）和全面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角度出发，既考虑到老社的扩大，也考虑到新社的建立，既考虑到合作社的发展，也考虑到互助组的提高，既考虑到今年，也考虑到明年，以至后年。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实现党的政策，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

这里所说的“某些县、区有的领导同志，未能适应这个新的特点，及时地加强领导”，只是黑龙江一个省是这样的吗？只是某些县、区吗？我看，这种领导落在运动后面的严重情况，很可能在全国许多领导机关中都找得出它的代表人物来。

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又说：“双城县的希勤村，以村为单位，采取领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全面规划。这是领导合作化大发展的一种创举。其重要作用，首先在

于通过规划，全面地实行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加强了贫农和中农的团结，有力地开展了对于富农倾向的斗争。从农业全面合作化的利益着眼，适当地配备了骨干力量。调整和密切了社和社、社和组的关系，从而有计划地全面地推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其次，通过这样的规划，就把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工作，具体地布置到基层领导和广大群众中去，使党的村支部懂得了如何进行领导，使老社懂得了如何向前发展，使新社懂得了如何建社，使互助组懂得了提高的具体方向，更加发挥了党的村支部和广大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地体现了依靠党支部、依靠群众的经验和智慧的正确原则。最后，正由于通过这种规划，可以进一步地摸清农村的底，具体地全面地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因此，既可以防止急躁冒进，又可以防止保守自流，从而正确地实现了中央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黑龙江省委报告中所说的某些“不健康的现象”，究竟怎样解决的呢？省委的报告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省委报告的后面附载了双城县委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报告说：“通过党支部领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进行全面规划的结果，排挤贫困户入社的偏向纠正了，骨干过分集中的问题解决了，互相争骨干、争社员的现象没有了，社组关系更加密切，富农和富裕中农组织富农社或低级组的企图失败了，基本上实现了党支部的计划。两个老社扩大了社员百分之四十，搭起了六个新社的架子，整顿起两个互助组。估计搞得好，明年（按：即一九五五

年）全村就可以合作化。目前，全村群众，正在积极地实现今年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计划和搞好增产保收。村干部普遍认为：‘得亏这样一搞，要不就乱了，不但今年搞不好，还要影响明年。’”

我看就照这样办吧。

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根据《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版）刊印。原载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注 释

⑴ 这是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五五年八月，毛泽东对报告稿修改后，作为修正本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对报告修正本再次修改后，正式发表在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上。报告中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和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一九五五年浙江省“坚决收缩”农业合作社和全国农业合作化进度等问题上的所谓错误。一九八〇年，国家农委党组组成调查小组（包括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办公厅、农业部等部门同志参加），对邓子恢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正式写出报告。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八日，国家农委党组根据这个调查报告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指出：“关于一九五五年在浙江‘坚决收缩’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中

央农村工作部根据同年一月十日中央发的‘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通知’精神，即按照不同地区采取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和进行整顿等指示，向浙江省委提出的建议。在此之前，毛泽东同志曾找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谈话，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并提出应当实行‘停、缩、发’（分别不同地区，停止发展、实行收缩、适当发展）的三字方针。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这个建议下达到浙江省委，经过省委讨论一致表示同意，又召开四千会作出具体布置。浙江省年初原有五万五千个合作社，经过整顿巩固下来的有四万个，压缩了一万五千个，大部转成互助组。这一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纠正了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一度紧张的中贫农关系得到了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了，干部政策水平提高了。实践证明，这个处理是符合群众要求的。有的地方由于酝酿不够，行动过猛和工作粗糙，对不该收缩的也收缩了一些，这是在具体执行中的缺点错误。以后说‘砍’了二十万个社，这不符合实际。把浙江省的‘坚决收缩’说成是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不符合事实的。”关于全国农业合作化的进度问题，请示报告指出：“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对农业合作化的进度和完成时间本来有过规定，即需要十年到十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完成。中央发布的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就是按照这个精神写的。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也是按照这个精神部署工作的。”“一九五五年六月下旬以后，党内发生了争论。邓子恢同志主张还是按中央原定计划发展为好。邓子恢同志的理由是：（一）整个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二）现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存在的问题很多，

巩固任务很繁重，要打好基础；㈢地区不平衡，干部领导水平、群众觉悟水平不同，应逐步推广。这些意见，以后在七月的省、市书记会议和十月扩大的中央全会上，逐条受到了驳斥，斥责他们看不见'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是'右倾和经验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实际上，邓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对他的这种批判，曾导致以后合作化运动高级社化和人民公社化等急躁冒进的错误。"一九八一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中指出："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已经中央同意"，"中央认为：邓子恢同志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在创造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工作方面有过巨大贡献，他和他所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因邓子恢同志的问题受到株连的，也应一律予以平反纠正。"

⑵ 这个决议，中共中央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以草案形式发给地方各级党委试行。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了部分修改后，通过成为正式决议，于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决议指出，在我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必须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积极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决议规定了互助合作运动三种主要的形式，即：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⑶ 这个决议，总结了我国各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经

验，特别是一九五一年以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规定："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同时指出："根据我国的经验，农民这种在生产上逐步联合起来的具体道路，就是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⑷　当时一般把办得比较好的、中等的和不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分别称作一类社、二类社和三类社。

⑸　这里讲的三户贫农指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的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

⑹　指中共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四年八月关于双城县农村合作化运动中进行"全面规划"的经验给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

中央转发国家机关党委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此件[1]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并可转发给各单位仿照办理。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

二

刘、朱、周、陈、邓[2]即阅，尚昆[3]用电报发去，另印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专题简报。简报说，国家机关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已进行了八周，大多数单位的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为了

进一步深入开展这一运动，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克服干部中存在的自满情绪和麻痹思想，加强对运动的具体领导。同时各单位的领导要注意将运动与业务工作很好地分工，不能耽误“五年计划”的实现，又要把运动搞好。二、要打开目前小组斗争中的僵持局面，着重解决下列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克服一般化的领导方法，有计划地研究敌情，总结斗争经验，具体地研究斗争策略；第二，要注意克服某些小组的骨干分子轻敌速胜思想和粗糙简单的斗争方式，绝不能简单从事；第三，根据不同的斗争对象，采取不同的斗争方法和策略，提倡斗争方法和策略的多样性、灵活性；第四，注意调查研究工作，有计划地及早派人去调查材料；第五，积极开展专案审查小组的斗争，同时注意和一般小组的斗争相结合，灵活运用两种斗争形式。

⑵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中央关于建立制度、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稿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

即送刘、朱、周、陈、邓、先念⑴同志阅，尚昆⑵办。

照此办理。在第一、二、三、四页上改了或加了几句话⑶。

毛　泽　东

八月三日

各项办法和表格已阅，均照办。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五办公室主任。

⑵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⑶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制度、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稿的修改有：在第一页，加写了抬头："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在第二页，将"中央检查了一九五三年以来的

粮食统购统销工作，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大体还好，问题不少”一句中的“大体还好，问题不少”，改为“虽然问题不少，但是大体上是好的”;在第三页说到“估计一九五五年的生产计划如果完成，粮食产量将比一九五四年增加二〇〇亿斤，而国家征购的数量又比上年度实收数减少六十四亿多斤，这样农民就能够留有较多的粮食，用以改善生活”一句后，加了“增加牲畜饲料”六个字；在第四页，将“必须抓紧每年七至十二月的销量，在这一期间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销得过多”一句，改为“必须抓紧每年七至十二月的销量，在这一期间教育农民吃少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或国家销得过多”。

给孙燕[1]的信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

配君同志：

你的信收到，很高兴。你们想到北京一看，是可以的；但是今年不要来，明年再说吧。你母亲在何处工作，情况如何？如有困难，可告知。

祝你进步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孙燕，学名孙配君。她的母亲陈玉英曾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当保姆。

中央转发北京军区空军关于勤杂人员中发现严重问题通报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八月四日）

一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局〈区〉党委：

现将空军党委《勤杂人员中发现的严重问题通报》[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勤杂人员成分不纯问题，很值得注意，应在此次肃反斗争中予以解决。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四日

二

刘、周、陈、邓[2]阅，尚昆[3]用电报发去，另印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党委审干办公室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转发的北京军区空军《勤杂人员中发现严重问题的通报》。

通报说，北京军区空军驻京单位自开展肃反运动以来，在勤杂人员中发现了不少问题，证明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审查不严，必须引起各级领导上的高度注意。在勤杂人员中的肃反运动不能放松，以便将混在勤杂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清除出去。

⑵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解决儿童读物奇缺问题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八月四日、十一月一日）

一

林枫[1]同志：

此事[2]请你注意，邀些有关的同志谈一下，设法解决。

毛　泽　东

八月四日

二

林枫同志：

此信[3]已阅，附件还来不及看。你们可以照你们的布置去做，不要等候我提意见。

毛　泽　东

十一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林枫，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

〔2〕　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编印的《情况简报》第334

号上刊载的《儿童读物奇缺，有关部门重视不够》的材料中说：中国少年报社最近召集有关部门座谈关于儿童读物问题，会上普遍反映儿童迫切需要的作品和中国儿童文学奇缺，许多应该有的读物都没有，在仅有的读物中，又多半只适合小学四、五、六年级的学生阅读。（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批注："书少"。）造成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㈠各地文化、教育部门和团委不重视儿童读物的创作和供应，各地出版社都没有编儿童读物的干部和出版计划。㈡一般作家不愿给儿童写东西，也有些作家觉得搞儿童文学"糊不了口，出不了名"。（毛泽东在这两项旁批注："无人编"。）㈢全国多数书店不卖儿童读物，有的虽推销，也不积极，只停留在少数门市部，没有面向学校和孩子们。㈣书价过高，一般的儿童读物价钱都在一二角以上，有的翻译作品需七八角甚至一元，孩子们没钱买。（毛泽东在这一项旁批注："太贵"。）

⑶　指林枫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关于改善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发行等问题，我们根据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曾和文化部、教育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保卫儿童委员会、团中央以及有关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现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创作问题的报告、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发行工作的报告及教育部党组关于少年儿童读物问题的报告送请审阅。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已经按此报告初步地布置了工作。

中央转发建工部关于在设计部门中发动技术人员开展肃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

一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建筑工程部五人小组这个报告[1]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并可转发一切有工程技术人员的单位仿照办理。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刘、周、陈、邓[2]阅，尚昆[3]用电报发去，另印发。

毛　泽　东

八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指建筑工程部五人小组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关于在设计部门中发动技术人员开展肃反斗争的报告。报告说，建筑工程部设计部门党员骨干少，技术干部多。技术干部多从海外归来，与海外联系广，历史不大清楚。我们从六月十日起用了四十多天的时间进行准备，整顿队伍，排队摸底，学习文件，反复动员，并进行了一般号召，最近又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斗争。取得的经验是：第一，领导思想上必须认识技术人员中同样绝大多数是好人，要善于把不良的思想作风和由于技术水平不高所造成的过错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区别开来，只有如此，才能有热情与耐心去发动群众。第二，领导必须亲自动手，主要是反复动员，交代政策，提高觉悟，解除顾虑，指出工程师在运动中应起的作用与应负的责任，并善于根据不同对象进行工作。第三，重视发动技术人员参加运动。第四，开展"攻心战"，造成一种群众性的劝说运动。

⑵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给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乡政府的信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

韶山乡政府各同志：

给我的信收到。互助合作大有发展，极为高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给湖南省湘潭县云源乡政府的信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

云源乡政府各同志：

你们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你们。乡间情形，尚望随时告我为盼！

顺祝

工作进步！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关于每年有计划地下部队检查工作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八月六日）

一

彭[2]阅，退粟裕同志。

有计划地每年下部队检查几次，很有必要。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八月六日

二

我已于五月十九日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3]，因此你们已无不事先请示的责任，只有在后来决定具体部署时没有请示的责任。

毛　泽　东

八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一九五五年

七月十一日关于修建福建地区一线机场及布置空军部队进驻福建问题给彭德怀并报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上。报告说，总参谋部关于修建福建地区一线机场及布置空军进驻福建，虽是本着中央军委的历次指示安排的，但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对空军进驻福建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估计不周到，对由此影响到的复杂的外交斗争理解不深刻，没有及时请示，应该引以为今后工作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要经常到下面去检查工作，了解情况，借机学习，以克服事务主义的工作方法。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3〕 见本册第128页。

给 刘 松 林[1] 的 信

（一九五五年八月六日）

思齐儿：

信收到。患重感冒，好生休养，恢复体力，以利出国。如今日好些，望来此一看；否则不要来。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

祝好！

父　　字

一九五五、八月六日

你要的列宁选集两卷，给你送上。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刘松林，原名刘思齐，一九四九年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一九五〇年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刘松林这时准备去苏联留学。

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广州市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广东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特别注意充分发动群众和反复交代政策这两点。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

二

刘、周、邓、陆定一〔2〕阅，尚昆〔3〕用电报发去，另印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广东省委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关于广州市属机关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广

州市属机关一周来的运动发展很快，已揭露出一大批反革命活动的材料。运动中得到的体会是：第一，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特别是中间和落后的群众。反革命分子进行活动的特点之一，就是拉拢和利用某些历史上有污点、有错误的人或落后群众，因此把这些人充分发动起来，卸掉他们的历史包袱，解除顾虑，提高其政治觉悟，对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第二，必须反复地不厌其烦地交代政策。反革命分子最怕杀头，有一般性政治问题的最怕清洗，除此之外又怕不被信任而没有前途。应向他们讲清政策：彻底坦白，该杀者不杀，罪重者减轻，罪轻者免罪，允许立功赎罪；有一般性政治问题者只要交代，一律不清洗；彻底坦白而又能检举其他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者，可以受到人民的欢迎和组织的信任，自己会有前途的。这样就可以大大动摇反革命分子的抗拒心理。第三，坚决批判和克服右倾思想，使运动深入发展，不走过场。第四，加强对基层小组的领导，深入检查工作，及时发现问题，予以解决。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组长。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洛阳拖拉机厂肃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八月八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并告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党委党组：

关于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开展肃反斗争，既要肃清一切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并作适当的处理，又要团结、教育和提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好人（包括犯有某些错误的人在内），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在这方面的经验中，现有洛阳拖拉机厂党委报告一件⑴，发给你们参考，并可转发有关各单位。但应指出：该厂参加坦白检举运动的工程师和四级以上技术员四十八人中，有重点斗争对象十三人，这个比例很大。现在假定这十三人都是有反革命的历史问题或现行问题的人，我们必须注意分别情节轻重，做出不同的结论，争取其中的多数人留在厂内，在领导控制和群众监督之下，继续工作，在工作中加以改造。只对极少数几个人，因为情节十分严重，留在厂内极为不利，可考虑另外的处理办法。

此点望各级党委严重注意。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八日

二

刘、朱、陈、周、陆定一、罗瑞卿[2]阅，尚昆[3]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前批各件是否都已办了？我处没有收到印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洛阳拖拉机厂临时委员会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关于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给洛阳市委的报告。报告说，该厂参加这次坦白检举运动的工程师和四级以上技术员共四十八人，其中重点斗争对象十三人。在这十三人中，有四人交代比较好，八人思想动摇，一人仍然狡猾对抗。如何在运动中团结争取多数，分化孤立首要分子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也是开展坦白检举运动能否胜利的关键。主要体会是：（一）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批判'不问政治、凭技术吃饭'的思想，树立对革命事业、对坦白检举的正确态度，是发动旧工程技术人员积极参加运动的主要一环。（二）进行政策教育，一是团结教育改造技术人员政策，一是肃反政策。前一项政策主要是团结大多数好人，培养国家建设的技术人才，为人民服务；后一项政策是肃清破坏革命事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两项政策是不矛盾的，都必须贯彻执行。（三）通过召开座谈会，深入贯彻政策，解除顾虑。（四）开展技术人员内部思想斗争，团结好人，分化敌人。

⑵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组长。罗瑞卿，当时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副组长。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及时转发军队开展肃反运动情况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八月八日）

谭政[2]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你是否都看这类报告？应当都看，择要转发，及时指导各地。每隔一个半月，应召集全军性的会议讨论一次。

毛　泽　东

八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上报总政治部并给所属各单位的关于肃反运动情况的简报上。简报说，军区直属各大单位的肃反运动已转入联系实际、展开斗争、具体揭露的阶段。在揭发出的问题中，较为严重的有：㈠已发现一些反革命分子。㈡各单位都揭发出一些小集团活动。㈢不少单位揭发出一些严重的泄密事件。㈣各单位都揭发出不少反动言论。㈤有些知识分子开始暴露受胡风思想影响和崇拜胡风分子的问题。在此期间，军区五人小组与各级五人小组注意对开好小组会的指导和掌握，取得了一些经验和体会：⑴凡能具体地联系实

际，特别是依据本单位的业务特点与突出问题联系实际，小组会就生动有色。⑵小组是战斗单位，要重视提高小组长的领导水平。⑶小组会的形式可灵活多样，求得交锋。⑷对某些情况复杂的单位，在判定对象确有问题，群众斗争将要出现僵局时，领导应掌握火候，改变战术。

⑵ 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在安徽军区肃反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八月八日）

谭政[1]同志：

兵役干部复杂，不独安徽为然，此件[2]似可转发各省军区仿办，请酌处。

毛　泽　东

八月八日

肖华[3]病况如何，盼告。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政治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转发所属并报总政治部的安徽军区党委、政治部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关于肃反情况的简报（第四号）。简报说，根据最近几天的肃反运动来看，有如下问题应加注意：第一，在兵役干部中，存在问题较多，必须注意清理。据初步了解，在军区干部学校学习的兵役干部中，已发现有反革命分子和重大政治嫌疑分子。对这类问题的清理，必须部队亲自动手，不能单独依靠地方党委。第二，转入坦白检举阶段前，必须有周密的布置和充分的准备。第三，在思想检查和坦

白检举阶段的具体做法：1、思想检查和坦白检举要密切相联，不能截然分开。2、思想检查中，必须展开尖锐的斗争。3、思想检查之前应确定重点对象，以便有对象有重点地开展斗争。4、在群众已经发动，斗争已经展开，重点对象已经明确，骨干已经经过实际斗争锻炼之后，即由领导上号召坦白检举，转入坦白检举阶段。

〔3〕 肖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中央转发广东省建筑局发动后进群众开展肃反的经验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八月九日）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政府各党组：

这一份材料⑴，有推荐的价值，对技术部门特别有用，现发给你们参考。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九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指中共广东省委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印发的关于广东省建筑局第二小组发动后进群众开展肃反斗争的经验材料。材料介绍了在肃反运动转入联系实际时，有意识地发动后进群众的经验：第一，必须摸透后进人物的思想特点、表现和各种顾虑，派适当的同志去个别谈话，针对其思想问题，解除怕组织不信任及撕不破面皮的思想顾虑。第二，必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找和谈话对象同行的有感情基础的老工程师去交谈，从鼓励进步、巩固思想情绪入手，启发诱导，不追不逼。第三，要攻破敌人，必须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后进群众起来揭发检举。事实证明，敌人的活动对象是后进群众，而后进群众也最了解敌人的底细，发

动了后进群众才能搞出敌人的真实材料。发动后进群众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是一次半次谈话就可以解决的，必须有决心，有耐心，进行细致的启发教育工作。

中央转发中国作协关于对暗藏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军委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

此件[1]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并可转发各单位仿行。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日

二

刘、陈、邓、陆定一[2]阅，尚昆[3]用电报发去，另印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四日关于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报告。报告说，随着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的公布，作协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他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大体分为三阶段：从五月

十三日第一批材料公布到五月二十九日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反复阅读、座谈两批材料，批判右倾思想。从五月三十日召开第一次动员大会开始为第二阶段，主要是展开尖锐的揭发批判和思想交锋，并作了初步排队。六月十日第三批材料公布后，立即召开第二次动员大会，把运动引到普遍暴露问题的第三阶段。具体做法是：一、认真阅读"材料"，展开同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想的斗争。二、反复动员，掌握材料，进行排队，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造成一个强大的围攻局面。三、放手发动群众，支持尖锐激烈的思想批判，结合个别谈话，促使反革命分子交代问题。四、培养积极分子，扩大战斗队伍，丰富材料，坚决查清反革命分子。

〔2〕 刘，指刘少奇。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组长。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对外贸易部关于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一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并告军委各部门：

对外贸易部的肃反经验〔1〕很有用处，发给你们参考，并可转发各单位仿行。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一日

二

刘、陈、邓〔2〕阅，尚昆〔3〕用电报发去，并抄军委各部门，另印发在京各中委。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对外贸易部党组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关于肃清一切暗

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情况给国家机关党委并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介绍的经验。报告说，外贸部的肃反运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㈠从六月六日至六月二十一日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做好运动前的准备工作。㈡从六月二十二日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开始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经验是：第一，放手发动群众，强调联系实际，揭发坏人坏事，层层"剥皮"，最后达到孤立暴露反革命分子的目的。第二，小组进行思想斗争要有准备，必须重视整理材料和研究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第三，小组斗争进行到足够程度时，应即转入专案审查小组进行审查斗争。㈢从七月下旬进入第三阶段，主要是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破案歼敌。这一阶段的经验是：第一，要继续反对右倾思想，加强具体指导。第二，大力加强专案审查小组的领导，求得破案歼敌。第三，在小组进行思想斗争剥去反革命分子的伪装后，进一步审查其历史和社会关系，对暴露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和教育干部的作用很大。

⑵ 刘，指刘少奇。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派中国代表团参加朝鲜解放十周年典礼给金日成的复电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一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愉快地接受并感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邀请，以朱德同志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将前往贵国参加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在平壤举行的纪念朝鲜解放十周年典礼〔1〕。谨致敬意。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一日　北京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稿刊印。

注　释

〔1〕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朱德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了朝鲜“八·一五”解放十周年庆祝活动。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枓奉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同志：

值此朝鲜人民获得解放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在伟大的苏联军队击败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后，十年来，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为争取自己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独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以后，朝鲜人民又进行了艰巨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朝鲜人民的这些成就给了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朝鲜停战以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严格遵守朝鲜停战协定，朝中两国政府始终本着协商精神谋求朝

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是和平的敌人却多方图谋破坏停战协定，致使朝鲜停战至今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是，朝鲜停战协定决不容许破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必须实现。

祝朝鲜人民在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独立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朝鲜人民在这一斗争中将永远得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深厚的同情和全力的支持。

祝你们在加强民主基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刘少奇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揭发出冒牌工程师的情况简报的批语和对中央批语稿的修改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十三日）

一

定一[1]同志：

此件[2]可转。请查告城市建设总局属何机关管辖，是否直属国务院？[3]

毛　泽　东

八月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对高级知识分子一味照顾，即令有严重问题也不去触动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方针是：坚决保护一切好人；而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则必须发动群众认真清查出来，并作适当的处理。[4]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⑴　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组长。

⑵　指中央十人小组办公室一九五五年八月十日关于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城市设计院揭发出冒牌工程师多人的情况简报。简报说，在肃反运动中，城市设计院经过群众检举和查历史，发现有不少是混进来的冒牌工程师，其中隐藏了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些人技术低劣，政治历史情况复杂。他们通过伪造历史、学历、夸张吹嘘个人本领等手段，混入技术部门。而我们有些单位由于基本建设任务繁重，急需技术人员，到处搜罗，更不管真假，一概收录，听说是大学、专科毕业，便给个工程师职位，这就给这些冒牌工程师的混入开了方便之门。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陆定一向毛泽东建议转发上述简报。

⑶　陆定一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三日向毛泽东报告："城市建设总局直属国务院，其工作实际上是国务院三办领导的。局长是万里同志。"

⑷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三日转发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城市建设总局城市设计院揭发出冒牌工程师的情况简报的批语稿中修改的一段话，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部署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三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湖北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部署问题的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湖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关于为什么“有些干部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中，不是比土地改革时期的劲头更大，热情更高，而是滋长着一种极其危险的消极和怕困难的情绪”的问题，应当加以分析，给予明确的回答。关于各省区在一九五六年秋季以前按照实际情况究竟能够发展到多少个社的问题，望和较多的同志加以研究，确定一个计划，报告中央。湖北各地委目前正在召集区委委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地、县、区的规划布局。湖北省委准备召开地书联席会议进一步研究和确定全省规划方案。中央希望各省区也能这样做，时间或在八月底，或在九月上中旬，以在九月二十日以前研究和确定全省区的规划方案为适宜。关于用大力、

分几次、认真地而不是走马看花地整顿现有合作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北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央希望你们严重地加以注意，于九月二十日以前，务必作出切实的部署，连同全省发展规划，一起报来为盼。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三日

二

刘、陈、周、小平[2]阅，尚昆[3]办。另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部、农业部党组及各有关同志。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湖北省委的报告说，我们于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和四日先后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和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检查了今年以来省委的工作。省委认为，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有右倾思想，表现在怕多、怕乱。对于中央五月十七日会议关于积极发展合作社的精神认识不足。在六月省党代会上，虽然检查了“有些干部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中，不是比土地改革时期的劲头更大，热情更高，而是滋长着一种极其危险的消极和怕困难的情绪”，并分析了它的原因，但没有去想一下省委对运动的领导是否放手，是否有领导大运动的气魄，对建社条件有限制太严太死的缺点。省委认为，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是过渡时期各项工作的指针，一切工作都应充分发挥潜

力，克服困难，尽一切可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度，必须反对在困难面前消极动摇的右倾思想。会议确定了全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划方案，到明年秋季以前发展到十二万个社，占全省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关于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准备在八月底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进一步研究和确定全省规划方案。

⑵ 刘，指刘少奇。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祝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十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先生阁下：

值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十周年纪念之际，谨向阁下和贵国人民致热烈的祝贺。祝印度尼西亚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阁下身体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央转发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六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辽宁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辽宁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相互关系问题，必须强调二者的紧密联系，而不可只强调前者，减弱后者。因为如果不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则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关于整社建社扩社的各项准备工作，辽宁省委指出，应包括"逐级做好思想发动，批判克服右倾思想，积极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逐级做好发展社的全面规划，特别是着重解决村一级（按即乡一级，东北各省还未改称乡）合作化的阶级规划；继续做好现有社整顿巩固工作，进一步贯彻合作化的具体政策，审查、清理和

纯洁合作社的组织；加强对互助组的领导，打好建社的基础；把整社建社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密切结合起来”，这些都是适当的。辽宁省委决定于九月上旬召开全省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的联席会议讨论合作化问题，各省可以酌量仿行。辽宁没有地委一级，为了加强对合作化的领导，立即建立这一级机构，我们认为是必要的。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六日

二

刘、陈、彭真、小平、陈毅、恩来⑴阅，尚昆⑵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刘，指刘少奇。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恩来，即周恩来。

⑵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同意袁希洛[1]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批语[2]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七日）

刘、周、陈、邓、彭真、陈毅[3]阅，退毛。

似可允其来京一行，并参加国庆观礼。此人是江苏教育会派要人之一，似可考虑给以某种名义。

毛　泽　东

八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袁希洛，辛亥革命时的同盟会会员和临时议会代表，二十年代曾任江苏省启东县县长。建国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为转交袁希洛给毛泽东的信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邢西萍（即徐冰）的信上。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毅，曾任上海市市长，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加强中央机关防卫工作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八日）

罗瑞卿、邓小平、杨尚昆、汪东兴[2]各同志阅。敌人放毒事值得注意。请你们对中央机关的防卫问题，加强注意。

毛　泽　东

八月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部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三日关于驻广州市部队发生严重中毒事件给总政治部并广东省委边防部、广州市公安局的报告上。报告说，驻广州市部队在八一建军节期间先后有二十四个伙食单位一千五百多人发生中毒，各单位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些可疑线索和可疑人员，初步分析，这些事件的发生，有的是因反革命分子投毒所致，有的是因食物腐烂所致。各单位正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分别查清问题的性质，予以处理。

〔2〕　罗瑞卿，当时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长。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中央关于妥善保存和严格清查处理敌人遗留的各项档案材料的指示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九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关于妥善地保存和严格地清查处理敌人遗留下来的各项档案材料，对于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审查干部的工作，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档案，不但省市一级大量存在，而且在专县两级也是存在的，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通令所属妥善保存，并严格地加以清查和处理。广东省委对于此事已作了适当的部署〔1〕，现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仿照广东的办法，作出同样的部署。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九日

二

刘、陈、彭真、小平、瑞卿、定一〔2〕阅，尚昆〔3〕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指中共广东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四日关于清查处理敌人各系统有关档案给所属并报中央的紧急通知。通知说，广东解放后，各地区均接收了不少敌人遗留下来的档案材料，其中不少对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由于对其作用认识不足，发现有不少单位将这些材料予以烧毁或当作废纸出卖，大部分地区对接收的档案至今仍分散搁置，未清查处理，在对敌斗争中亦未很好地加以利用。为此，特作如下通知：㈠凡是过去接收的档案材料，一律不许出卖或销毁。㈡对已接收或遗散各地的档案进行清查，限期弄清所有档案材料的情况和数字，以县、市为单位派专人予以登记处理。㈢各地党委应抽调政治可靠并有一定水平的干部组成清理小组，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结合镇反调查摸底工作和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迅速进行清理。㈣在清查工作中，各地如发现有省级机关的成批档案材料，应即送交省委。㈤上述工作进行情况，于八月底作出第一次书面报告。

⑵　刘，指刘少奇。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公安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副组长。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组长。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广东省委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日）

陆定一、罗瑞卿⑴同志：

此件⑵值得一看。此件中的意见，请考虑是否有一些可以吸收到你们现正起草的中央文件⑶中去。

毛　泽　东

八月廿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组长。罗瑞卿，当时任公安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副组长。

⑵　指中共广东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三日关于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广东省委为了贯彻中央肃反指示，除已布置各级领导深入研究中央指示并对前一段运动进行检查总结外，并计划：⑴省直单位九月底基本结束，广州市级单位年底结束，省属市九月开始，年底搞完，县以下明年开始，十月前搞完。⑵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情况，适当分出一些人管业务。⑶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反复交代政策。⑷有计划地掀起

高潮，分批分期打击敌人。现已组织专人清理敌人档案，以配合运动。

〔3〕 指当时正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这个指示于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发出，参见本册第317—319页。

关于举行群众集会支持印度收复果阿地区的斗争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一

周总理：

我国人民团体和舆论界对此应有所表示[2]。

毛 泽 东

八月廿日

二

少奇、小平[3]同志：

拟议增加三个城市[4]，报导亦可发来北京，因为此事有颇大的国际意义。请小平处理。

毛 泽 东

八月廿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果阿，位于印度西海岸，原为印度领土。十六世纪初连同附近的达曼和第乌一起沦为葡萄牙的属地。果阿地区的人民为民族独立一直坚持斗争。一九五〇年印度政府正式递交照会给葡萄牙政府，要求把它在印度的属地移交印度联邦，但葡萄牙政府断然拒绝了印度收回果阿的合法要求，拒绝同印度政府就果阿问题进行谈判。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印度独立纪念日，几千名印度志愿人员分别进入果阿、达曼和第乌。葡萄牙当局用自动武器和警棍对这些赤手空拳的志愿人员进行了血腥镇压，打死打伤二百多人。同一天，果阿境内的人民不顾葡萄牙当局的严厉镇压，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要求把果阿并入印度联邦。葡萄牙当局的暴行，激起了全印度人民更大的愤怒，印度许多城市举行了罢市和示威，印度政府也采取了关闭驻果阿总领事馆和要求葡萄牙关闭驻印度各地领事馆等措施。八月十九日，印度同葡萄牙断绝了外交关系。此后印度人民一直坚持收复果阿等地区的斗争，直到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印度出兵收复了果阿、达曼和第乌。毛泽东关于支持印度收复果阿斗争的两个批语，其一写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七日关于印度解放果阿运动有新发展给外交部的电报上。其二写在中共中央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关于举行群众集会表示同情和支持印度人民收复果阿斗争的通知稿上。

⑵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各界人民举行了支援印度人民收复果阿大会，大会向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印中友好协会发了声援的电报。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支持印度人民收复果阿的斗争》的社论。

⑶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4〕　中共中央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关于举行群众集会表示同情和支持印度人民收复果阿斗争的通知稿中，规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五个城市举行群众集会，毛泽东审阅通知稿时增加了沈阳、重庆、西安三个城市。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一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
彼·格罗查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格·乔治乌—德治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西·布吉奇同志：

值此罗马尼亚解放十一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怀着万分兴奋的心情注视着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十一年来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个成就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祝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巩固和繁荣自己的祖国以及保卫欧洲和世界的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新的胜利。祝中罗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刘少奇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根据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二十六）

一

即退小平[1]同志处理。此件很好。略为作了一点修改[2]。

毛　泽　东

八月廿二日

二

少奇、小平同志：

在第12页上加了一段[3]。不加这一段则没有完全解决误工误课问题。如以为可，即可照发。

毛　泽　东

八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三

除了分批进行这一个部署以外，在一个工作单位中，凡是同完成五年计划中的年度季度月度计划有关的单位，必须将领导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主持日常工作，在大问题上兼顾肃反，另一部分人专门主持肃反工作。群众则须在工余课余进行肃反，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占用一部分工课时间，但以不误工课为原则。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⑵　毛泽东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审阅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稿时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两处：㈠在指示稿谈到“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畏罪自杀和假自杀，要在本单位宣布并指出其罪状，对假自杀的要追究原因和动机”一句后，毛泽东加写了“但是为了保存有用材料的目的，也要尽可能地防止反革命分子的自杀”。㈡在指示稿谈到“对好人不坚决保护是不对的；对高级技术人员一味照顾，即令有严重问题也不去触动他们的想法，也是不对的”一句后，毛泽东加写了“对少数因有某种必要经中央或各省市委区党委批准暂时不去触动的人，不在此例”。

⑶　指毛泽东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在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稿中增写的一段话，即本篇㈢。此外，在指示稿中“反革命分子起义的不要逮捕，坦白的看情节轻重和

是否彻底坦白来决定是否逮捕，我们有材料但坚不坦白的必须坚决逮捕”一句后，毛泽东加括号写了“我们无材料则不要轻易逮捕”。

关于修改、印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批语和通知[1]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月）

一

各同志：

此件已根据七月卅一日——八月一日省市委书记会议的讨论，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谈建社准备工作一段和谈苏联经验的两段，其余都是文字方面的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一、两天内看一下，提出修改意见，于八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退还给我为盼！

毛　泽　东

八月廿三日

即发刘、周、陈云、小平、彭真、董老、彭德怀、陈伯达、陆定一、陈毅、谭震林、邓子恢、李富春[2]等十三人。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修正本），发给你们。你们收到后，可即印发给各级党委、党组、党内干部直至农村支部，但暂时不要在公开的报纸刊物上发表。各省市委区党委书记带去的未修正本，请缴还中央办公厅。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三

各同志：

这是第三次修正稿。请你们于收到后，即予审阅，提出修改意见，于十月十四日下午二时以前退还给我。修改之处，主要是将原来的第二第三两节，合并为第二节；增加了解释工农联盟问题的第九节；在第二节中将落后乡除外一句改为一部分边疆地区除外；在第三节中将河北省的例子删去一部分；在第五节中，在谈社员成分问题的第一第二行和谈地主富农是否可以入社的那几行都作了一些修改，将第十节中谈地富入社的那几句删去；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中也各有一些修改。在第三节的第二行、第四节的第二行和第十三行，都说了注重质量的问题；在第八节的"第三"中，

加了要有停顿、间歇的意思，还加了要有及时的批评一点。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三日下午六时

四

尚昆[3]同志：

此件请你于收到后，立即付排，并嘱校正勿讹，打出二十三份清样，于今夜十时以前，分送在京的十位政治局委员，八位副秘书长[4]和子恢，伯达，鲁言[5]各一份，另外送我两份。

毛　泽　东

十月十三日下午六时

给"各同志"的信，请附送。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修改他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时写的批语和通知。其一是他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对报告稿作了修改后于二十三日写的批语；其二是他在八月二十六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印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修正本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其三、其四是他在一九五五年十月再次对报告修改后于十三日写的两个批语，这次修改后的正式本发表在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上，见本册第234—260页。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

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董老，即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⑷　指谭震林、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林枫、李雪峰、杨尚昆、胡乔木八位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⑸　鲁言，即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关于各地有关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直接由中央拟电答复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小平、尚昆[2]同志：

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但对其他来报，例如青海省委关于畜牧问题的请示电报，仍应批交“农村工作部办”。

毛　泽　东

八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青海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日关于提倡牧业区在畜牧业生产中的原有团结互助组织形式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上。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认真地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广东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九日关于认真地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报告[1]，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所述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廿六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这一报告说，省委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一日召开了有各区党委和钦州地委书记等参加的扩大会议，研究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必须严格批判右倾思想，首先从领导上彻底解决问题。二、合作社大发展的条件是具备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过去对合作社在新区也需要大发展的方针摇摆不定，主要是看到一些困难因素，对大发展的有利条件缺乏具体分析。这次会议一方面摆出困难情况，更重要的是研究了有利的条件，并一致认为有利条件是主要的。三、进一步巩固老社与整理提高互助组，全面

搞好下造生产，为大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四、确定了大发展的做法和几项政策。广东现有农户约七百万户，到明年春发展到七万个合作社，达到总农户数的百分之四十，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达到合作化。为着搞好这个大发展，既完成任务，又保证质量，必须长年准备，特别是要大力搞好对互助组的领导，推广以组转社来进行建社。建社时间以集中在冬春为好。老社的巩固主要依靠驻社干部负责，这样就能始终不间断领导，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对新建社明确了几项政策：㈠对社的形式与内容，在一二年内不要要求太高级太复杂，一般每社以二十五户为宜，停止一开始便建大社的做法。㈡要求做好土地入股，其他牲畜、农具等入股问题应待条件成熟后逐步解决。㈢不要急于搞投资过大、过分集中的副业生产。㈣贯彻互利政策。㈤为着解决社员的家畜饲料与吃菜以及某些习惯性生活和生产资料的需要，必须适当留给每户社员一份耕地。

中央关于召开有省市区党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参加的中央会议的通知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委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他问题的中央会议。因此请你们预作准备，并请你们通知各地委书记作准备。准备事项，主要是深入了解当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关于合作化的全面规划。此项准备工作，须于九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中央转发热河、青海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热河、青海两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这两个报告是正确的。两个报告都提出了各该省基本上完成合作化的全面规划，热河省委还对全部农村工作做了安排，这些都是好的。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廿七日

二

刘、朱、陈、邓[2]阅，尚昆[3]用电报发去，另抄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党组。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指中共热河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日关于农业合作化计划和下半年农村工作安排给中央、毛泽东的报告和中共青海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关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〇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计划给中央的报告。热河省委报告的主要内容是：㈠关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计划。今年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已达到一万三千零八十五个，入社农户二十七万九千四百七十五户，占总农户百分之二十八点二二，在此基础上，今冬明春，准备再扩大老社，新建社四千一百个，使入社农户增加十六万，加上原有入社户数，可达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到一九五七年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再到一九五八年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基本上完成合作化的任务。㈡下半年农村工作安排，十月中旬以前，主要抓紧粮食增产、秋收工作和秋翻地的准备工作。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底，做好粮食“三定'到户，并抓紧征购入库，结合做好秋翻地和建社骨干训练工作，并完成第二批逮捕反革命分子的计划。十二月至明年二月底，集中力量以建社为中心，结合进行老社整顿和整党建党工作。青海省委在报告中说，我省农业区现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八百七十六个，入社农户二万四千九百四十四户，占农业区总农户数的百分之十三。在此基础上，计划一九五六年发展到一千九百二十八个社，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二十八；一九五七年发展到三千二百一十四个社，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五十；一九五八年发展到三千七百九十六个社，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三；一九五九年发展到四千一百三十二个社，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七十五；一九六〇年发展到四千三百一十三个社，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基本上完成农业半社会主义的改造。

⑵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分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

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安徽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安徽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安徽省委还在十个具体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中央认为安徽可以按照这些意见去做，在做的中间再考验这些意见的正确性，如有某些需要修改的地方，那时可以进行修改。中央认为这十条意见应当提到全国各省市各自治区，在适当的会议上，加以讨论，征求意见，并于今年国庆节以前报告中央。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二

周、陈[2]阅后，即送刘、朱、陈、彭真、小平、子恢[3]阅，

尚昆[4]用电报即速发去。另抄在京各中委、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农业部党组。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安徽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十个具体问题的意见：1、耕畜和农具的处理问题，提出折价归社、私有租用、分批折价三种办法，供群众选择。一年多的经验表明，群众最乐于接受第一种办法。2、土地和劳力的分配问题，也提出了三种办法供各社选择，即：定产以内比例分配超产归劳、定租制和按实产量比例分成制。试行的结果，采取定产以内比例分配超产归劳办法的比较多，准备继续推广这一办法。3、社员投资问题，采取的办法是：第一年按土地股凑合，第二年由民主商定在总收入中扣留。4、社员自留地问题，只限于社员自己食用的菜园地。至于一般人所没有的小果园以及长成的树木等，在初期办社时不入社。5、副业问题，我们的做法是：有一定规模的副业，应完全由社内统一规划办理，至于业余性质的小型副业，在不影响整体条件下应允许社员自搞。6、为防止单干农民和互助组不愿兴修水利问题，我们规定：凡个体农民和互助组在自己的土地上兴修小型水利改变了水利条件的，以后土地入社时应提高其土地等级，增加其土地报酬。7、鼓励社员积肥问题，我们规定：应根据社内全年所需肥料，以户为单位，按亩所定产量分摊，并根据肥料多少、好坏，给以工分。8、对鳏寡孤独等缺乏劳力的农民，我们规定：在农业合作社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吸收一定户数参加（大体十户带一户），试行结果一般均愿这样做。9、农村中小手工业者入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我们规定：属于专业性质的，加入手工业社；属兼业性质的，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后仍允许其从事手工业工作。其收

入全部交社者，则按技术工计算劳动工分，工具由社内统一修理。其收入不愿交社者，则社内不给计工分，工具亦由其自备。10、关于常年互助组问题，我们意见，在群众觉悟高、合作社大发展的形势下，不必再强调办常年互助组。但在合作社没有普遍发展以前，号召群众大量组织临时互助组，以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增加生产，还是非常必要的。

〔2〕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3〕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4〕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朱德同金日成谈话摘要上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八月）

陈云、李富春[2]同志阅，退毛。

关于地下工厂一段，值得一看。

我国似亦应注意建立地下工厂。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关于金日成首相同朱德副主席谈话的摘要上。金日成在和朱德谈话时介绍了朝鲜在战争时期及战后建立的地下工厂的情况。金日成介绍说，在地下建设工厂可以保障战争时期的安全生产，在缺乏大型钢材的条件下，挖石头洞子建设工厂在速度上原料上都有好处，地下建厂不像地面建筑那样复杂，建设起来也很坚固。地下工厂只要求好的通气设备和排水设备。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同意拨付农业合作社干部训练费和农业贷款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

小平[2]同志：

这类电报须速复，请告子恢[3]办理。广东所提要求我看是合理的。照此计算，全国每年须付干部训练费约五千万元左右，在几年内每年须付贷款五亿元左右，付出这两笔钱是值得的。

毛　泽　东

九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广东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关于一九五六年农业社的训练经费与贷款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广东省于一九五六年春耕前计划发展到七万个社，建社骨干的训练费需一百二十七万六千元；一九五六年新社与老社的巩固工作，又需训练费一百一十八万三千元。以上两项共需约二百四十六万元，需请中央拨付。另外，为解决新建社的贫农合作基金贷款，以及必要的基建、副业生产和开耕的生产费用，共需贷款三千七百八十三万元，也需中央予以解决。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通报江苏省粮食“三定”工作经验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

先念⑴同志：

此类经验⑵，宜用电话向各省市通知，此类简报也可以用最快办法送去各省市。总之，迅速交换经验，及时指导运动，随时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最为紧要。以上请酌处。

毛　泽　东

九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五办公室主任。

⑵　指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日编印的《粮食简报》第十六期上登载的江苏省粮食“三定”工作的经验。简报说，江苏省在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工作中，各乡共同的特点是从生产入手，而后又归结到生产上。具体做法大致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训练骨干，打通思想，掌握材料。第二步是开好乡人民代表会和村民会，向群众宣传政策、讲解做法和弄通计算的根据，公布留粮标准和征购方案。第三步是由村到户（即归户计算）进行“三定”，这是整

个工作的关键，而定产又是重要环节。定产有四种办法：㈠按农业税定产加成。㈡按一九五四年实产定产。㈢在去年特别丰产或歉收的地区，按一九五三年的产量定产。㈣按今年的实际产量定产。定产后购销可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左右的农户定下来，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农户要进行评增评减的工作。江苏的‘三定’工作在有些地方也存在着比较粗糙、没有将定产同统购统销结合进行的缺点。但从试点的结果看，只要‘三定’同时安排，购销结合进行，一般情况是好的。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同志：

值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十年来，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为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和争取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进行了英勇和艰苦的斗争，并获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些胜利不但鼓舞了一切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人民，并且对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限的欢欣和敬佩。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和通过全国选举实现越南统一的协议，但目前和平的敌人却又在阴谋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实施，这是一切正义的人们所绝

对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为争取彻底实现日内瓦协议、召开南北双方协商会议以准备全国自由选举所作的不断努力，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祝越南人民在为争取和平、独立、统一和民主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祝你们在巩固民主政权、医治战争创伤并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事业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慰问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托宁·萨波托斯基病情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

亲爱的安托宁·萨波托斯基同志：

获悉您患病的消息，中国人民和我本人怀着十分关切的心情，向您谨致诚挚的慰问并衷心地希望您早日恢复健康。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九月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央转发黑龙江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三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黑龙江省委八月十七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黑龙江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

中　　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三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周、伯达[2]阅后，即送刘、朱、陈、邓[3]阅，尚昆[4]用电报发去。

毛　泽　东

九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中共黑龙江省委的报告中说，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至八月九日，省委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分析了全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形势，确定了今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规划和做法。一九五五年冬到一九五六年春耕前，在认真巩固提高现有社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建立新社（预计四千到六千个）和扩大原有社，使入社农户由现在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二三发展到百分之五十左右。一九五七年春耕以前入社农户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新建社的规模一般为二十至二十五户，老社扩大一般以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为宜。根据上述规划，对不同地区提出不同要求：基本合作化地区，一般不再建立新社，集中力量巩固现有社，在适当扩大老社中妥善安置老弱残疾农民；在合作社比重不大的地区，应一面巩固现有社，一面根据条件积极发展；少数发展过猛问题甚多的地区，要全力巩固，一般不宜发展；空白村要加强领导，积极试办，争取村村有社。扩社、建社都必须坚持自愿、互助组基础和领导骨干等条件，做到充分的思想教育，深入的个别串连，正确地贯彻互利政策，在思想成熟的基础上，启发农民自愿报名入社，而后建立组织，统一组织生产活动。会议还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思想与组织建设，计划在今年挂锄、秋冬和明春，结合整社建社分批整党建党。

⑵　周，指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⑶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⑷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三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山西省委八月二十二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一件，另附计划〔2〕一件，均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山西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

中　　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三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周、伯达〔3〕阅后，即送刘、朱、陈、邓〔4〕阅，尚昆〔5〕用电报发去。

毛　泽　东

九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中共山西省委的报告说，我们于八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与会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致感到莫大的鼓舞和深刻的启示。会议确定了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全省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指出今后农业合作社的建设上应注意以下几点：⑴发展指标应根据不同地区确定不同的控制数字。⑵不要急于办大社，以按自然村单独建社为宜。⑶居住极为分散的山庄窝铺不宜建社。⑷牲口作价入社或合槽租用，均以迟一两年为好。⑸新建社暂不吸收富裕中农（个别自愿入社者可吸收），坚决不收地主、富农。为巩固与扩大合作社的阵地，必须改进领导方式与作风，以适应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要求，会议确定，要将整社建社与整党建党相结合，今年内必须完成落后村的改造和落后支部的整顿工作，同时完成一九五五年农村建党计划。

⑵　指中共山西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日关于发展、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主要内容是：㈠关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速度。一九五五年全省农业合作社由三万一千七百八十六个增至四万二千至四万四千个，入社农户由占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增至百分之五十一至五十五；一九五六年农业社增至五万二千至五万四千个，入社农户达到百分之六十七至七十；一九五七年农业社发展到五万六千至五万八千个，入社农户达到百分之七十至八十。㈡关于巩固农业合作社的计划。第一，确定今后每年要对已建的合作社进行三次整顿工作。整顿内容包括：1.根据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纯洁社的组织，调整社的领导成分。2.执行党的自愿互利政策，坚决纠正执行中的各种偏差。3.改进经营管理。4.几个村合办的大社，可改为以自然村为单位单独建社，各自经营管理。如多数社员不愿意分建，也可不分。第二，加

强生产领导，保证合作社不断增产。第三，认真做好合作社的收益分配工作。第四，进行大规模的训练工作，要求每年把老社的领导骨干普训一次。此外，在财力和技术上应给合作社以必要的援助。第五，一九五五年秋收前，全省派八千干部到一千一百个基点乡，以加强合作社，农村党支部和统购统销等工作的指导。

〔3〕　周，指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4〕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5〕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河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四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河南省委八月二十八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河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

中　　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四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周、伯达[2]阅后，即送刘朱陈邓[3]阅，尚昆[4]用电报即发，另印如前示。

毛　泽　东

九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中共河南省委在报告中说，省委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联系省委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的问题，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明确了对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对合作社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通过了全省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指标：即在今冬明春发展到十万个社，使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发展到十八万个，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会议还强调当前整顿现有农业合作社的重要性，并部署在今年九十月间第二次整顿，明年春夏第三次整顿。

⑵　周，指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⑶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⑷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四日、七日）

一

周、伯达、刘、朱、陈、邓、彭真、子恢[1]同志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如有不同意见，请少奇同志召集会议讨论二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发。

毛　泽　东

九月四日

二

照发

毛　泽　东

九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三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福建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⑶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福建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一）新中农中间出现了富裕中农（即上中农），这些人中间除了若干政治觉悟较高的人以外，其余的人暂时还不愿意加入合作社；（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原来就不富裕，有些则因为在土地改革的时候不正当地受了一些侵犯，这些人在经济地位上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大体相似，他们对于加入合作社一般地感到兴趣。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故在一切合作化还没有达到高潮，富裕中农还缺乏觉悟的地方，以首先吸收（一）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在毛泽东同志报告⑷的修正本中，对于中农只分为上中农下中农两部分，未提中中农，以免分得过细，不易区别。现在所说的下中农实际上包括原来所说的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中中农两个部分）；（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人加入合作社为适宜（并应依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吸收进来，首先吸收觉悟较高的分子）。对于凡在目前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即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则不要勉强拉入。目前许多地方

发生强迫富裕中农入社,目的在打他们的耕畜农具的主意(作价过低,还期过长),实际上侵犯他们的利益,违反了"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原则。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决不可以违反的。至于富裕中农中间资本主义思想浓厚的一些人,在目前一切合作社初办或者还不占优势的地方,不论是把他们拉进来,或者他们自己企图钻入合作社谋取领导地位(并非由于真正的政治觉悟),或者企图组织低级社如黑龙江双城县所发现的那样,对于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都很不利(个别公道能干政治觉悟高的富裕中农,当然不在此例),而一切合作社是必须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而目前团结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强迫他们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

此外,关于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的问题,还要明了几点。我们首先应当依靠党团员。我们区委以上的领导机关或者派到农村指导工作的干部,不去首先依靠农村中的党团员,而把党团员混同于非党团员群众,这是不对的。第

二，应当依靠非党群众中比较更积极一些的分子，这种人应当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例如一个二千五百左右人口的乡，应有这样的积极分子一百二十五人左右），我们应当努力训练出这样一批人，我们也不应当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群众。第三才是依靠一般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的广大群众。这个依靠什么人和如何依靠法的问题不弄痛楚，合作化运动就会犯错误。

中　　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已节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注　释

⑴　周，指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⑵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⑶　中共福建省委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时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意见：㈠关于农业社会主义高潮就要到来的问题。两年来我省通过贯彻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和巩固，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提高。根据最近调查，在先进地区，积极要求办社入社

的农户占尚未入社的农户的百分之二十四左右，我们计划今年秋天至明年春耕前发展一万九千个社，将入社农户发展到总农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因此，省委决定在全省区委书记以上的扩大干部会议结束后，各县再召开三级干部会，然后向群众作广泛的宣传动员，使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自觉而积极地行动起来，成批成组地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那时，我省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会到来。（二）关于阶级政策问题。自总路线宣传以后，由于我们依靠和支持贫农思想不明确，贯彻农村阶级政策有缺点，致使一部分合作社的骨干中富裕和比较富裕的农民占了优势，更严重的是一部分农村党支部的骨干中贫农没有占优势。由于我们两年来笼统地讲"依靠贫农（包括新中农），团结中农"，而没有把新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还不富裕的农民，和富裕的或者较富裕的中农区别开来，因而往往把极少数富裕或较富裕农民中的消极情绪，误认为是广大农民的情绪，对广大的贫苦或者很不富裕的农民的积极情绪，反而看得少或者看不到。这个问题如不具体地明确起来，今后也还会继续发生错误。我们的体会是：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还是按照中央规定的"依靠贫农（包括新中农），团结中农……"。但在具体执行中，应明确依靠对象为：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中中农，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团结对象为：新中农中间的上中农，老中农中间的中中农，富裕中农。根据这一认识及农村党员现状，我们在农村支部建设中，明确指出：⑴目前党员的主要发展对象是贫农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中中农，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及农村劳动人民（手工业工人等）；富裕农民暂不吸收。⑵支部领导核心必须保证贫农占优势，并积极培养吸收其他贫苦农民的成分到领导骨干中来。⑶对富裕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党员，应加强"不要忘本"的阶级教育。合作社两三年内发展的对象，也主要是现有的贫农和新中农中

间的下中农、中中农，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先把这几部分人中间的积极部分组织起来，并把他们培养提升到社的主要领导地位上来。

〔4〕　指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见本册第234——260页。

中央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

（一九五五年九月五日、七日）

一

周、伯达[1]同志阅后，即送邓小平[2]同志：

此件请小平商少奇同志，加以斟酌修改，印发各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用电报发去，须使各省市和地委于九月十一日以前收到为宜。

毛　泽　东

九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上海局、各省市委、各自治区党委、各地委：

（一）中央政治局决定召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议程有两项：

（甲）讨论和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

（乙）讨论和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代表选举工作的决议。

（二）六中全会是一次扩大的会议，决定由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各省委、各自治区党委、各大市委（沈阳、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和各区党委、各地委的书记（如果第一书记因病、因事不可能参加，则由第二书记参加或副书记参加），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农村工作部长，以及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应当参加的负责同志，参加此次中央会议。参加的同志是列席会议，有发言权，无表决权。出席和列席的同志共三百多人。

（三）会议由陈伯达同志报告农业合作化问题决议的意义和内容，由邓小平同志报告第八次党〔代〕大会问题决议的意义和内容。

（四）开会时间：十月三日到七日，共五天。

（五）一切出席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列席的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各区党委各地委的书记或副书记，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农村工作部长，均须于九月二十七日到达北京，向中央办公厅报到，以便有几天时间事先交换意见和阅读文件，并且参加国庆节观礼。

（六）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包括在内）在此次全会上的发言，另行商定。

（七）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区党委地委书记的发言请立即开始准备，均须写成发言稿。此项发言稿，上海局书记，各省委书记，各中央直辖市委书记和各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可以有四千字左右，合作化经验丰富的省份及大

省可以有五千字左右，小省可以只要三千字左右。各大市委区党委地委书记的发言稿可以有三千字左右，合作化经验丰富的地委可以有四千字左右，经验不足的可以只有一千至二千字左右。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至八左右，可以连带说一点粮食三定，社会镇反和建党整党等项工作的意见，连同召开八大问题，总共占字数十分之二至三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因为会期只有五天，不可能每人都宣读发言稿，准备以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地区宣读自己的发言稿，而将另一部分地区的发言稿印发给大家看，因此各地方同志虽然不可能都发言，但是每人都必须写好发言稿。此项发言稿，看其内容如何，准备略加修改（包括去掉合作化问题以外的某些部分），成为文章形式，在报纸上发表，借以交流经验，推动合作化运动。

中　　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稿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注　释

〔1〕　周，指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2〕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六日）

一

尚昆[1]同志：

此两件[2]，请于今日上午印好，下午即送在京各中委、候补中委、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各一份。并请告胡乔木[3]请他研究和主持修改示范章程。

毛　泽　东

九月六日〇时半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各同志：

送上农业合作化决议草案（陈伯达[4]同志起草）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廖鲁言[5]同志根据原草案作了修改）各一件，请于收到三日内审阅一遍，批注修

改意见，送还杨尚昆同志为盼！

中央办公厅

一九五五年九月六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⑵　指准备提交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讨论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

⑶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⑷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⑸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解放十一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达米扬诺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伏·契尔文科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明·涅伊切夫同志：

值此保加利亚从法西斯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十一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注视着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十一年来在光荣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使保加利亚人民获得了日益繁荣的幸福生活，并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祝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在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胜利。我们深信中保两国的兄弟友谊必将随着我们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而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刘少奇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央对浙江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和复电

（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浙江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浙江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浙江省委对于今春“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所做的批评也是正确的。因为这个错误方针是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向浙江省委建议的，因此应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主要责任。[2]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同志现在也已经认识了自己的这个错误，并且已经做了自我批评。

中　　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

二

浙江省委：

你们八月十五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已经收到，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并发给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参考。这里再说两点：㈠报告第六页第一行"唯心主义"，应改为"主观主义"；报告第九页第十一行"深入地批判与克服代表富裕农民的思想"一句，应改为"深入地批判与克服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以及代表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思想"。㈡同意你们将这个报告发到支部。

中　　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中共浙江省委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对浙江省农业合作化工作的检查。浙江省四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一九五五年四月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是错误的。当时的错误思想是：㈠认为"合作化发展太快了"，"这样快的发展，是超越了群众的觉悟水平，是造成农村紧张形势的根源；如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夸大了当时合作社内部存在的问题。（二）认为"发展这样快，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是无法巩固的。勉强维持下去要造成农业减产"，从而忽视了各级党委在试办中已取得的经验。㈢把新、老中农的各阶层不加区别地混淆起来，笼统地强调中农（包括新中农）的动摇性。这种错误的

分析，大大缩小了农业合作化的阶级基础。这些错误是唯心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是富裕农民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在党内的具体反映。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首先在于未能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调查、研究农村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思想动态，因而心中无数，只看到现象，看不到本质。其次，是把中央主管部门的指示误认为就是中央的指示。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在组织上是不够严肃的。二、浙江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和巩固的计划：从一九五五年秋到一九五六年秋以前，发展到六万五千个社，入社农户数达到全省总农户数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到一九五七年秋以前，发展到十万个社，入社农户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到一九五八年秋以前，采取以扩社为主、新建社为辅的原则，新建社约三千至五千个，使入社户数达到百分之八十五；到一九六〇年秋以前，使入社农户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基本上完成对农业的半社会主义改造。报告说，实现农业合作化全面规划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尤其是整顿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因此必须全党动员起来，从上而下，从内到外，深入地批判与克服代表富裕农民的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思想。

〔2〕 参见本册第260页注〔1〕。

对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格列则尔曼[1]教授关于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哲学教学经验给杨献珍[2]信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

很感兴趣地看了这封信[3]。

毛　泽　东

九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格列则尔曼，当时任苏共中央直属社会科学院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主任、教授。

〔2〕　杨献珍，原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身）副院长，一九五五年四月起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

〔3〕　指格列则尔曼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给杨献珍的信。信中说：我们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会议上讨论了你们寄来的材料：《马克思列宁学院关于第二部第二、三、四、五班的哲学教学总结》、《马克思列宁学院第二部哲学教学的经验》。我们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你们的经验。首先，我们认为最可宝贵的，是你们

反对学习当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和经验主义倾向的尖锐性。教条主义倾向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局限于死记和背诵概念与术语，而轻视与实践活动的联系；经验主义倾向则轻视学习理论的意义。理论与实践联系是你们的经验的最宝贵的方面。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同时这种方法能够以学员最容易了解的形式阐明理论原理。参加讨论的教研室的同志还着重指出你们对学员进行深刻的具体研究的重大价值。在指明世界观同实际工作、党的工作作风之间的有机联系，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方面，也很有价值。我们认为，把学习理论和实现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有机联系起来，也是一项重要的宝贵的经验。在讨论你们寄来的材料的时候，同志们也谈到苏联讲授哲学的经验。苏联研究和讲授哲学的历史向我们表明，第一，必须反对理论与实践脱离，这是当时苏联一部分孟什维克派唯心主义所固有的特点。第二，必须反对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简单化解释。在三十年代初期，我们党刊上曾展开过批评，批判了用一种给实际工作部门——例如渔业、钢铁工业——贴上辩证法范畴的标签的办法把辩证法直接附着到任何一个技术部门的企图。我们所讲的这种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简单化认识的危险性，在现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讲授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同志们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并不从来都是人们的世界观的缺陷造成的结果。当然，政治斗争中的错误策略，是具有它的理论根源的。但是，如果我们想从一切实际性质的错误当中引申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个人主义等等的结论来，那末，我们就有走上某种程度的简单化道路的危险。有一些同志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可能，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从中国哲学史中引用一些材料，这样做是有好处的。你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战略和策略跟对于你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的估价和分析结合起来，跟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们认为，正是这条道路才能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共产党的政策的有机联系开辟最宽广的可能性。这封信后来发表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上。

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九日）

一

即送刘、朱、陈、彭真、小平、子恢、伯达[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因甘肃催得很急，请各同志务于本日[3]白天看完，下午或晚上发出。

毛　泽　东

九月八日夜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甘肃省委八月二十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4]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甘肃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甘肃省委在自己的报告中还规定了多项具体的政策和办法，中央认为可以照此在甘肃实行。实行中如发现有需要修改的部分，可以在那时加以修改。全国各省，可以

根据自己的情况酌量采用。

中　　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九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⑵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⑶　指九月九日。

⑷　指中共甘肃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给所属并报中央的报告。报告着重谈了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情况和意见，检讨了今春以来在领导思想上出现的落后、迟钝和摇摆不定的问题，修正了合作社的发展计划。确定一九五六年春播前，全省新建社一万一千一百零一个，使入社农户达到全省总农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三；到一九五七年冬季前，发展到三万五千个社，入社户数达到百分之四十五以上。另外计划在一些老区试办几个畜牧业合作社和林业合作社，把几个基础较好的社试办成高级社，并从中摸索经验。为保证上述计划的完成，决定采取以下具体措施：第一，两三年内，先把老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三部分人中的积极分子，分批组织起来。第二，社务委员会要以老贫农中的觉悟分子为主，并吸收其他

两部分人中的觉悟分子组成。第三，合作社必须继续保持比互助组与单干农民增产。第四，坚决贯彻自愿互利原则，社内各种经济问题，必须按照这一原则合理解决。第五，要注意经常整顿，每年应整顿三次。第六，要大力解决会计问题，除积极培训外，可抓紧建立会计辅导员。第七，中央确定的每十个社应有一个办社专职干部，应迅速建立起来，必须注意质量，最好都是党员。第八，要积极发展常年互助组与互助组联组，为新建社奠定基础。第九，继续办好民族联社。第十，要注意办好常年民校和发展农村文化娱乐。第十一，调整组织机构，以便抽出更多的干部办社。第十二，抓紧整党建党，使之与整社建社相结合。第十三，落后乡也要建社，要结合镇反，整顿组织，发动群众，彻底把现有的落后乡加以改造。除了上述各条外，报告还对几个具体问题作了规定：㈠对老区、早期土改地区的地主富农，已经改变了成分，放弃了剥削，劳动守法，社员同意的，可经县委批准，个别吸收入社。但新富农绝不能吸收。㈡属于中农以下成分的阿訇，自己能够参加劳动的，可允许入社。㈢在老区的山区，和共同开垦的公荒或耕种的公地，群众不愿以土地作股者，土地均可不计股份，不分收益。㈣偏僻山区，居民稀散地区，可以办十户左右的小社，并可在若干小社之间建立联社，统一领导。㈤在不妨碍合作社总的生产计划原则下，应允许社员从事若干副业生产，增加一些零用收入，但不能提倡经营商业。㈥牲畜第一年还是不要入社。㈦对劳动组织，可根据条件，推行“死分活评”，临时包工，以至长年包工等逐步升级的办法。㈧对自留地，在一般地区应维持不超过百分之五的规定，自种饲草的地区，应适当宽留。

中央同意温州地委对农业合作化领导方针的解释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九月九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所规定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最近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是一致的，温州地委和浙江省委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是正确的。现将浙江两个文件[1]发给你们。当地如有同样问题发生，望照此作统一的解释。

中　　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九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刘、朱、陈、邓、伯达[2]阅，尚昆[3]用电报发去，另

印如前示。

毛　泽　东

九月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温州地委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领导方针的解释给浙江省委的请示报告和浙江省委八月三十一日关于同意温州地委的解释给中央、上海局并所属的电报。温州地委的报告说，我们在传达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时，一些干部把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中所规定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同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分割开来，普遍解释说，“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是合作社试办时期的方针，认为在目前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即将到来的形势下，在合作社大发展时期，已经不适用了，现在的方针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地委讨论后认为，这种把“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机械地分割开来，说成是两个不同时期的两个不同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认为“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是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逐步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总的方针，不但过去是正确的，而且现在也还是正确的；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是为了在目前新的形势下，更好地更具体地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其实质精神就是既积极而又稳步。浙江省委的电报中说，温州地委对于农业合作化领导方针的解释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既然已在温州地区的某些干部中发生，在全省其他地区的干部中亦可能发生。而这种错误的解释如不迅速澄清，就

会引起思想混乱，以至严重影响对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的正确传达和贯彻执行。各级党委必须引起严重注意，如同温州地委一样，立即在党委会议上认真研究，树立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方针的正确认识，并坚决反对在传达党中央指示时，夹带私货乱加解释的现象。

⑵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九日、十日）

一

刘、朱、陈、邓、彭真、子恢、伯达[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

毛　泽　东

九月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河北省委九月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的报告[3]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河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个报告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安徽省委早几年就注意这个问题了，只是在最近

的合作化报告中没有写上这一部分）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

中　　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⑵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⑶　中共河北省委的报告说，从今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省委召开了第四次党代表会议，着重讨论了我省今后三年农业合作化的规划和实现粮棉增产问题。确定全省今后三年农业合作化发展的计划是：今冬明春发展新社两万五千个至三万个，使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的百分之五十左右；一九五六年底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一九五七年底达到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五，一九五八年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实现全省农业合作化。今冬明春合作社的发展重点放在产棉区、市郊区和入社户数不足百分之五十的地区以及一些还没有建社的村。为了做好发展前的准备工作，我们强调要统一干部认识，批判与纠正右倾情绪，向基层党员、群众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分析农村的阶级、阶层情况，大量发展互助组，抓紧训练骨干，同时对现

有社认真地进行整顿与巩固工作，要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能够增产。会议还确定了全省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粮棉增产要求，并对过去两年来执行粮棉增产计划的情况进行了检查，研究了今后增产措施，一致认为，只要我们树立起坚强的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对农业生产长期打算，进行全面规划，从各方面挖掘潜力，实现增产是完全可能的。

在国务院关于召开粮食工作汇报会议的通知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日）

陈云[1]同志：

这种分批短期检查工作的办法[2]很好，请告一切财经部门仿行。

毛　泽　东

九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国务院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关于召开粮食工作汇报会议给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江苏、浙江、安徽、四川等九省人民委员会的通知说，为了迅速交流今年农村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工作的经验，及时指导运动的开展，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国务院责成第五办公室于本月十二日召开第一批汇报会议，由上述九省各派一名掌管粮食“三定”工作和熟悉情况的财粮贸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一人参加。汇报内容主要是各地“三定”工作的主要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偏差，比如定产粗糙，购销脱节，重购轻销，以及是否有因任务繁忙而将粮食工作滑过去的危险等。会期暂定两天，每省在会上汇报的时间为半小时。

对张云逸[1]来信的复信和批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日）

一

云逸同志：

八月十四日的信[2]收到。身体有起色，甚慰。我同意你的办法，即以休养为主，视身体情况许可，酌量看些文件，参加一些党的和国家机关的会议。为准备六中全会，这些天没有时间，候稍闲时再酌谈。

祝康吉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日

二

尚昆[3]：

复张信请转致。

毛　泽　东

九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张云逸，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共广西省委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这时因病休养。

⑵　指张云逸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四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我因病休养将有五年了，在这长期过程中，深赖主席及诸同志的关怀和照顾，现在我的身体基本上已恢复。三月间来京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给我的教育极大；近又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愈加兴奋。久病之后，加上年龄的关系，体力脑力虽不如昔，但应将现有的力量为党为人民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以遂初志，而尽己责。现据医生的意见及我的身体情况，可以一面休养，一面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较为适宜。我每天除做体力运动外，还能学习党的文件，有时亦参加党的会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等。这样，我觉得对身体和精神上都有益处，对工作亦可尽到一点责任。如主席有空时间，令我亲赴聆示亦得将我的情况面陈，尤为至盼。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决议草案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日）

刘、陈、邓、伯达[1]阅，请于本日阅完，尚昆[2]即印若干份（在北京发各中委和乔木、鲁言[3]、农村工作部若干同志），用飞机送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征求修改的意见，于月底来京参加中央全会时带来。

此件[4]我看可用，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5]。如伯达有不同意见，可于下午和我一谈。

毛　泽　东

九月十二日早四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刘，指刘少奇。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3〕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

秘书。鲁言，即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⑷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修正稿）》。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了这个决议。

⑸ 毛泽东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决议草案的修改，主要是在决议草案第九条的“现在各省还存在着一些土地改革不彻底的落后乡村，封建地主恶霸还在那里或明或暗地剥削和压迫农民群众”一句中的“现在各省还存在着一些土地改革不彻底的落后乡村”后，加写了“大约占乡村数的百分之五左右”十三个字。

关于了解河北省博野县农业合作社整顿情况的两个批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三日、十月二十三日）

一

此件[1]送河北省委林铁[2]同志阅。

钟顺通是我们这里的一个警卫工作人员。据他说，博野县有些合作社并没有认真去整顿。请省委注意此事，如果属实，应设法加以解决。

毛　泽　东

九月十三日

二

叶子龙[3]电话告林铁同志：

此信[4]收到了，谢谢他。

毛　泽　东

十月廿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指钟顺通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写的他的家乡河北省博野县徐家营、杜各庄、北延三个乡的农业合作社的情况汇报。汇报中谈到整社情况时说，这次整社只把财产、社名、社长、社的主要干部进行了登记，而社里存在的问题没有进行解决。农民要求，秋后一定要整顿农业合作社，整顿干部和党员，加强对农村干部特别是乡、村、社干部的政策思想教育。

⑵　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省长。

⑶　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⑷　指林铁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日关于检查博野县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在接到毛泽东批转的钟顺通写的情况汇报后，河北省委即派出工作组协同当地干部在博野县三个乡进行了检查，实际情况是：在今年四月间，省农林厅训练班学员一百多人曾到该县实习，并进行过一次十种表格登记，确实未解决多少问题。通过这次检查，存在的问题已引起博野县委注意，除检查时已解决一部分外，县委正结合今年建社，在继续进行整顿中加以解决。

关于对日本应明确提出外交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四日）

周总理阅，退毛。

对日本似应明确提出外交关系正常化作为第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日本方面已有广大舆论基础。虽然实际上日本政府现在尚不愿谈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此去压它。请加考虑。

毛　泽　东

九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一份关于日本有关人士对我外交部发言人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六日就日本政府提出所谓撤退留在我国大陆的日本人问题发表的声明的反应的材料上。

关于同意不再使用“中中农”一词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

小平、子恢、伯达、鲁言[2]同志阅，交杜润生同志处理。我认为小平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毛　泽　东

九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三日为转报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关于河北省对使用“中中农”一词的反映给毛泽东的信上。杜润生反映说，河北来电话询问，老中农中的中中农该划到下中农还是上中农？有的认为应划到下中农，因为实际情况是接近不富裕的人；有的认为宜划到上中农，理由是划入下中农把依靠范围扩大，会使该依靠的反而依靠不好；有的认为老中农整个阶层基本上属团结范围才是合适的。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了自己的意见：（一）中中农这个名词不要再用。（二）从老中农的政治经济情况看来，只宜把其中生活贫困的一部分划入下中农。（三）不宜把老中农的大部分划入下中农。（四）最重要的是：不要一家一家地去确定谁是上中农或下中农，事实上第一、二批加入合作社的一般只能是那些比较贫苦的部分（当然也有少数

觉悟较高的上中农），从对于愿否加入合作社的态度，就可以大体判明他是属于哪一类的。

〔2〕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鲁言，即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对邓小平[1]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说明稿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八日)

恩来同志阅，退小平办。

我认为可以照这样去讲[2]，只改了几个字。

毛　泽　东

九月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2]　邓小平在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稿着重对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未能早开的原因、八大的主要议程、代表的选举及召开的时间等作了解释。他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一九四五年召开的，到一九五六年召开八大，相距十一年。应当说，相距时间是很长的。但是，必须指出，八大迟未召开是有原因的。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这四年，我们正处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战争中；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这三年，我们全力贯注地进行了完成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极为繁重的巨大的工作，并且紧张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斗争。在这

七年中间没有召开党代表大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九五三年我们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一九五二年底，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考虑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就曾考虑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当时决定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接着在一九五三年下半年，经过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后，党中央察觉了高饶反党联盟，于是先后通过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今年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这个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显然地，在解决了高饶反党联盟这样重大事件之后，再来考虑召开八大问题，无疑是更为适当的。在这几年中，党规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宪法，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中，有了更多宝贵的经验；同时经过整党建党，审干，总路线宣传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一系列实际斗争教育，党的组织更加团结和巩固，党员的政治觉悟有所提高。所有这些，实际上对党的八大作了更为充分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今天看来，八大开迟了几年固然是个缺陷，但无论从政治上或组织上说，一九五六年召开八大将会开得更为完满一些。

关于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批语和书信[1]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一

⑴ 依地区排列，制一个目录（照每篇文章上的题目，不照原件每一省市的总目）。

⑵ 有几篇，要鲁言[2]查明材料来源，注明在每一篇的题目之下。

⑶ 校对一遍，文字上加以修改，使更加通俗化。

⑷ 几天内先印几份清样，至少毛、田、乔木、伯达[3]各一份，可能时再送刘、周、小平[4]各一份。

⑸ 争取月底或下月初印出四百本（样本）。

⑹ 用人民出版社印，告知尚昆[5]。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田家英同志：

最后部分付上，请付排。八月下旬的人民日报上载有

邢台地委书记写的一篇关于邢台地区合作化的文章〔6〕，请清出加印到河北省部分中去。此外，请商廖鲁言同志翻阅一下今年一月至九月的人民日报看有无好的（要是很好的）材料可用的。

毛　泽　东

九月廿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三

田家英同志：

请付工厂照改。每省的题目和每篇的题目，均照我在目录上改的去改正。其余的，今天可以不必送我看了。

迅速打出八份（加陈云〔7〕同志一份），最好于今日下午或晚上送交各同志。

你和乔木各分一半彻底地作一次文字上的修改，包括题目改得生动些，请告乔木。

毛　泽　东

九月二十七日四时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四

退田家英。

都看过。修改处，请令印厂照改。是从二一四页起，不

是从二〇四页起。二一四页以前的，请再送来看一次。二一四页以后的题目又作了一些修改，和昨天在目录上改的有些不一样，请注意。

毛　泽　东

九月廿七日

五

退田家英。

在题目和小题目上作了一些修改，请令照改。有几篇缺少刊物名称或未注明时间，应查补。按语因已改过，此份上面就未再改了。

毛　泽　东

九月廿八日

六

田家英同志：

请照修改的文字付印。

毛　泽　东

十月一日晚

五〇五页以下各页均已看完，付上。有两事请你注意：㈠ 目录要照每篇题目修改的文字加以改正；㈡ 按语修改处，要照着改在这一个本子上。十月四日要出书（样

本），务请赶快改好付印。

根据手稿刊印。

七

不要加引号，因为这是就人身的毒瘤说，对于合作社是比喻，不是直说合作社。

已删去。⑻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八

田家英同志：

送上到江西为止的大部分校样，请即付改排。每省市都将有按语的篇 幅 放在前面。改换了的题目，在目录上注意改正。只有个别的按语需要誊正付排，大多数都可以不要誊正。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五时

九

田家英同志：

已看过。请即付排，照此校正勿讹。别的同志，可以

不必送阅了，我也不再看了。

毛　泽　东

十二月廿日上午六时

书名叫作《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如果用这个名称，那就要把补选的那篇《五亿农民的方向》放在第一篇的位置，请酌定。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先后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当时书名定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二次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扩大范围重新编选，书名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本篇（一）至（七）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九、十月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写的批语和书信；（八）（九）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写的两封信。

⑵　鲁言，即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⑶　毛，指毛泽东。田，指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⑷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⑸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⑹　指一九五五年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刊载的中共邢台地委书记李吉平写的《把农业合作社办得更好更多是完全可能的》一文。后来这篇文章未收入《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⑺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⑻　田家英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昨夜十二点后，少奇同志处电话告我，少奇同志对《序言》有两处文字方面的意见：㈠ 第二页倒数第二行'好像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一句中的'毒瘤'二字，少奇同志主张加一引号。㈡第四页倒数第四行'这就使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他们的注意'中，少奇同志主张删去'他们的'三字。"毛泽东的前一句批语是针对第一条意见写的，后一句批语是针对第二条意见写的。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1]序言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

有些人说，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几年以来，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即在冬季是提倡发展的，一到春季就有人反冒进。这个说法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看见已经反过几次所谓冒进了。例如，一九五二年冬季有一个发展，一九五三年春季就来了一个反冒进；一九五四年冬季有了一个发展，一九五五年春季又来了一个反冒进。所谓反冒进，不但是停止发展，而且是成批地强迫解散（一名“砍掉”）已经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有些农民气得不吃饭，或者躺在床上不起来，或者十几天不出工。他们说：“叫办也是你们，叫散也是你们。”叫散，富裕中农高

兴，贫农发愁。湖北的贫农听了停或散的消息，感到"冷了半截"，有些中农则说，"等于朝了一次木兰山"（湖北黄陂县有一个木兰山，山上有一个农民高兴去朝拜的木兰庙）。

为什么有些同志会发生这种在常人看来完全不应该有的动摇呢？因为他们受了一些中农的影响。有一些中农，特别是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在合作化的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事是有抵触情绪的。这里关系到党在合作化运动中对于中农的政策和工作方法。许多经济地位较低政治觉悟较高的中农，主要地是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只要我们实行对于贫农和中农这两个阶层互相有利，而不是只利于贫农不利于中农的政策，加上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好的，他们就愿意加入合作社。但是有一些中农，即使实行这种政策，他们也还是想暂时站在社外，"自由一两年也好"。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合作化是要变更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和整个的经营方法，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他们当然要审慎考虑，在一个时期内不容易下决心。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去从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上解决问题，听了富裕中农一叫，工作中又有一些偏差，就惊慌失措起来，大反其"冒进"，动不动就要"砍掉"合作社，好像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人就会要死了似的。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有的，但是整个的运动是健康的。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欢迎合作社。一部分中农需要看一看，我们就应当让他们看一看。富裕中农，除了那些自愿的以外，更应当让他

们看的时间长一些。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他们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这样，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下面运动很广，上面注意不足，当然要闹出一些乱子来。我们看了这些乱子，不是去加强领导和加强计划性，而是消极地企图停止运动的前进，或者赶快“砍掉”一些合作社。这样做，当然是不对的，必然要闹出更多的乱子来。

我们现在编了一本书，叫做《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书里所收的，都是各省、市、区的实际例子，共有一百二十几篇。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一九五五年一月至八月的，一小部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从各省、市、区的党内刊物上取来的，有几篇是从报纸上取来，有几篇是下级党委或者工作同志向上级党委的报告，有一篇是请了一个合作社社长到北京谈话的记录。对于这些材料，我们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内容都照原样。在一部分材料上，我们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材料的作者所表示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是基本上正确的。读者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全国合作化运动的规模、方向和发展的前景。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运动是健康的。出乱子的地方都是党委没有好好

去指导。一待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跑上去做了适当的指导，那里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注　释

〔1〕　这是第一次编辑时的书名。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二次编辑后人民出版社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出版，书名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对中央农村工作部检讨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一

刘、周、陈、朱、彭真、小平、伯达、鲁言[1]即阅，退邓子恢[2]同志。

毛　泽　东

九月廿六日

请各同志即阅，子恢催要此件[3]。

二

有一些意见[4]，批在第三条、第五条和第六条上面。

毛　泽　东

九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三

这就说对了。[5]

四

为什么老是喜欢去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地去挫折它。⑹

五

这样讲不真实。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直到八月一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所以不是什么"对中央意见不够尊重"，而是根本不尊重。不是'不善于抓住任何一种微小的分歧意见'的问题，而是中央同志对你们的严重的批评，书记处和政治局对你们的提议的否决，都不愿意接受，何况你们部内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对你们有什么办法呢？你们会理睬这些小人物吗？这是同全国农村中大量的普遍的积极因素不能影响你们，你们只愿意接受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影响这一点直接地联系着的。这一点，在第三条内你们已承认了。这是应当好好地想一想的：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

影响了你们，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你们却熟视无睹，敢于抹杀，敢于“与此相反，不是去爱护而是去挫折它”，难道这是偶然的吗？⑺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朱，指朱德。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鲁言，即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⑵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⑶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日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向中央并毛泽东的检讨报告。这个报告中检讨的“错误”，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八一年三月九日《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中，已予以平反。参见本册第260页注⑴。

⑷　见本篇（三）（四）（五）。

⑸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检讨报告的第三条讲到“此次错误是领导落后于群众的右倾表现，首先是对于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不足”，“当时左右我们思想的正是占人口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富裕中农的动摇抵触情绪”。毛泽东在后一句旁划了竖线，并写了这个批语。

⑹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检讨报告的第五条讲到“与上述错

误相联系的就是对群众运动的成就鼓舞不够，保护不够，对今天的合作社没有像过去战争时期对待游击队一样的态度去爱护它”，“任何革命运动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必须爱护群众任何细小的革命积极性，而我们过去正与此相反，不是去爱惜他而是去挫折他”。毛泽东在这些文字旁划了竖线，并写了这个批语。

〔7〕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检讨报告的第六条中说：“在组织上也是有错误的。重大问题重大会议事先未经周密研究制出文件先请中央批准，对浙江省委农村部擅自发出坚决收缩的电报，对中央意见不够尊重，对主席初步发觉我们偏差时所提的警告未虚心体会等等，这是非常不应该的，而且是带有很大危险性质的分散主义错误。其次部内集体领导制度也不够健全，虽然会议结论及重要文件都经过大家磋商讨论，一般问题当时并未有原则分歧，但在收缩问题上部内有些同志是有不同意见的。如果能经常注意从正面反面考虑问题，善于抓住任何一种微小的分歧意见组织讨论，发扬集体智慧，就可以发现原则是非，就有可能避免犯错误，把事情办得好一些。”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这一段文字旁边。

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修正稿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退胡乔木[1]同志：

此件[2]看了一遍，觉了〈得〉改得很好，较原件大有进步。我只作了一些个别的主要是文字的修改，请你斟酌采用。

毛　泽　东

九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2]　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修正稿）。这个文件提交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讨论并原则通过，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由国务院正式公布。

征求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的意见的信和批语

（一九五五年九月三十日、十月二日）

一

政治局各同志：

送上陈伯达[1]同志准备在六中全会上讲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件，请即予审阅。如有修改的意见，请在文件上注明，于十月二日上午十二时以前送交陈伯达同志。

毛　泽　东

九月三十日

二

尚昆[2]同志：

此件请于今夜印十几份，明日上午即送交各政治局委员，外加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3]等人各一份。并请你

用电话催他们于十月二日上午十二时以前看完，批注意见直交陈伯达同志，二日下午或晚上必须印发到六中全会各同志。

我的短信，请附印在封面上，或另印一纸条。

毛　泽　东

九月三十日廿二时

三

尚昆同志：

此件请即付印，发给参加六中全会的各同志，每人一份，于明（三）日发到各人手里。

毛　泽　东

十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⑵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⑶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答谢苏联军事顾问团祝贺我国国庆的复信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日）

一

退肖向荣[1]：

照办。[2]

毛　泽　东

十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彼特鲁塞夫斯基上将、彼得洛夫上校、马里雅申上校[3]并转顾问团全体同志及其家属各同志：

当我国六周年国庆之际，承赐祝贺，并表达良好的愿望，谨致深切的谢忱。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和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及所有在我国工作的苏联顾问、专家热情、无私的帮助分不开的。对此，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祝彼特鲁塞夫斯基顾问团在京专家及其家属的身体健康、愉快。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日

根据审定的原件刊印。

注　释

〔1〕　肖向荣，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国防部办公厅主任。

〔2〕　这个批语写在肖向荣一九五五年九月三十日给毛泽东的信上。肖向荣的信，转交了苏联军事顾问团为祝贺我国国庆给毛泽东的信，并为毛泽东代拟了复信。

〔3〕　彼特鲁塞夫斯基，当时任苏联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彼得洛夫，当时任苏联军事顾问团政治处副主任。马里雅申，当时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党组织书记。

给周世钊[1]的信

（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

惇元兄：

惠书早已收读，迟复为歉。承录示程颂万[2]遗作，甚感，并请向曹子谷[3]先生致谢意。校额诸件待暇当为一书，近日尚未能从事于此。读大作各首甚有兴趣，奉和一律，尚祈指政。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4]。

顺问

近佳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1]　周世钊，字惇元，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2]　程颂万，湖南宁乡人，晚清诗人。

⑶　曹子谷，湖南长沙人。建国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⑷　赫曦台，是湖南长沙岳麓书院的附属建筑之一。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六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十月六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同志：

值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六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全德意志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六年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获得了重大的成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成为争取德国和平统一的坚强堡垒和维护欧洲和平和安全的重要因素。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德国人民为和平、统一、民主所进行的斗争和苏联为和平解决德国问题所作的努力。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发展和巩固！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中、在争取德国和平统一和欧洲集体安全的斗争

中获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刘少奇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十月六日

根据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邓小平[1]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五年十月七日）

一

退邓小平同志。

此件很好。作了一点修改[2]，请你斟酌。

毛　泽　东

十月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在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抱着右倾观点的共产党员中，确有一些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他们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者。他们中的多数则是反映富裕中农的思想。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三

一切在这个问题上犯右倾错误的同志，因为他们同党外的资产阶级思想有某些共同点，他们在资产阶级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就会丧失警觉，解除武装，不能理直气壮地驳斥资产阶级分子的谬论。例如在一九五三年，党内党外都有人叫喊所谓“农民苦”，而在一九五五年，党内党外又都有人叫喊所谓“农民生产情绪低落”，我们怎样能够希望这样的同志去理直气壮地驳斥党外的那些谬论呢？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⑵　毛泽东对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发言稿所作的修改，见本篇（二）（三）。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对彭真[1]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五年十月九日）

一

即退彭真同志：

此件很好。作了一点修改[2]，请酌定。

毛　泽　东

十月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农民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优点——这是他们基本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知道他们的缺点，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缺点；只有清醒地了解他们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这样两方面的情况，了解他们有保守性、但是他们的这种保守性又是可以被说服而加以改变的这样两方面的情况，才好帮助、教育他们，领导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进行自我改造。只有这样，才

能彻底巩固工农联盟，并且最后把工农融合成一体，建成共产主义的社会。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三

所谓“四大自由”，即土地租种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这是一种明显的资产阶级的纲领，这是一条明显的富农路线，这是同我们党的限制资产阶级和限制富农的路线完全不相同的。他们不是限制资产阶级和富农剥削自由，而是用法令允许资产阶级和富农可以进行无限制的剥削，并且加以提倡。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个最后彻底消灭农村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富农阶级的斗争，是五万万农民群众的一个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革运动，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地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因而可以彻底地消灭一切城市资本主义痕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⑴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⑵　见本篇（二）（三）⑷。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对袁希洛[1]要求去见蒋介石的信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二日）

刘、周、陈毅、彭真[2]阅，退毛。

此人要求之〈去〉见蒋，我说须得台湾许可才能去，因此他写了一封信[3]，似可听其发去。此人书生气很重，人是好人。

毛　泽　东

十月十二日

退徐冰[4]处理。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袁希洛，辛亥革命时的同盟会会员和临时议会代表，二十年代曾任江苏省启东县县长。建国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3〕　指袁希洛一九五五年十月给蒋介石的信。

〔4〕　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再次征求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稿的意见的信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

刘、周、朱、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康生、张闻天[1]各同志：

此件我已全文再看了一遍，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觉得整个文件是好的。请你于收到即看，于十月十六日下午二时以前看完，注明修改意见，交陈伯达[2]同志再作修改，于十六日下午交我为盼！

毛　泽　东

十月十五日零时十分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关于与越南商谈的我方代表团组成问题的批语[1]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六日）

刘、周、朱、小平[2]阅，退彭德怀同志。

已与彭商定，由彭德怀、陈赓、韦国清[3]三同志组织组织我方代表团为适宜，不要太多的人参加。粟裕[4]同志有病也可不参加。彭为团长，陈为副团长。

毛　泽　东

十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二日关于与越南代表团商谈的我方代表团组成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上。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韦国清，当时任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

〔4〕　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在刘澜涛关于华北各省市传达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报告[1]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九日）

刘、周、邓[2]阅，退刘澜涛同志。

（一）结论[3]已请陈伯达、田家英[4]二同志加以整理，经我看过，并送各同志审阅后，或者可以发出。（二）全会各人发言稿，拟编印一书，发至地级或县级（待商定），其中有子恢[5]同志的自我检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可以不要特别的传达了。（三）马明方[6]同志的发言宜作宜适当的修改，即请澜涛商明方一办，将修正稿交胡乔木[7]同志，因他在担任编这本书。

毛　泽　东

十月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刘澜涛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七日给毛泽东的报告说：自主席本月十一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了结论之后，华北各省市和内蒙五个小组都开了小组会，十四日又召集了地

委书记以上的同志开了汇报会。各省市对于传达问题很重视，希望印发主席结论的标准记录，早日公布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并提出了关于中央农村工作部所犯错误的内容传达到哪一级为适宜等问题。

⑵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⑶ 指毛泽东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后来这个结论整理稿没有正式发出。

⑷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⑸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⑹ 马明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⑺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对章乃器[1]来信的批语和复信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月）

一

刘、周、陈、邓、彭真[2]阅，退毛。

章乃器的信[3]。

毛　泽　东

十月十九日

陆定一、陈伯达[4]阅，退毛。

根据手稿刊印。

二

此信的主要目的在这一段，意思是说，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清规戒律太多了。[5]

三

周、陈、彭真、李维汉、徐冰[6]阅，退毛。

章乃器的信⑺，值得一看。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

乃器部长：

前后两信均已收到阅悉。感谢通知我这些情状和你的意见。干部中的片面观点总是会有的，问题是好好帮助他们学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方法。附件⑻还来不及看，待看后奉还。

祝好！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⑴ 章乃器，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粮食部部长。

⑵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⑶ 指章乃器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八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了他学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的体会。

⑷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陈伯达，当时任中

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⑸　这个批语是针对章乃器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八日给毛泽东信的最后一段写的。信中说："最后，提出一点建议：应该号召搞宣教工作的人们学习一些巴甫洛夫的基础知识，让他们从那里找到'与人为善'和'循循善诱'的科学根据，从而减少清规和戒律；同时还可以帮助他们正确地划清唯物和唯心的界限，以至更好地掌握辩证法则。"

⑹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⑺　指章乃器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我前些时向您反映的民建郑州市分会说当地私营工厂百分之百有违法行为的情况不准确，这是由于写稿人和签发人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热爱有欠缺，和对违法和不违法界限不清造成的。信中还说，下面有很多人在那里随便立法，他们提出的对工商界的要求，比对国家机关和国家企业的要求都高，如按这些要求衡量，我们粮食部也是违法的。

⑻　指章乃器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的信后附的关于教条主义在民主党派中的表现的专题反映等材料。

在马明方[1]关于西北各省讨论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刘、周、陈、邓[2]阅，退毛。

第二页末数行所提问题[3]，请小平、陈云同志注意。

毛　泽　东

十月廿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马明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指马明方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日关于西北各省座谈讨论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第二页末提出的两个问题：一、陕西省提出，训练办社干部的经费不够用，要求中央财政部批准在地方财政节余中开支。二、各省反映，现在下面的工作很忙，希望中央各部的会议能够有所控制。

必须认真克服“左”的偏向，使肃反运动健康发展[1]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一切确实发生“左”的偏向的单位就要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不要讳言“左”的偏向。同必须克服右的偏向一样，我们必须认真地克服“左”的偏向，才能使肃反运动自始至终地得到健康的发展。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转发卫生部五人小组关于检查中直第四医院肃反运动中所犯“左”倾错误与无组织无纪律错误给国家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并中央十人小组的报告的批语稿中加写的一段话。

关于召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彭真、邓小平〔1〕同志：

明日下午四时勤政殿的会集，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2〕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三百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

毛　泽　东

十月廿八日上午八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季节安排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江苏山东两个省委关于在发展了一大批合作社之后，如何完成整顿工作，使它们巩固起来，以利明春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1]，发给你们参考。两个报告中，特别是山东的报告中，有许多新的意见，值得各地注意。这两省（还有云南贵州和其他若干省份），由于在中央召集的今年五月十七日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之后，即在夏季（六、七、八月）做了准备工作（山东的准备时间较短，是一个缺点），所以它们在秋季的头两个月（九月和十月）即完成了一年的发展计划，它们准备在今后五个月内（今年十一月至明年三月），结合粮食三定、统购统销等项尚未完成的工作，大力完成整顿合作社的工作，这主要是建立和健全合作社的管理机关，建立和健全劳动组织，做好生产规划，做好生产工具和生产资金等项问题上的互利安排，制定社章，做好冬耕冬种（在南方）和积肥等项工作，以利明春的生产。在

这个季节安排问题上，中央认为这样做是很有利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可以这样做，都可以将合作社的建社整社工作提早一季，即夏季完成建社的准备工作，秋季完成建社工作，冬春两季完成整社工作。只要夏季的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妥贴，秋季的建社并不需要很多的时间，有两个月时间即可以完成。秋季剩下的时间和整个冬春两季，都可以做整社工作和其他工作。此事请你们加以研究，好好地安排一九五六年的工作。合作社大发展一批以后，区乡干部感到问题很多，担子很重，难于解决，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其实，这是不难解决的。其办法，就是在每一个乡里，抓住一个至两个问题最多的合作社，深入进去，加以研究，找出解决的办法，就可以引导该乡一切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在一个区里，只要整好几个合作社，就可以引导全区各乡的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在这里，建立乡、区和县的合作网的组织，是很有用的。这一点，请你们向县区乡干部加以强调。至于按照计划大发展一批合作社以后，及时地宣告停止发展，使运动转到整顿阶段，这是完全必要的。按照上述的季节规划，一年只有一季是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都是整顿和准备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也可以有一些零星的个别的发展，但是主要的发展时间只有一季，并且还只需一季中的两个月，这样就可以基本上避免由于漫无限制而引起的“左”倾错误。因为有了这样的有计划的发展和整顿，合作化的总的进展是好的，有一些县、一些区和一些乡，由于种种原因，合作社发展少一些，也就不要紧了，在以后几年中逐步地跟

上去就好了，不要怕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

二

即送刘、邓[2]先阅，再送周、朱、陈、谭震林、子恢、鲁言[3]即阅后，发。发后另印如前示。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江苏省委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给中央、毛泽东并中央农村工作部、上海局、各地委的报告和中共山东省委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给中央的报告。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鲁言，即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在陈嘉庚[1]来信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

周总理：

此件[2]阅后，请批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

毛　泽　东

十一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陈嘉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指陈嘉庚一九五五年十月九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我此次访问西北，于九月中旬再访延安，途经黄陵县时，顺便拜谒黄帝陵和轩辕庙，院中历代碑石犹在，千年古柏森森。惟庙宇木料多已腐坏，势将倾塌，庭中草地，多为农民耕种，陵山多处私坟如鳞。曾查询县长，据说自解放后至今未派人看管。保护山陵标语虽有，但徒有其名。黄帝陵乃我国民族历史遗迹，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历史文物及各处寺庙尚且保护修饰，而黄帝陵庙竟任荒废，抑或中央主管部门因偏僻未暇顾及。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六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
尼·亚·布尔加宁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致最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以万分欢欣的心情祝贺兄弟般的苏联人民过去一年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中所获得的辉煌成就。这些成就进一步增强了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鼓舞着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全世界人民为争取和平和进步而斗争的信心。

伟大的苏联是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一年来，苏联政府

为着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国际间的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努力，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最近苏联政府就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裁减军备问题和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接触等问题所提出的主张和建议，是符合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苏联政府所作的这些努力。

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坚强团结，对促进两国的共同繁荣和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起着日益巨大的作用。中苏两国经济文化的全面合作和苏联对中国的巨大援助，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愿中苏两国人民间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日益发展和巩固！

我们伟大的盟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六日　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七日）

一

可以照此发表。为了说清楚问题，在“第二”中加了几句[1]。

毛　泽　东

十一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社会的前途对于所有的人都好比早晨的太阳一样明白，而所有的人只要沿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前进，就都可以找到平坦而且广阔的道路。这种道路，对于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说来，就是放弃小私有制，接受社会主

义的合作制。对于资本家说来，就是放弃资本主义所有制，放弃对工人的剥削，接受社会主义的国有制。资本家真正放弃了剥削，以劳动为生，他们的社会成分就不再是资本家，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他们同工人、农民就没有矛盾了，他们就一身轻快不受社会责备了。这里说放弃剥削，不是说马上就要这样做，而是说现在要做思想准备，要在各城市的资本家的学习组织中逐步地适当地展开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如有疑问，要由适当的人加以解答，要准备经过公私合营、逐行逐业的改造，在条件成熟以后，最后达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工作是不是有问题呢？须知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也不会有经济危机的，只要不是懒汉，只要是愿意诚恳地工作的人，就永远不愁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做。因此，一切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爱国的工商业者应该认清这个前途，不但不要徘徊瞻顾，而且要主动地奔赴这个前途，这就是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就不至于皇皇无主，不至于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根据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已编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有毛泽东修改件）

三

乔木⑵同志：

此件看过，可用，可以不再给我看了。作了两点修改：

㈠在第五页倒数第七行“镇压的”三字不妥，改为“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分别地加以惩处的”；㈡在第六页末行，“私股”下加“按照具体情况适当地”九字，下接“分得”，此点请商陈云⑶同志，是否这样较妥当些。

毛　泽　东

十一月十七日夜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注　释

⑴　见本篇㈡，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⑵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⑶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信件和对决议草案的修改[1]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一

少奇、小平[2]同志：

送上《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十三份，请予审阅处理。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3]和我三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匆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十八日或十九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4]。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

农业合作化的情况，根本好转，估计明年一年，即可达到全国基本上初级合作化，即达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户入社，大大有利于农业生产。为了商量这个问题，附

带也谈一下工商业改造的问题，我召集了九个省的书记在这里开会一二天，情况容面报。

敬礼！

毛　泽　东

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四时

二

小平、尚昆[5]同志：

此件请将题目下括弧内的几句话[6]加上，即付排，先打清样七份，于本日下午分送刘、周、朱、陈云、彭真[7]、小平及我（送前标出修改的地方），再看一次，即可印发。

毛　泽　东

十一月廿九日上午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三

这个文件曾经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有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且作为草案通过。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

三反五反的斗争唤起了工人阶级的高度自觉，打退了资产阶级用“五毒”行为向国家机关和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使资产阶级原有的威风在绝大多数企业中扫地以尽；在一部分中小企业中资本家虽然还有一些余威，但是也比过去大大低落了；这就使得工人的监督从此在很多企业中逐步地建立起来，很多资本家实际上丧失了或者基本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

五

我国的工人阶级，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在同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了一个巩固的联盟的基础之上，又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另一个联盟。

六

但是这样做，并不是不要付出代价的。为了结成和继续这个联盟，为了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就需要对资产阶级偿付出一笔很大的物质代价。这就是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没收的政策，而是采取赎买的政策。这是从我们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中产生

出来的政策。这种政策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认为在某种条件下采取赎买政策，是可以允许的，是对于工人阶级有利的。我们的赎买办法，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在大约 10 年左右的时间内，工人阶级在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和国家的需要而生产的同时，也为资产阶级生产一部分利润。在企业利润的分配中，资本家所得虽然不到四分之一，但是如果以 10 年左右的时间计算，这笔利润的数目，就可能达到 20 亿左右人民币。这是逐步的赎买，不是一下子赎买。也不是由国家另外拿出一笔钱来进行赎买，而是由工人阶级在 10 年左右的时间内用给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的方法进行赎买。

七

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

八

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注意采取教育的

方法，组织资本家的学习。逐步地改造这些资本家，将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两种教育方法。三反五反的群众斗争，是一种教育方法，但是那是一种激烈的，不和资本家协商的方法。当着人民政权和工人阶级因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而给予他们这样一次重大的从外部强加的但是完全必要的教育之后，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抗已经基本上被打垮，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这就创造了一个使我们有可能采用另一种教育方法的条件，这就是采用讲演，上课，座谈会，学习班，以及在适当的时机引导资本家内部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方法，加强对于资本家的教育，使他们了解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不可抵抗的历史规律，了解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联系，了解时事和国家的政策，了解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他们唯一可能的出路。在对资本家进行教育的时候，引导资本家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种方法，值得特别注意。这个方法应当有领导地普遍地加以推广。根据许多地方已有的经验，由于我们国家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各种因素，再加上我们加强组织资本家本身的学习，就有可能促使资产阶级中间的进步分子的数量逐渐增加，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数量逐步缩小，并且大大减少许多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因此，在我国的条件下，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

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九

在三反五反的斗争以后，有些同志依然没有从三反五反斗争中取得教训，右的偏向还是存在的，有些同志仍然被资本家所腐蚀，丧失党的立场，同化于资本家，例如上海民用药厂和铅笔一厂所发生的一类事件，各地都可能找到一些例子。这是很不好的，必须教育他们，加以纠正。并且应当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三反五反以后，资产阶级已被孤立，心中惶惶无主，想靠拢我们，但是许多同志不了解这种变化，他们被三反五反的斗争吓怕了，因而对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存在着悲观主义，怕同资本家接触，有些人对资本家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有些人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不作全面分析，以为如果要说到资产阶级除了消极的一面之

外还有积极的一面似乎就要“伤害马克思主义”，他们也没有主张没收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又不相信党、群众和国家的力量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去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分子，或者只是企图用‘挤垮’的简单方法去回避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际任务，因此，放任自流，使自己陷于被动。这种倾向在表面上是‘左’的，在实质上却是右的。我们必须纠正这种错误的消极的偏向。不是放弃对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领导，而是应该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不是放任自流，若即若离，“敬鬼神而远之”，而是应该采取主动的积极的认真的态度，提出一整套关于改造私营工商业的宣传教育的办法，使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尽可能广大地和尽可能迅速地获得改造。这样做，反而可以较快地减少资本家的疑虑，把他们的心大体上安定下来，从而能够有秩序地加速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过程。当然，这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不会不遇到许多资本家的动摇、犹豫、埋怨、以及少数人的抵抗。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上述这种主动的积极的认真的态度和各项具体办法，将会削弱他们的动摇和抵抗，抽逃资金等项违法事件也将会减少。同时，由于我们采取了这种主动的积极的认真的态度和各项具体办法，又对一切同资本家接触的党员加强教育和监督，党内右倾的危险性也将较易于防止，被腐蚀的党员可能反而要少些。毫无疑问，我们的一切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一定会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起动员的作用，会使一切最顽固的资本家陷于孤立，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最

后的胜利。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改，主要有七段，见本篇（三）至（九），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文字。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这时他们和毛泽东一起在杭州。

〔4〕　《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修改后，追认为正式决议。

〔5〕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6〕　指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写的说明，即本篇（三）。

〔7〕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给黄炎培[1]的信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任之先生：

从医院给我的信[2]收到。尊恙全愈，极为高兴。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3]可以推广。因在旅行中，故未能早复。顺致

敬意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黄炎培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五日从北京医院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报告了他作前列腺手术后基本痊愈的情况，并说：由于住院，很遗憾地没有能经受怀仁堂主席的指示，然已从传达中知悉大概。我以为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丰收，不能看作一九五五年‘天’的恩赐，而必须承认是农民和农民领导者高度努力的结果。合作组织、

改进技术等，特别是一致的极度兴奋的工作情绪，这些都是“人”，不是“天”。农业增产，轻工业会相伴而增产，只有在生产激增，人们心情高度兴奋的时候，才有可能进一步促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3〕 指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至二十一日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十月二十九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国务院副总理陈云、陈毅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

对李维汉[1]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一

即送李维汉同志：

此件[2]可用。有一些修改[3]，请你考虑是否可用。

毛　泽　东

十一月廿二日下午十时半

根据手稿刊印。

二

经济部门不问政治工作，政治部门不问经济工作，或者彼此各不相谋地去作。这样，是不利于改造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

三

在公私合营形式上的企业改造，首先是资本主义所有

制在很大程度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企业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企业了。既已合营了之后，即转入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造，即是经营管理方法上社会主义路线同资本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在开头一定期间内，这是合营企业中主要的阶级斗争形式。

四

我们又必须耐心地教育资本家和资方实职人员，帮助他们逐步地认识两种制度和两种方法的好坏优劣，批判和抛弃旧的（即资本主义的），站到新的（即社会主义的）这方面来。这样，他们在企业合营的时候过了一关，又在这时过了一关。过了这两关之后，改造他们的问题就会更加顺利了。

五

落后分子固然受反动分子（即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的影响，但他们主要地要看中间分子的态度，如果人数众多的中间分子左转了，落后分子觉得自己快要孤立无援，也得勉强跟上去，我们应当使他们逐步地离开反动分子。

六

反动分子不仅是可以孤立的，而且也是可以分化的。反动分子中也有一些不同的情况，我们也应当分别处理。

七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经过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接受改造是由于大势所趋的形势和我们的政策所决定的，有一小部分人还一定要抵抗。

八

总结六年来改造工作的成绩，可以说，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已经接受了公私合营或者准备接受公私合营这样一种改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九

除了大约占百分之几的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以外，其余的应当肯定是可以用又鼓励又批评

的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批评就是对于他们的主要的斗争方式。当然还要加对违法者给予罚款等等一项斗争方式。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⑵　指李维汉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向毛泽东报送的准备在中央召集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发言稿。

⑶　见本篇（二）至（九），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给达赖喇嘛[1]的信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达赖喇嘛：

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种愉快的情形。何时再能和你见面呢？大概要再等三年，等到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那时你也许会来这里吧。你回去以后的许多活动，我觉得都很好。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不久可以成立，各族人民都会很高兴。西藏是在前进。当然不要性急，每年有一些进步就好了。希望你好好保养身体。我们这里的情形还好。也做了一些错事，正在批评改正。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是不富不强，希望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变为一个又富又强的国家。西藏是很有前途的地方，希望你们好好做去。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里附寄的西藏鲜花，我在这里也附寄一朵给你。希望经常看到你的信，随便写几句，不拘形式，就是好的。馀事请问张国华[2]同志。我已嘱咐张国华，叫他好好向你请教。

祝你健康、愉快！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廿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⑵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给班禅额尔德尼[1]的信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班禅额尔德尼：

你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三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感谢！你们那里工作有进步，听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和拉萨方面的团结日益增进和巩固，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地兴旺起来。此复。顺祝

健康！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给 周 世 钊[1] 的 信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惇元兄：

你的信好久就收到了，你的大作及附件各种都已读悉，极为感谢！嘱写的字至今未能应命。你那里还不那样急需吧，我想等一等再讲，如何？你下去跑没有？最好一年下去跑几次，每次两三星期也好。我最近出外跑了一次，觉头脑清新得多。你下去时，不只看学校，还可看些别的东西。再谈。顺问

教安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⑴　周世钊，字惇元，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毛泽东等祝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兼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
约·布·铁托同志：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国民议会主席
莫萨·皮雅杰同志：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秘书长
科查·波波维奇同志：

值此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英雄的南斯拉夫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中、南两国人民过去在争取自己祖国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就存在着深厚的友谊。中、南两国的友好合作自从两国外交关系建立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相信，这种友好合作还会不断地得到加强和发展。祝南斯拉夫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刘少奇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刊印。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一周年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
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贝哈尔·什图拉同志：

当阿尔巴尼亚人民获得解放十一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和政府致热烈的衷心的祝贺。

十一年来，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捍卫祖国独立和创造繁荣幸福的新生活方面已获得了光辉的成就。中国人民为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成就感到欢欣，并且祝中阿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团结在我们两国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刘少奇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刊印。

在中央关于传达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文件的指示稿上加写的话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四）在十二月下半月内，你们要召开一次关于研究改善我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会议，准备派人出席在明年一月十日左右由中央召开的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的意见和材料。此事将另有通知。

（五）中共中央七中全会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正本，日内即可送给你们。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关于西藏贸易等问题
给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信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刘、周、陈、小平、李先念、李维汉[1]同志：

和张国华[2]谈了一次，他提出对西藏贸易每年赔钱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元以求降低物价的计划，我认为很值得注意，似应实行他这个计划。因为我们去后，粮价涨了几倍，茶价涨了两倍，百货也涨了百分之六十，这对西藏人民是很不利的，长此下去，什么改革都谈不到，最后可能引起失败。因为西藏不能和新疆、内蒙相比，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要用特殊的办法解决。而目前行得通的办法，就是经济上长期补贴办法。西藏面积很大，地质形成较全国许多地方为晚，很可能有极大的地下蕴藏，有待将来开发，目前赔一点钱，将来会补偿的。此事请陈云、先念、小平研究一下，在张国华走前，在书记处一谈。

附件[3]请一阅。

毛　泽　东

十一月二十八日

阅后退毛。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⑵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⑶　指中共中央拟发的关于西藏目前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指示稿。

关于朱德、聂荣臻[1]访问民主德国、苏联时应注意事项的批语[2]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刘、周、朱、陈、邓[3]、聂荣臻阅，退毛。

朱德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去德、苏，在谈话时请加注意，不要涉及具体事项的承诺，如对方涉及，应推出两国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去商谈。此件所说情况，值得注意。

毛　泽　东

十一月廿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2〕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最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施托夫来信，提出向中国供应光学、医疗等仪器问题，看来信意思，可能是为这些产品在中国找市场。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答复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两个报告的电报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甘肃省委，并告青海、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福建、热河省委，及其他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看了甘肃省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关于批判“甘肃落后论”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报告和十一月二十三日关于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报告，我们认为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只是合作化的发展计划小了一点。你们说“目前全省积极要求入社的农民，占总农户百分之四十左右，加上已经入社的农户，则达百分之五十左右”，但是你们在第五次省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计划，则要到一九五六年才让“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百分之三十”，这是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的。你们应当改变这个计划，将已经积极要求入社占总农户百分之四十的农户，就在今冬明春分两批吸收入社，连同已入社的农户，共达百分之五十左右，这样你们就主动了，明年秋冬再来一个浪潮，就可以基本上合作化了。这样做对于用全面规划的方法去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是很有利的。根据中南、华东、华北、东北各省计算，除福建、热河尚未查明，湖南

据说只能于今冬明春完成合作化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以外，其余十六十省，合作化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大多数的省已经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少数的省也可以于于今冬明春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他们都认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即达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根据青海省委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报告，那里已经入社和酝酿入社的农户已达百分之五十，还有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可能。看来各省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今冬明春全国各省入社农户最少的能达百分之四十以上，则可以肯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这对今后的工作极为有利。你们的意见如何，请你们和各地委联系加以研究，电告为盼。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提纲[1]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一）思想落后于实际。

（二）全面规划（各个矛盾侧面）。

（三）向资本家学习（又教他，又向他学习）。

（四）两面性是否有变化。

（五）上海一封信。

（六）对工人和工作人员的教育，然后去教资本家（资本家现在有了主动）。

（七）领导小组和政协的学习委员会。

（八）市镇以上的会议。

（九）对知识分子的会议。

（十）自我批评。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这十条提纲，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李维汉送毛泽东参阅的国务院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关于全国五百人以上私营工厂合营情况的统计表上。

对中央关于进一步展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的指示草案的修改[1]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为了进一步展开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必须在私营工商业者中间培养出一批核心分子。每个大城市应当有几百个这样的核心分子，每个中小城市也要有几十个或者几个这样的核心分子。这些核心分子由于接受党的教育，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逐步地解决了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因此他们逐步地不怕共产了，能够团结在党的周围，向私营工商业者进行宣传和组织的工作。党委应当经过党委负责人、政府工作人员、统一战线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常教育这些核心分子，关心和指导他们的工作，切实解决他们的疑难问题和困难，经过他们去团结私营工商业者。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1〕　本篇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在接受民主德国驻华大使纪普纳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日）

毛泽东主席在致答词中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争取德国和平统一以及在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成为全德和平民主力量的坚强堡垒和维护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我相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德国人民争取德国和平统一的斗争必将获得更大的胜利。在这一斗争中，德国人民将继续得到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几年来，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亲密合作，使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这种全面合作和兄弟友谊，符合我们两国人民共同的利益和愿望，也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根据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新闻稿刊印。

中央对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的电报的复电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四日）

一

甘肃省委，并告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日的电报[1]收到。像甘肃那样的情况，我们的意见，今冬明春分作两批，共发展到占总农户百分之四十多一点，如果不勉强，则占总农户百分之五十多一点也可以，再多就可能不适合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再一个浪潮达到占农户百分之八十左右，那就很好。你们说“在今冬明春的一个浪潮中，发展到占总农户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数字太大，以控制在百分之四十左右、或五十左右为宜。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四日

二

刘、周、朱、陈、彭真、小平、子恢⑵即阅，尚昆⑶办。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指中共甘肃省委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日关于全省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电报。电报说，中央十一月三十日对我省农业合作化规划速度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我省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规划确实是小了，这说明我们的领导仍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现决定于十二月五日召开第六次省委扩大会议，准备来一次重新规划。根据目前各地合作化进展的实际情况看，在今冬明春的一个浪潮中，入社农户数发展到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是完全可能的。同时还必须注意，不但数量要多，而且质量要好。

⑵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⑶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一份反映江苏省农村宰杀耕牛情况严重的材料上的批语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四日）

陈云[1]同志：

此件中江苏一条消息[2]请看一下。这个问题，请在研究曾希圣[3]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全面地研究一下，替中央起草一个回答曾希圣并告各地的电报，能在一星期内外，写好发出就好。

毛　泽　东

十二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新华社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三九期上刊载的《江苏省农村宰杀耕牛现象严重》的消息。其中说，江苏省各地宰杀耕牛数字惊人，省畜产公司今年以来收购的牛皮出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据了解，这些耕牛中，有许多还能耕种。各地滥杀耕牛的原因是：一、农业合作社在处理耕牛入社问题上对老牛、小牛的报酬压得过低。二、对宰杀耕牛的审批制度执行不严格，很多地区经兽医检查后由区文书盖章就可以宰杀。三、价格政策有

毛病，死牛比活牛的价钱还高。

⑶　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在中央十人小组[1]关于目前肃反运动应注意事项的通知稿中加写的话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六日）

在肃反运动中，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重点对象，必须也同其他方面一样，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超过这个控制数字的，必须得到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批准，有些要得到中央十人小组批准。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参见本册第196页注[1]。

为第二次政治情报工作会议题词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六日）

实事求是，努力工作。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题词墨迹选》。

给翟作军[1]的信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作军同志：

　　十二月二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你大概已回太原去了。过去的信收到一点，似乎没有收全。我们都好。希望你好好学习。下次到北京的时候，早日通知（用电话和我的卫士长李银桥联系），可来一见。

　　祝好！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

注　释

　　〔1〕　翟作军，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期间曾在毛泽东处当警卫员、警卫班长。

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

刘、周、陈、彭真、胡乔木[1]即阅，于本日阅完，交尚昆[2]于本日晚上发出。另印如前示。

这个文件可用。作了一些修改[3]。最大的缺点是不通俗，只好将来再修改。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六日四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各党组，总政治部：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发给你们。请你们在准备召开的会议上加以讨论，征求意见，于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以前将应修改之点电告中央为盼。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三

这个草案发给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征求意见，然后在中央准备召集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开会的会议上再征求意见，加以修改，最后确定。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四

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应该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而应该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他们逐步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

五

为了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进一步地进行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以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六

过去六年中，各地党组织都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中央组织部应当负责订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年度计划和几年计划。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注　释

⑴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⑵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⑶　见本篇（三）至（六），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1]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年十一月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委书记和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十七条，中央认为应当于一月十日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一九五六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为此目的，请你们于接电后即召集所属各地委书记和一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一下：（甲）究竟是否全部可以实现，还是有一部分不能实现，实现的根据是否每条都是充分的；（乙）除了十七条以外，是否还有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丙）你们是否准备立即纳入你们的一九五六年计划内开始实行。以上各点，请你们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以前研究完毕，准备意见。

十七条内容如下：

（一）农业合作化的进度，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省、市、自治区（除新疆外）一级的指标以要求完成百分之七十五的农户入社为宜，让下面超过一点，达到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左右。

合作化的高级形式，争取于一九六〇年基本上完成，是否可以缩短一年，争取于一九五九年基本上完成。为此，需

要于一九五六年由县最好由区直接掌握每县或者每区办一个至几个大型（一百户以上的）高级社，再于一九五七年办一批，这两批应占农户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以为榜样。这样是否可能。又由小社变大社，规模如何。一乡几社，一乡一社，数乡一社，三者是否都可行。全国总社数三十万个，或者四十万个，或者五十万个，究以何者为宜。苏联是十万个社，我国是否以三十几万个社或者四十万个社为适宜。又先并社后升级为好，还是并社升级同时进行为好，还是先升级后并社为好。以上各点请你们一并加以研究。

（二）地主、富农入社，一九五六年是否即照安徽、山西、黑龙江等省的意见办理，即好的许其入社，不好不坏的许其在社生产，不给社员称号，坏的由社管制生产，凡干部强的老社均可这样做。这样做好处很多，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势必逼使那些目前还不愿入社的上中农勉强入社，并且让他们先入社，然后再让地富入社，才使他们面子上过得去。这样是否有利。或者推迟一年，即到一九五七年才行上述办法。这二者哪一种有利些，请加研究。

（三）合作社领导成分，由现有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占三分之二，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占三分之一。

（四）增产的条件：（甲）实行几项基本措施（内容待商，各地可以有些差别）；（乙）推广先进经验（每年收集典型例子，每省印成一本）。

（五）一九五六年一切省、地、县、区、乡都要做出一个包

括一切必要项目的全面长期计划，着重县、乡计划，于上半年完成初稿，下半年定稿，以后还可修改。计划包括的时间，至少三年，最好七年，可以到十二年。此事必须抓紧去做，你们是否已有布置。因为无经验，有许多可能是很粗糙的，但是必须争取少数县、乡的计划比较接近实际，以利推广。

（六）全面规划保护和繁殖牛、马、骡、驴、猪、羊、鸡、鸭，特别要保护幼畜。繁殖计划待商，请你们准备意见。

（七）同流域规划相结合，大量地兴修小型水利，保证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

（八）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

（九）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

（十）在十二年内，大部分地区百分之九十的肥料，一部分地区百分之百的肥料，由地方和合作社自己解决。

（十一）在十二年内，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八百斤。棉花、油料、大豆、丝、茶、黄麻、甘蔗、水果等项指标，请你们提出计划数字，待商。

（十二）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请你们研究各省区的地方病，哪些是七年内可以基

本上消灭的,哪些是要延长时间才能消灭的,哪些是目前无法消灭的。

(十三)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⑵。

(十四)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一千五百到二千个字。

(十五)在七年内,将省、地、县、区、乡的各种必要的道路按规格修好(其中有些是公路,有些是大路,有些是小路)。

(十六)在七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

(十七)在七年内,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

以上各项,请你们和有关同志加以研究,于一月三日以前准备完毕。中央可能于一月四日左右先行邀集若干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几天,为一月十日的会议准备意见。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印。
(有毛泽东手稿)

注　释

⑴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

⑵　一九六〇年三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说:“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对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文件集序言稿的批语和修改[1]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

胡乔木[2]同志：

此件[3]可用。即送刘、周、陈、彭真[4]阅后，由你处理。

毛　泽　东

十二月廿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一九五五年十月以后，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潮流是这样地勇往直前，以至一再地超过了任何最乐观的估计。成万万的农民涌进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到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经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全国农村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到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就可以实现。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化，也可

以提前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〇年完成。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已编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文件集》。

注　释

〔1〕　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文件集序言稿时改写的一段话，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3〕　指胡乔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六日代中共中央办公厅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文件集》序言稿。

〔4〕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九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1]。到现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

事情是这样的。这本书编辑了两次：一次在九月，一次在十二月。在第一次编辑的时候，收集了一百二十一篇材料。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大多数是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的，少数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当时，曾经将这些材料印成样本[2]，发给参加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地委的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意见。他们认为需要补充一些材料。会后，大多数省、市和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在这些材料中间，有许多反映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情况。这就需要重新编一次。我们从原有的一百二十一篇材料中删去了三十篇，留下九十一篇，从新收材料中选出了八十五篇，共计一百七十六篇，约有九十万字，成了现在这个本子。收在这本书里的所有的材料，都经负责编辑的几个同志在文字方面作了一些修改；对于一些不易看懂的名词，作了一些注解；又按问题的性质

作了一个分类索引。除此以外，为了批判某些错误思想和建议某些东西，我们还在一部分材料上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这些按语因为是在九月和十二月两次写的，故在语调上也就有了一些差别。

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〇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

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一切地方的党组识都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文盲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例如七年至八年）加以扫除。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总之，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

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这本书是给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看的。城市里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看看呢？不但可以看，而且应当看。这是新事情。如同城市里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事情一样，乡村里也在每日每时地发生着。农民在做些什么呢？农民所做的，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所做的有什么关系呢？为了要了解这些，看一看农村方面的材料是有好处的。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现在农村的情况，我们准备从一百七十六篇材料中抽出四十四篇，约有二十七万字，印一个节本，使那些不可能阅读全书的人也能够接触这个问题。

毛　泽　东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一月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刊印。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手稿）

注　释

〔1〕　见本册第395—398页。

〔2〕　即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样本）。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1]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

一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2]一文按语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作为本书的第一篇向读者们推荐。如像这篇文章在开头所描写的，自己不懂，怕人问，就“绕开社走”的人，现在各地还是不少的。所谓“坚决收缩”，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做法，也是“绕开社走”的一种表现。不过他们不是消极地避开，而是索性一刀“砍掉”（这是他们的话）多少个合作社，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罢了。他们手里拿着刀，一砍，他们就绕开麻烦问题了。他们说办合作社有怎样怎样的困难，据说简直困难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全国有不可胜数的事例驳倒了这一种说法。河北省遵化县的经验，不过是这些事例的一个。在一九五二年，这里的人都不懂得怎样办合作社。他们的办法就是学习。他们的口号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其结果就是“从不懂到懂”，“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河北省遵化县的第十区，十一个乡，四千三

百四十三户，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共计三年时间内，已经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阶段内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入社农户占全区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这个区的农林牧等项生产的产量，一九五四年同一九五二年比较，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

我们现在有理由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做，别的地方就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说不可以，你们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呢？我看只有一条理由，就是怕麻烦，或者爽直一点，叫做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就是"绕开社走"，就是书记不动手，全党不办社，就是从不懂到不懂，从少数人到少数人，从区干部到区干部。要不然，就是手里拿着刀，见了找麻烦的合作社就给它一砍。只要有了这样一条理由，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我们提出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样一些口号，并且赞成遵化县同志们所提出来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这个完全正确的口号。在遵化县，难道不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吗？难道不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吗？当然是的。这是不是有危险呢？是不是"冒进"了呢？危险在于"绕开社走"，这一点遵化县的同志们已经克服了。危险还在于借口"冒进"，大批地"砍掉"合作社，这一点遵化县那里并没有。所谓"合作社发展速度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这对于遵化县的情况怎样解释呢？

那里的群众就是要求合作化，那里的干部就是由不懂到懂。人人都有眼睛，谁能在遵化县那里看得出什么危险来呢？难道在三年内，由于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合作化，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这就算是一种危险吗？这就算是"冒进"吗？这就算是"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吗？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我们要感谢这篇文章的那位没有署名的作者。他用满腔的热情，生动的笔调，详尽地叙述了一个区的合作化过程，这对于全国的合作化事业会有不小的贡献。我们希望每个省、每个专区、每个县都有一篇到几篇这样的文章。

二　《勤俭办社》[3]一文按语

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现在有许多合作社存在着一种不注意节约的不良作风，应当迅速地加以改正。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可以找到一些勤俭办社的例子，应当把这些例子传开去，让大家照着做。应当奖励那些勤俭的、产量最高的、各方面都办得好的合作社，应当批评那些浪费的、产量很低的、各方面都做得差的合作社。

三　《五亿农民的方向》[4]一文按语

这个三户贫农的合作社，几个月以来，在全国农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河北省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英雄的合作社，给贫农壮了胆。

四 《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5]一文按语

这是一个很有兴趣的故事。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富裕中农的大多数，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对于合作化还是反对的，下半年就有一部分人改变了态度，表示要入合作社，虽然其中有一些人的目的是为了想要取得合作社的领导权而入社的。另一部分人表现了极大的动摇，口里讲要加入，心里还是不大愿意。第三部分人则是顽固地还要等着看。在这个问题上，农村的党组织对于这个阶层要有等待的耐心。为了建立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方面的优势，某些富裕中农迟一点加入合作社反而是有利的。

五 《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6]一文按语

这个材料有很大的说服力。使一个地方健全地达到合作化的问题是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只要我们党对于处理合作化问题上的各项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党当

着发动群众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义的或者简单从事的方法，而是向群众讲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并且达到增产，决不是很困难的。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村是老解放区，全村七十户，在一九五二年以前都加入了互助组，有一个强的党支部，又有王志琪那样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所以那个村，在一九五二年，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合作社，完成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在条件没有这个村这样完备的地方怎么办呢？那就是准备条件的问题，有几个月，或者一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可以了。条件可以边做边准备。办一些小社，就是替全村全乡全区的合作化准备条件。东川口这个材料还着重地说明了党支部如何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如何依靠群众的自觉自愿去建立合作社的问题。其中有所谓"倒宣传"，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关于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方面的问题，这个材料描绘了整个曲折变化的过程，结果出现了逐年增产的巨大的成绩。事实证明，这个合作社是健全的。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

六　《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7]一文按语

在中国，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九五五年，可以说是破除

迷信的一年。一九五五年的上半年，许多人对于一些事还是那么样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到下半年，他们就坚持不下去了，只好相信新事物。例如：他们认为群众中提出的“三年合作化”不过是幻想；合作化北方可以快一些，南方无法快；落后乡不能办合作社；山区不能办合作社；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杂居地区不能办合作社；灾区不能办合作社；建社容易巩固难；农民太穷，资金无法筹集；农民没有文化，找不到会计；合作社办得越多，出乱子就会越多；合作社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干部的经验水平；因为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政策，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了；在合作化问题上，共产党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合作化将出现大批的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出路。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许多。总之都是迷信。这些迷信，经过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六次中央全体会议（扩大）的批判以后，统统都打破了。现在全国农村中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群众欢欣鼓舞。这件事给了一切共产党人一个深刻的教训：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领导者们所想的同广大群众所想的，为什么那样不一致呢？以此为教训，那末，今后对于有相似情况的事件和问题，应当怎样处理才好呢？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

七　《不应当挫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胡乱地解散合作社》[8]一文按语

这样地去解散合作社是完全错误的，本文作者的观点是正确的。

八　《邢台县民主妇女联合会关于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妇女工作的规划》[9]一文按语

这一篇很好，希望各县民主妇女联合会仿照办理，县委应当在这方面加强领导。使全部妇女劳动力，在同工同酬的原则下，一律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个要求，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予以实现。

九　《推行"财务包干"的经验》[10]一文按语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这是执行勤俭办社这个原则的具体办法之一，一切合作社都可以仿行。

十　《勤俭办社，建设山区》[11]一文按语

这里说的是李顺达领导的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办了三年,变成了一个包括二百八十三户的大社。这个社所在的地方是那样一个太行山上的穷地方，由于大家的努力，三年工夫，已经开始改变了面貌。劳动力的利用率，比抗日以前的个体劳动时期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一十点六,比建社以前的互助组时期也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四。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已经由第一年的一百二十元，增加到了一万一千多元。一九五五年，社员每人平均收入粮食八百八十四斤，比抗日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七，比建社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一。这个社已经做了一个五年计划,实行三年的结果，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五年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点六。这个合作社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能够大量增产，为什么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不能够更加大量地增产呢？

十一　《平顺县的全面规划》[12]一文按语

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可以作每个县委领导合作化运动、生产运动以及其他工作的参考。这样的全县规划和全面地

叙述各方面情况的文章，我们希望每省都有几篇。

十二　《严重的教训》[13]一文按语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山西省解虞县三娄寺合作社，就是在巩固以后，因为松劲，几乎垮了台的。仅在那里的党组织批判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向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机，走上了继续发展的道路。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这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本

书所载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表现了这一个特点。

十三　《长治专区建立合作网的经验》[14]一文按语

合作网的办法很好，各地应当仿行。

十四　《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15]一文按语

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在目前至少是大多数的乡，都应当办起来，青年团的各级组织应当管这件事。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

十五　《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16]一文按语

这一篇很有用，可作各县参考。每县都应当在自己的全面规划中，做出一个适当的水利规划。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定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

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

十六 《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17]一文按语

这是一篇好文章，希望大家看一看。全国各县，都应当在一九五六年，由县委领导，做出一个全面规划，包括合作化，农、林、牧、副、渔业，工业或者手工业，水利，肥料，农具，改良耕作技术，改良种子，商业，金融，文化，教育，卫生等等各项内容。如果不能这样全面，首先抓住几个主要的项目也好。计划包括的时间，三年，五年，或者七年，都可以。如能计算到十二年（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当然更好。省应当督促所有专、县、区、乡都这样做，着重点放在县、乡。做得粗糙一点，也不要紧，可以在一九五七年加以修正，使之具体化和完善化。一九五八年再加以修正，使之进一步具体化和完善化。离山县委的这个水土保持规划，可以作黄河流域各县以及一切山区做同类规划的参考。

十七　《看，大泉山变了样子！》[18]一文按语

很高兴地看完了这一篇好文章。有了这样一个典型例子，整个华北、西北以及一切有水土流失问题的地方，都可以照样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并且不要很多的时间，三年，五年，七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问题是要全面规划，要加强领导。我们要求每个县委书记都学阳高县委书记那样，用心寻找当地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加以总结，使之推广。

十八　《必须向贪污、盗窃的犯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19]一文按语

这篇文章应当引起一切合作社的严重注意。合作社应当设立监察委员会，负责检查合作社的帐目，对于干部的贪污盗窃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党和团的支部应当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十九　《翁牛特旗建立了十二个畜牧业生产合作社，使牲畜大为发展起来》[20]一文按语

这一篇写得很好，可供一切畜牧业合作社参考。

二十　《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21]一文按语

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生产力一经进一步解放，生产就会有更大的发展。转变的时间，有些地方可能快些，有些地方可能要慢一点。大约办了三年左右的初级合作社，就基本上具有这种条件了。各省各市和各自治区的党组织对此应有研究和布置，在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两年内，应当在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办一些试点性质的高级社。现在办的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社，向高级社转变的时候，应当取得群众同意，把许多小型社合并起来成为大型社。如果能够在这

两年使得每个区都有一个至几个这样的合作社，并且在群众中显出它们比较初级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那就可以使以后几年的并社升级工作，获得有利的条件。这个工作，要同发展生产的全面规划配合起来。当着人们看见了大型社和高级社比较小型社和初级社更为有利的时候，当着人们看见长期规划将给他们带来比较现在高得多的物质和文化的生活水平的时候，他们就会同意并社和升级的。城市郊区的升级会要快一些。北京这个合作社的经验，可以作其他具有同类情况的合作社的参考。

二十一　《白盆窑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办成高级社的》[22]一文按语

这是两个由互助组直接进入高级形式、没有经过初级形式的合作社。有些条件适合的地方可以这样做。白盆窑的情况，使人看了高兴。其中有些经验，初级社也可以吸取。

二十二　《黄安坨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远景规划》[23]一文按语

这是一个十三年的长远计划，可以作为各地的参考。这种计划的用处，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

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这种计划只是一个大的方向，还要用每一个五年计划和每一年的年度计划去加以具体化。由于几个年度计划的实行，远景计划会要一再加以修改的。

二十三　《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24]一文按语

这是一个全乡一千多户建成一个大合作社（他们叫做集体农庄，即是合作社）的七年远景计划，可作各地参考。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长远计划，人们看一看它的内容就知道了。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二十四　《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25]一文按语

这篇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二十五　《合作社自己可以解决生产资金》[26]一文按语

这篇文章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情况，就是在筹集农业资金方面，农民群众中间有很大的潜在能力。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在资金方面，国家应当给予农民以必要的援助，例如现在已经设立的贫农基金和其他贷款。但是资金的主要的大量的部分，还是应当依靠农民自己筹集。而这是完全可能的。对于农民的潜在力量估计不足，是错误的。

二十六　《养猪模范的来广营合作社》[27]一文按语

这个经验值得推广。

二十七　《一个作风很好的合作社》[28]一文按语

这个合作社的领导干部，具有社会主义的工作作风，值得各地仿效。

二十八　《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29]一文按语

这种情况值得注意。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

二十九　《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30]一文按语

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

三十　《新情况和新问题》[31]一文按语

这个材料有用，值得普遍注意。这个材料描绘了农村中各个阶层的动态。贫农对于合作化最积极。许多中农要“再看一看”，他们爱“在外边松快”，他们主要地是要看合作社对于他们的生产资料入社是否使他们不吃亏，他们是

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许多富裕中农对于合作化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其中态度最坏的，在那里变卖生产资料，抽逃资金，组织假合作社，个别的甚至勾结地主富农做坏事。我们希望各地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们都注意观察和分析自己那里的各个阶层的动态，以便采取适合情况的政策。这个材料提到了注意合作社忽视互助组的错误倾向，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意见，这是正确的。“互助合作网”的办法是好的，就是要社、组兼顾，合作社要真正帮助互助组和单干户解决他们的当前生产的困难问题。贫农基金必须迅速发下去。现在还没有加入合作社的贫农，要告诉他们，他们什么时候入社，什么时候就可以取得这笔基金。

三十一　《双城县十一区的生产规划》[32]一文按语

黑龙江双城县的经验，值得各地注意。那里是以合作化和生产的全面规划著名的。

三十二　《关于财务管理》[33]一文按语

这个经验有用，各县可以仿照办理。

三十三　《安广县四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固定生产队和实行包工包产的经验》[34]一文按语

这篇文章提出的办法并不是很完善的，但是它把包工包产中的问题叙述得很有条理，可以作为各地的参考。

三十四　《秋收分配方案》[35]一文按语

这一篇写得很好，可作各地参考。

三十五　《一个被人讥笑的穷合作社》[36]一文按语

刘玉如领导的这个合作社，同河北省的王国藩合作社相似，都是因为穷，被人看不起，经过刻苦奋斗，终于战胜了困难的。各省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应当广为传播，鼓励大家。

三十六 《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37]一文按语

这一篇很好，各地均可仿照办理。“没有会计”，是反对合作化迅速发展的人们的借口之一。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问题是要迅速地加以训练，并且在工作中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的水平。以区为单位，由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就是这种提高会计员的文化、技术水平的好办法。彰武县第三区的会计网，不但帮助会计员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而且做了许多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县和区的党组织，都要注意去领导这项工作。

三十七 《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38]一文按语

这是一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可以从这里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

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三十八 《一个做了三年生产规划的合作社》[39]一文按语

这个规划有用，可作各地参考。一切合作社，均应做一个几年的生产规划，经过社员多次讨论，加以修改，然后付之实施。

三十九 《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40]一文按语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

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看了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高兴。教员是有的，就是本乡的高小毕业生。进度是快的，两个半月就有一百多个青年和壮年学会了两百多字，能记自己的工帐，有些人当了

合作社的记帐员。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四十　《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41]一文按语

这个合作社的经验也证明，适当地，不是过多地，并且是在启发社员有了充分的觉悟以后，对于贫苦社员又加以照顾等项条件之下，发动社员投资，解决合作社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是完全可能的。

四十一　《翻身合作社一年翻身记》[42]一文按语

河北有王国藩合作社，辽宁有刘玉如合作社，这里又有开明义的翻身合作社，它们都是十分穷困，被人讥笑，经过坚决奋斗，翻过身来的。这种英雄事迹，各地一定很多，希望每省写出几篇，广为传播。

四十二　《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43]一文按语

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

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

四十三　《只有合作化才能抵抗天灾》[44]一文按语

这是一个组织起来抵抗灾荒的生动的例子。一切劳动农民，不论是哪个阶层，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安徽繁昌县的中农柯先富和贫农柯百法的话，讲出了这个真理。

四十四　《一个值得推荐的模范支部》[45]一文按语

这个支部的工作路线，无论从啊一方面来说都是正确的，值得向一切在农村工作的同志推荐。这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方法。

四十五　《错误地解散十八个"自发社"的教训》[46]一文按语

这是胡乱解散合作社造成恶果的又一处教训。在这里是"勒令改组"，在浙江是"坚决收缩"，都是一些干部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之下做出来的。我们希望这种错误不

要重复了。

四十六　《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47]一文按语

这也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根据这两个合作社的情况，按照现在的生产条件，就已经多余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劳动力。过去三个人做的工作，合作化以后，两个人做就行了，表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多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哪里找出路呢？主要地还是在农村。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里还没有涉及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据一些机耕农场的经验仍然是有出路的，因为生产的范围大了，部门多了，工作细了，这就不怕有力无处使。

四十七　《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48]一文按语

那些不相信就一个一个的地方来说可以在三年内实现

初级形式的合作化的人们（三年合作化的口号是群众提出的，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批评），那些不相信晚解放区可以和老解放区同时实现合作化的人们，请看一看江苏省昆山县的这个乡吧！这里不是三年合作化，而是两年就合作化了。这里不是老解放区，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晚解放区。这个晚解放区，走到许多老解放区的前面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难道可以把它拉回来吗？当然不能，机会主义者只有认输一法。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哪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像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

四十八　《沂涛乡的全面规划》[49]一文按语

这个乡做了一个合作化、增产措施、水利、整党整团、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两年计划，全国各乡也应当这样做。有些人说计划难做，为什么这个乡能做呢？一九五六年，全国各县、区、乡都要做一个全面性的计划，包括的项目，比这个计划还应当多一些，例如副业、商业、金融、绿化、卫生等。哪怕粗糙一点，不尽符合实际，总比没有好些。一个省只要有一两个县、一两个区、一两个乡做出了相当像样的计划，就可以迅速传播开去，叫其他县其他区其他乡仿照办理。说起来怎样困难，其实是并不那么困难的。

四十九　《大社的优越性》[50]一文按语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一阅。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

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当然，这种合并要有步骤，要有适当的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

五十　《清除坏人，巩固合作社》[51]一文按语

这一篇所说的问题有普遍意义，值得大家注意。

五十一　《定额包工和评工计分》[52]一文按语

这一篇描写了一个合作社的劳动组织的曲折变化过程，可作各地参考。

五十二　《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53]一文按语

看完这一篇，使人高兴。希望大家细心一读。希望一切条件成熟了的初级社，将这一篇向社员们宣读一遍，并且加以讨论，以便动员他们高兴地并社升级。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五洞闸合作社所在的这个乡—— 慈溪县的岐山乡，有百分之

九十二的农户加入了八个高级社，谁说高级社那么难办呢？

五十三　《合作化模范邓家乡》[54]一文按语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广。一切完成了土地改革，建立了党的支部，又有了几批互助组的乡，只要按照浙江邓家乡的路线去做，一两年内就可以比较健康地比较少出毛病地在一个乡内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并且使生产提高一步。有些同志认为合作化很困难，一定要出很多毛病，因此畏缩不前，不敢推广合作化，只是因为他们脱离了浙江邓家乡的这样一种领导路线。而浙江邓家乡的路线（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全般），同河北遵化县第十区、安徽凤阳县城西乡的路线一样，不是别的，就是我党在全国一切群众工作中早已行之有效的一条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五十四　《合作网的制度应当在全国推广》[55]一文按语

这一篇很好，值得推荐。合作网应当普遍地建立起来，使之成为制度。现在小社多，乡有建立合作网的必要，区也应有合作网。将来中等社和大社多了，应当着重区的合作网。我们希望一九五六年，每区每乡都有合作网。那些全乡只建成为一两个大社的地方，乡当然不要建立这种网了。

五十五　《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56]一文按语

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是出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一件大事。过去，人们总以为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一定会过剩。原来已经过剩了，再来一个过剩，怎么办呢！在许多地方，合作化的实践，打破了人们的这种顾虑，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在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

女同工同酬的原则。浙江建德县的经验，一切合作社都可以采用。

五十六　《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订立结合合同》[57]一文按语

本书谈这个问题的只有这一篇，值得普遍推荐，文章也写得不坏。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订立结合合同一事，应当普遍推行。

五十七　《有成片林木地区的合作社必须迅速处理山林入社的问题》[58]一文按语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一切有成片林木的山区，或者非山区，都应该迅速地按照党的政策，处理林木是否马上入社和如何入社的问题。浙江省龙泉县凤鸣乡的做法，可供各地参考。

五十八　《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59]一文按语

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一

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的计划内，当然省、专、县、区都应有自己的计划。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某些青草，某些树叶，番薯藤叶和番薯都是饲料，不一定要精料，尤其不一定要用很多的精料。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某些少数民族禁止养猪的和某些个别家庭因为宗教习惯不愿养猪的，当然不在此内。发展养猪事业要有一套奖励办法，浙江省上华合作社的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五十九　《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60]一文按语

这里所说的问题，有普遍的意义。中农是必须团结的，不团结中农是错误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去团结中农，实现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当然只有贫农。在过去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这样，在现在向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两个革命时期，中农在开始阶段都是动摇的。等到看清了大势，革命将要胜利的时候，中农才会参加到革命方面来。贫农必须向中农做工作，把中农团结到自己方面来，使革命一天一天地扩大，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务管理委员会，如同过去的农民协会一样，必须吸引老下

中农和一部分觉悟较高的和有代表性的新老上中农参加，但是人数不可太多，以占三分之一左右为适宜。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新下中农）委员的人数应当占到三分之二左右。社的主要领导干部，除了老下中农和若干觉悟很高、确实公道能干的新老上中农仍然可充当以外，一般应当由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来充当。我们对于福建省福安县贫农领导的合作社和中农领导的合作社对于社会主义事业表示不同的态度这样一种情况,不应当看作是个别的现象，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六十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61]一文按语

这是一篇很好的整社经验，值得推荐。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做这种工作，出现了很多善于做宣传的农村工作同志。这篇文章里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帐”，就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

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它不是像有些不善于做宣传的同志那样，仅仅简单地提到所谓“或者走共产党的道路，或者走蒋介石的道路”，只是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而是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这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六十一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62]一文按语

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

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六十二　《白遗桥蔬菜生产合作社由初级社转到高级社》[63]一文按语

这个合作社的经验，不但城市近郊地区可以作参考，其他地区也可以作参考。

六十三　《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64]一文按语

这也是一篇很有兴趣的文章。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社会就是这样地每天在前进，人们的思想在被改造着，特别在革命高涨的时候是这样。

六十四　《诸翟乡把大批兼营小商贩的农民吸引到农业合作中来了》[65]一文按语

这个乡的情况也证明，发展多种经营，剩余劳动力就有出路了。现在的小社和初级社，对于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诸种生产资料，还是一种束缚。到了办大社和高级社的时候，就可以冲破这种束缚，而使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那时候，更加需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为城市和为乡村服务的许多大规模的事业。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整个生产力，首先是人力。

六十五　《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66]一文按语

这一篇也很好。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农业合作社也必须是这样。在这方面，必须进行许多工作。

六十六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67]一文按语

这一篇很好，可以说服很多人。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它坚决地支持贫苦农民的办社要求，在和富裕中农的竞赛中取得了胜利，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产，不到三年，实现了全村合作化。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他们应当如同安阳县南崔庄的共产党人那样，坚决地支持合作社。但是，可惜，并不是每一个乡村的党支部都是这样的。在这

种情形之下，就造成了混乱。首先是鸡毛能不能上天的舆论问题。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如果党不给以批评，它就会使许多贫农和下中农感到迷惑。其次，在干部方面，又其次，在物质力量例如贷款方面，如果都得不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合作社就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没有能够给贫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它们，上面还没有给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没有给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规划，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一九五五年，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调。有些要求入社，有些准备入社。最顽固的，也不敢议论鸡毛能不能上天的问题了。地主和富农，一点神气也没有了。这同人民政府惩治了一批破坏治安和破坏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也是有关系的。总之，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国的阶级力

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一九五六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

六十七　《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68]一文按语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六十八　《荥阳县胡乱地清洗社员犯了错误》[69]一文按语

这里说的，还不是解散整个合作社，而只是在一些合作社内清洗一部分不应当清洗的人，就已经造成很坏的结果。河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

六十九　《许昌地区的办社辅导团》[70]一文按语

这个经验很好，各地可以仿行。

七十　《襄阳县伙牌乡襄部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喂养和使用耕牛的经验》[71]一文按语

作者以很大的热情研究了这个问题，所述农民的意见也确是农民自己的语言，似乎作者是到了这个乡同群众一道研究过这个问题的。我们希望全国二百几十个地委的书记，每人都下乡去研究一个至几个合作社，每人写出一两篇文章来。

七十一　《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72]一文按语

这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的问题。各级党委和派到农村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们，对于这个问题都应当引起充分的注意。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贫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

能实现。许多同志不懂这个道理。他们认为建立贫农优势的问题，在土地改革时期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六十到七十的贫农，还没有上升为中农，而中农对于土地改革是动摇的，因此那时确有建立贫农优势的必要。现在是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过去的贫农大部分已经上升为新中农，而老中农的生产资料又多，没有老中农参加就不能解决合作社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因此，这些同志认为，现在不应当提出依靠贫农或者建立贫农优势的口号，认为这种口号会不利于合作化。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比较顺利地办到，否则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比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比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他们中间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变为新中农，但是他们同老中农比较起来，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以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较高的觉悟，他们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还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比较接近，而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不相同。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并

且选择他们中间觉悟程度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加以训练，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这不是在农村中重新来一次划分阶级成分的工作，而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党的支部和派到农村做指导工作的同志们应当注意掌握的一种方针，这个方针应当公开告诉农民群众。我们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不能入社，而是说等到富裕中农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他们表示愿意入社，并且愿意服从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领导的时候，再去吸收他们入社，不要为了打他们的耕牛农具的主意，当着他们不愿意入社的时候强迫他们入社。已经入社而愿意留下来的，继续不变。要求退社，加以说服，愿意留的，也可以留社。生产资料少一点也可以组织合作社，很多贫农和下中农组织的合作社已经证明了。我们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一个也不能充当合作社的干部。那些社会主义觉悟程度高，公道能干，为全社大多数人所佩服的个别的富裕中农，也可以充当干部。但是，合作社必须树立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在内，他们占农村人口的多数，或者大多数）的优势。在组织成分方面，他们应占三分之二左右，中农（包括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只占也应占三分之一左右。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方面，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须建立贫农优势。在中农占优势的合作社里，总是会要排挤贫农和损害贫农的利益的。湖南省长

沙县高山乡的经验，充分地告诉我们：建立贫农优势和由此去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如果不这样做，它的危险又会怎么样。本文作者完全懂得党的路线，做法也很对，先去完成紧急的增产任务，后去建立贫农的优势领导。结果，贫农扬眉吐气，中农也心悦诚服。本文作者还告诉我们一件大事，就是一个情况混乱的合作社，究竟是将它解散好呢？还是加以整顿，使它由混乱走到健康好呢？这样的合作社，整顿巩固是不是可能的呢？本文作者很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不应当去解散那些"三等社"，而应当去做整顿工作。经过工作，三等社是完全可以变为一等社的。这种经验，全国各地已经不少，不止是长沙县高山乡一处。

七十二 《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73]一文按语

这个合作社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各省应当在自己的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或者指示里面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目前，有许多合作社，缺乏帮助困难户的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根本排斥贫农，这是完全错误的。目前，政府已经设立了贫农基金，可以帮助贫农解决耕牛农具的困难，但是还不能解决贫农中有些户

缺乏劳动力的困难，也不能完全解决有些户在青黄不接时期缺乏生活资料的困难，这只有依靠合作社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解决。

七十三 《湘阴县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74]一文按语

这个县的情况也告诉我们，乡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是能够在乡村中找到出路的。一年内每个男女劳动力的工作日，依照经营方法的改进，生产门路的扩大，还可以增加，不是如同文内所说的男的一百多个工作日，女的几十个工作日，而是可以做到男的二百多个工作日，女的一百多个工作日，或者更多一些。这个数目，现在别处的有些合作社，已经做到了。副业必须要有确实的销路，不能盲目发展，这是对的。农村副业，就全国说来，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为农村服务的，但是必须有一个不小的部分为城市服务和为出口服务，将来这部分可能扩大起来。问题是国家要有统一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去掉盲目性。

七十四 《一个模范合作社》[75]一文按语

这一篇很好，可作各地参考。

七十五　《合作社议订社章》[76]一文按语

此件有用，可作各地订立社章的参考。

七十六　《我当大社主任的经验》[77]一文按语

不要以为只有老解放区才能大规模地推广合作化的运动，晚解放区则不能够，这样想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晚解放区同样可以大规模地推广合作化。就若干的县、区、乡来说，晚解放区可能和老解放区同时完成、甚至先期完成合作化，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事例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完全要看党的领导工作是否适当，是否少犯错误来决定的。这一篇是广东中山县的一个合作社主任的谈话记录，他谈的并不比一个老解放区的合作社主任差些，可能某些老解放区的合作社主任还比不上他。

七十七　《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78]一文按语

这一篇很好，可作各地参考。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

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量争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他们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要在青年人做出了成绩以后他们才心服，本文就是很好地描写了这种情况。对于保守思想当然是不应当妥协的，那末好吧，就来试试看，成绩出来了，他们也就同意了。

七十八　《琼山县第一区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自然灾害和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中巩固起来了》[79]一文按语

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最为有利这一点，海南岛红旗合作社的经验也是证明。这个大型合作社还只有一年的历史，它就准备转变为高级社。当然，这不是说，一切合作社都要照这样做，它们仍然要看自己的条件是否成熟，作出自己究竟在何时实行并社升级为宜的决定。但是，一般地说来，有三年时间也就差不多了。重要的是做出榜样给农民看。当着农民看见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比办小型社和低级社更为有利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并社和升级了。

七十九　《在和自然灾害作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边海乡农业生产合作社》[80]一文按语

这一篇写得有声有色，可以一阅。这个乡的党支部是一个模范的支部，它领导群众做了许多英勇的斗争，获得了群众的拥护。

八十　《台山县田美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开荒生产的经验》[81]一文按语

这是短距离的开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

八十一　《广宁县江[土布]乡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了多种经济，解决了很大的问题》[82]一文按语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值得各地研究推广。

八十二　《岑溪县莫寿全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合理化建议的经验》[83]一文按语

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经验，希望读者注意。

八十三　《四川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互助联组》[84]一文按语

在那些合作化进度较缓的地区，这个经验还是有用的。

八十四　《简阳县解放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的生产计划》[85]一文按语

在看过的许多生产计划中，这一个写得比较具体，又有清楚的说明，使人容易看懂。

八十五　《郫县犀浦和古城两个乡是怎样处理各项具体问题的》[86]一文按语

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各地可以参照办理。

八十六　《简阳县射洪乡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整顿财务管理工作的经验》[87]一文按语

这一篇叙述了九个合作社在财务管理上违反了勤俭办社的原则和犯了其他一些错误的情形，希望每个合作社引以为戒。

八十七　《宜宾县天池乡集体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计划繁殖耕牛的》[88]一文按语

这一篇很好，各地应当仿照办理。有些合作社，不但不注意繁殖小牲口，已有的小牲口也不重视，这是完全不对的。应当把一切大小强弱的牲口作出统一的安排，并且应当如同宜宾县那样有计划地繁殖小牲口。

八十八　《凤冈县崇新乡是怎样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89]一文按语

这个地方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个乡已经有了五个农业

生产合作社，七个互助联组，三个常年互助组，十四个临时互助组，占应当组织的农户百分之九十八点四。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以前，这个乡的党支部还没有把自己领导工作的重心放到互助合作方面来，党员对于领导互助组的工作怕困难。支部所依靠的不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而是工作组（似乎是上面派在那里的工作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党的农村支部处在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状态的，现在在全国还是不少的。不但支部，可能还有一些上级党委也是这样。问题就在于这一点。我国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能不能和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合作化运动能不能健康地发展，少出毛病，保证增产，就看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重心是不是能够迅速地和正确地转移到这一方面来。工作组是必须派的，但是必须讲清楚，他们去是为了帮助那里的党组织，而不是代替它们，使它们自己不动手脑，专门依赖工作组。贵州的这个乡，自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转变工作态度以来，只有五个多月，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不是依赖工作组，而是自己动手了，党员也不怕困难了。这种转变，首先要靠各级党委的书记——省委和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地委和自治州委的书记，县委和自治县委的书记，区委书记和支部书记，他们应当把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起来。怕麻烦，怕困难，面临着这样伟大的任务自己不动手，仅仅委托给农村工作部，或者工作组，这种态度，不但任务不可能完成，而且会要闹出很多的乱子来的。

八十九　《合作社的政治工作》[90]一文按语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向每个党和团的县委、区委和乡支部推荐，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本文作者懂得党的路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本书中所收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虽然如此，还有少数作品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仅仅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所以选录了。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九十　《必须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坚决的斗争》[91]一文按语

反革命破坏合作化运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

是贵州省都匀县第五区一个地方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别省的同类刊物上却很少看到这个问题的反映。在合作化过程中，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充分地注意这个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斗争的问题。要学都匀县这个区一样，在合作社内，以党团员为骨干，建立保卫组织。在县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党的区委，在研究了情况，向党内外作好了宣传和解释，提高了群众对于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警惕以后，对于混入合作社领导机关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加以审查、清洗和处理，是完全必要的。不过清洗的必须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真正的坏分子，不能将好人或者只有某些缺点的人说成坏人。处理尤其要恰当，必须经过县的批准。

九十一 《一个合作社的三年生产规划》[92]一文按语

这是一篇好文章，值得大家一读，可供各地合作社做长期计划的参考。本文作者说得很对："制订生产规划的整个过程，就是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斗争的过程。"保守思想现在几乎在到处作怪。为了克服这种保守思想，使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一切地方，一切合作社，都要做出自己的长期计划来。

九十二　《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工同酬》[93]一文按语

这一篇文章不长，容易看。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

九十三　《季节包工》[94]一文按语

本文作者说，自从县里开了合作社主任的联席会议以后，这个合作社，就在临时包工的基础上，实行了季节包工制。可见县的领导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全国二千几百个县的县级领导机关，密切地注意全县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情况，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及时地召开全县的合作社主任的会议，或者全县的重点合作社主任的会议，作出决定，迅速推行。不要等到问题成了堆，闹出了许多乱子，然后才去解决。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党的县委应当起主要的领导作用。

九十四　《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95]一文按语

这个材料指出了一个真理，就是任何情况混乱的合作社，都是可以整理的。因为加入合作社的都是劳动农民，不

管他们各个阶层之间意见怎样不合，总是可以说清楚的。有些合作社，在一个时期内，确是混乱的，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党的领导，党没有向群众讲明自己的政策和办法。“我们知道办社是好事情。但是办起社来，县委、区委、支部都不管我们了。恐怕是嫌我们寨子穷，吃不好，住不好，才不到我们社里来。”所谓混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得不到党的领导，当然就要混乱。领导一加上去，混乱就会立刻停止。这个材料又提出了一个在落后乡村是否可以建立合作社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本文作者所说的这个合作社，就是处在一个落后村。全国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落后乡村，我们应当都去建立合作社，就在建社的斗争中去消灭这些地方的落后状态。

九十五　《副业问题》[96]一文按语

此件说副业比较全面，并且是就一个县几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业说的，作者就这个县的副业作了总结性的叙述。建议各县也做出这一方面的总结。

九十六　《富民县的耕牛问题》[97]一文按语

这一篇较长，文字上也有缺点。但是作者以很大的热情研究了一个整县的耕牛的情况，政策观点也是对的。因此，收录了这一篇。

九十七　《长安县王莽村四个合作社组织联社的经验》[98]一文按语

这个经验有用，各地可以仿办。由党的区委和乡支部作出计划，将那些准备合并为一个大社的若干小社，先组成合作社的联社管理委员会，如同长安县王莽村那样，经过一个时期，再行合并。

九十八　《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99]一文按语

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读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别要请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许多地方党的领导还没有主动地赶上去。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级地方党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场，将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来，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

以赴的态度去领导这个运动。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九十九　《西乡县杨河坝乡党支部正确地领导了那里的互助合作》[100]一文按语

此件有用，一切农村的党支部都应当这样做。

根据几处地方的反映，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内设立政治副职，是必要的。各地都可以设立起来，在党支部的领导之下，专责进行政治工作。

在一个乡的范围内组织“互助合作网”或者如同陕西杨河坝乡那样组织“联社委员会”，看来是有益处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这样一点，即劳动人民中的缺点或者错误，是能够经过适当的政治工作使他们加以克服或者改正的。读者可以看到，这个乡经过政治工作，使那些做贩猪生意的社员不去贩猪了，使那些把公牛养瘦了的社员把牛养肥了。

一〇〇　《皋兰县的三年发展计划》[101]一文按语

这是一个很有兴趣的文件。不管这个计划里面的某些

部分在最近几年内是否有实行的条件（例如拖拉机站和教育经费等），也不管这个计划在计算方面是否精确，总算有了一个全县的全面计划，这个计划的总的精神是好的。其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部分，按照皋兰县的条件，可能是恰当的。这个农业合作化的计划是一九五四年制定的，具有很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那时候，“收缩”和“砍掉”合作社的歪风还没有发生，所以这些地方同志的头脑能够积极地想事情。我们建议每个县都在国家和省（区）的计划所许可的范围以内，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个可行的全面的计划，送省（区）批准实行。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对于各县做计划这件事，认为可以先由县级将计划的轮廓发给区乡，由各区乡依据县的计划和当地的情况，制定本区本乡的计划，报告到县，然后由县综合起来，再行决定县的计划。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好的。

一〇一　《酒泉县银达乡是怎样进行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102]一文按语

本书谈文化工作的篇幅不多，这一篇算是好的。为了要在七年内，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消灭文盲，适应农业合作化的迫切需要，一九五六年各地就要做出全面的安排，并且完成第一年的计划。

一〇二　《民和县第五区官亭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解决组织不纯的问题的》[103]一文按语

这一篇文字差一些，对于不纯分子的活动也缺乏详细的描写，但是内容重要，值得一阅。这个合作社看来是一个很大的社，可是“县区党委放松领导，支部也没有加以过问”，致使不纯分子混入社内，贫农和中农的关系也不正常。只是在县区党委注意了领导，并且依靠支部去发动群众，才把问题解决了。

一〇三　《改变贫农和中农的不正常关系，有步骤地做到使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上占优势》[104]一文按语

凡是存在着青海循化县这样一种情况的地方（这种情况是很多的），都要经过对于干部和群众的教育，有步骤地改变这种情况。

一〇四　《乡、村干部有能力领导建社》[105]一文按语

这是一篇好文章。看了这篇文章，使人懂得维吾尔族的农民，对于走合作化道路，积极性是很高的。他们为了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所需要的干部，也已经培养出来了。有人说，在少数民族中不能实行合作化。这是不对的。我们已经看到蒙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和其他一些民族都已经办了不少的合作社，或者是几个族的人民联合办的合作社，并且成绩很好，这就驳斥了那些对于少数民族采取轻视态度的人们的错误观点。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一月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刊印。其中：第十二、四十七、六十六、七十一等四个按语已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版）；第二、十二、六十六、七十一、七十七等五个按语已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版）；第一、二、四、五、六、十、十二、十五、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九、四十二、

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三、六十六、六十七、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七、七十八、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三、九十四、九十八、一〇四等四十三个按语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六十、八十九两个按语已编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全部按语均有毛泽东手稿。

注　释

〔1〕　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共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这里全部收入。一百零四篇按语中，有十九篇（即第七、二十四、三十一、四十、四十四、四十五、五十三、七十、七十二、七十六、八十二、八十五、九十、九十三、九十四、九十六、九十八、九十九、一〇二）是九月份写的，其他都是十二月份写的或九月份拟就、十二月份又对内容作了修改的。毛泽东还改拟或加拟了收入本书中的大多数文章的标题。为便于读者比较研究，我们分别在有关注释中作了具体交代。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为重印此书中的一部分按语，毛泽东于三月十九日写了一个说明。全文是："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

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⑵ 这篇文章原载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唐山农民报》。文中介绍的王国藩合作社，是河北省遵化县西四十里铺村党支部委员王国藩一九五二年秋发动本村二十三户贫农成立的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⑶ 这篇文章原载一九五五年五月四日《河北日报》，是《河北日报》记者王林写的。

⑷ 这篇文章原载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作者是李凯、庆琛。文中介绍的合作社，是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他们的带领下，到一九五五年秋，这个村入社农户已有二百八十户，占全村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生产也获得了丰收。

⑸ 这篇文章原载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作者是史树芳。文章介绍了河北省新乐县东王庄三户贫农、一户下中农坚持办社的事迹。

⑹ 这篇文章是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王志琪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谈话的记录整理稿，原题为《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如何达到合作化》，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

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

⑺ 这篇文章原题为《应当怎样认识工作薄弱的村的合作化运动》，是原中共热河省委工作组写的，载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承德《群众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

⑻ 这篇文章原题为《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贯彻积极领导的精神》，是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组写的，载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四日《河北建设》第二百九十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不应当挫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胡乱地解散合作社》。文章介绍了河北省沙河县曹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整顿的情况。这个社是一个有三百二十三户的大社，由于对入社时土地的产量，耕畜、农具的价格和劳动力底分的评估不合理，特别是耕畜作价偏低，管理不善，致使一批耕畜先后死掉。一九五五年一月，沙河县委农村工作部派人前往该社帮助整顿，鼓吹"出社自愿"，主张由大社分成小社，几乎使整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垮散。文章认为，沙河县委农村工作部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违背了"积极领导"的精神。整顿合作社必须从积极方面着眼，爱护群众的热情，克服消极因素，反对在困难面前消极畏缩。要依靠和发动群众来解决障碍合作社巩固的问题，放弃领导就要犯"一哄而散"的错误。

⑼ 这个规划是河北省邢台县民主妇女联合会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制订的。主要内容是：一、根据县委对全县合作化运动的具体规划，针对各阶层妇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思想情况，采取各种方式，经常地反复地向她们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以逐步提高她们的觉悟，跟上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二、从发展生产和多方面增加收入出发，有计划地合理地安排和使用妇女劳动力，以便发挥妇女的潜在力量。三、提高妇女在农业和副业生产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发动

妇女参加农业技术改革运动，以便适应分工分业的需要。四、为了更好地推动妇女参加生产，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应注意发展托儿互助组织。五、有计划地培养大批妇女领导骨干。六、整顿和健全乡的妇女代表会议，使它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在推动妇女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

〔10〕 这篇文章原题为《通县土桥乡爱国农业生产合作社推行“财务包干”的经验》，作者是蔡圬佃，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推行‘财务包干’的经验》。文章介绍说，河北省通县土桥乡爱国农业生产合作社，针对合作社刚成立时公共财产浪费严重、财务制度混乱的情况，决定各生产队对财务预算的各项开支进行承包，超支的由本队负责赔偿，节余的抽出一部分进行奖励。推行财务包干以后，加强了各队和社员的责任心，充分发挥了财务人员搞好财务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物资的利用率，显著地节省了开支。

〔11〕 这是中共平顺县委书记李琳和马明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写的一篇调查报告。报告介绍了山西省平顺县西沟乡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在社长李顺达带领下，由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艰苦奋斗，改变山区贫困面貌的事迹。

〔12〕 这篇文章原题为《平顺县胜利地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也是中共平顺县委书记李琳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平顺县的全面规划》。

〔13〕 这篇文章原题为《三娄寺农业社的教训》，是《山西日报》特约通讯员阎广洪写的，载一九五五年二月一日《山西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严重的教训》。

〔14〕 这是中共山西省长治地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三月

二十二日关于长治地区互助合作网的建立和整顿情况的综合报告，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拟题为《长治专区建立合作网的经验》。报告说，建立以中心社为核心的互助合作网，是我区领导合作化运动的一条经验，自一九五四年冬以来，共建立了一千一百四十九个合作网，每个网一般有六至八个社，每个社又联系一到两个互助组，并固定地帮助个体农民。这样，就把全专区八千多个农业合作社、一万五千多个互助组和五万多户个体农民联结起来，互相帮助，共同前进。

〔15〕 这篇文章原题为《解虞县西张耿乡的农业技术夜校》，是青年团晋南地方工作委员会一九五五年五月十日写的，载《学习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一号。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文章介绍了山西省解虞县西张耿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帮助社员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在党、团支部支持下，成立乡的农业技术夜校的情况。这个夜校采取“少讲，讲清，地里做什么就学什么，学了就用”的教学方法，受到了学员们的欢迎。学员们从课堂回到田地后，又把自己学到的技术和知识教给那些没有参加学习的社员，使农业生产技术在全社得到迅速推广和普及。

〔16〕 这是中共山西省汾阳县委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关于挖掘水利潜力，大力兴办小型水利，扩大灌溉面积，争取在一九五七年实现每个农业人口一亩水地，保证农业增产的规划。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拟题为《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

〔17〕 这篇文章原题为《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中共离山县委书记刘耀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依靠合作

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

〔18〕　这篇文章原题为《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是中共阳高县委书记王进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文章介绍了山西省阳高县张风林、高进才两位农民治理大泉山的事迹。他们通过挖坑、开渠、培埂、堵沟、植树等方法，治水、用水，不仅使大泉山面貌改观，而且土地质量有了提高，自己的生活也逐步富裕起来。

〔19〕　这篇文章原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向贪污、盗窃的行为进行斗争》，是中共山西省雁北地委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写的，载中共山西省委主办的《前进》第一百九十五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必须向贪污、盗窃的犯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文章介绍说，雁北地区在一九五五年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发现不少合作社的干部有贪污盗窃等违法行为。为此，地委决定：各县在整顿农业合作社的过程中，必须把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按照财务管理工作的状况，进行分类排队，限期结清帐目，做到社社有收支预算，帐目日清月结，财务公开，由社员监督；对于犯有贪污、盗窃等失职行为的干部，要查清事实，根据情节轻重和性质，分别进行处理。

〔20〕　这篇文章原题为《翁牛特旗畜牧生产合作社是怎样建立和发展的》，是原中共热河省委办公厅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翁牛特旗建立了十二个畜牧业生产合作社，使牲畜大为发展起来》。文章介绍说，翁牛特旗在试点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十二个畜牧业生产合作社，广大贫困和不富裕的牧民，从实际中体验到牧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纷纷要求入社。合作化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

〔21〕　这篇文章原题为《远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过渡到了高级社》，是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互助合作组写的，载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文章介绍了北京市郊区东冉村乡远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巩固到发展，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及其经验。

〔22〕　这篇文章是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十月写的。文中介绍了北京市郊区白盆窑乡党支部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直接创办高级社的经验。他们根据全乡各户农民耕地数量差不多，土地分红或不分红对收入影响不大，而劳动力却十分短缺的情况，经过酝酿和发动，在三个互助组的基础上，直接建立了两个完全按劳分配、土地不分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而提高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使社里的生产和社员的收入都有了显著提高。

〔23〕　这篇文章是北京市农林局规划工作组一九五五年十月写的。文中介绍了北京市京西矿区黄塔乡黄安坨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制订的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七年的长远发展规划，包括发展畜牧业、林业、农业、副业等的计划和措施以及改善社员生活的具体措施。

〔24〕　这篇文章是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北京市农林水利局联合规划工作组写的，载一九五五年十月十日《北京日报》。文中介绍了北京市南苑区红星集体农庄的七年规划方案（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二年），规划包括土地利用、发展养畜业、培养技术干部和文化福利设施等四个方面。

〔25〕　这篇文章原题为《巩固社的关键——记张郭庄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作者是沙军，载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北京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

《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文章介绍了北京市丰台区张郭庄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紧紧抓住政治思想领导这一重要环节，使该社逐步由小到大、由低到高迅速发展起来的经验。包括上级党委的领导、教育社员关心生产、反对资本主义倾向、民主办社、坚持党的政策和深入群众等方面。

〔26〕 这篇文章原题为《丰台区三路居蔬菜生产合作社的生产资金是怎样解决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写的，载一九五五年三月十日编印的北京《郊区农村工作》第一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合作社自己可以解决生产资金》。

〔27〕 这篇文章原题为《来广营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把猪养好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互助合作组一九五五年十月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养猪模范的来广营合作社》。文章介绍了北京市东郊区来广营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养猪场的经验，主要是：（一）挑选好的饲养员。（二）有一套科学的养猪方法，即：⑴喂猪要定时定量；⑵勤扫圈，勤洗猪食槽；⑶消毒隔离，定时防疫；⑷实行先进的繁殖方法；⑸细心喂养小猪。（三）要不断地和一切不相信科学的思想和做法进行斗争。

〔28〕 这是天津市南郊区工作组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二日写的调查报告，载中共天津市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印的《生产合作参考资料》第四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拟题为《一个作风很好的合作社》。文章介绍了天津市南郊区会馆乡前营村迎新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办社的事迹。这个社的干部公道能干，作风民主，关心群众的困难，不仅使合作社生产有较大发展，而且带动了互助组，团结了单干户，为合作社的扩建打下了基础，加

快了合作化的进度。

〔29〕　这篇文章原题为《西郊王顶堤乡王顶堤村几年来的变化情况和应该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中共天津市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九日编印的《生产合作参考资料》第二十五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文章说，王顶堤村在基本实现合作化以后，由于生产发展，个人收入增多，如何支配手中的钱，成了大问题。该村虽然在扩大再生产方面做了些工作，但生活提高的速度比生产提高的速度要快，铺张浪费现象日益严重，而政治思想工作赶不上形势的需要，使得不少农民变懒了，泡病号的也多了。党支部在向农民进行教育的时候，感到办法不多。

〔30〕　这篇文章原题为《津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是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工作组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日写的，载中共天津市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三日编印的《生产合作参考资料》第二十四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

〔31〕　这篇文章原题为《今年互助组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黑龙江省讷河县平房、双泉、五福三个村互助组情况调查》，作者是张殿举、傅雁龙、郝景民、孙荣胜，载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新情况和新问题》。

〔32〕　这篇文章原题为《双城县十一区生产规划的经验》，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组一九五五年二月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双城县十一区的生产规划》。双城县十一区规划的内容包括：一、提高现有耕地

面积的产量；二、增加生产内容，扩大生产范围；三、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计划，准备在办好现有七十八个合作社的基础上，到一九五六年，全区的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一十七个，使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

〔33〕 这篇文章原题为《中共拉林县委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财务管理工作的领导》，是中共拉林县委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关于财务管理》。文章介绍了黑龙江省拉林县几年来在合作社的财务管理方面取得的几点经验：⑴ 贯彻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加强对三员（会计员、保管员、饲养员）的政治教育工作。⑵ 发动全党，加强财务管理工作。⑶ 按照不同季节，抓住不同环节，进行对财务工作的指导。⑷ 建立民主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三员之间的监督制度。

〔34〕 这篇文章原题为《安广县四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固定生产队、固定土地、固定耕畜农具、常年包产、短期包工、超产奖励"的经验》，是中共安广县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安广县四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固定生产队和实行包工包产的经验》。文章介绍的包工包产的经验是：一、由合作社理事会和各生产队订立"包工合同"，并在队内实行"小包工"、"死分活评"的记工方法，鼓励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二、及时发现和解决实行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三、各生产队实行劳动自报、满勤奖励、零活计件和短期包工的办法。四、加强队内的计划管理。五、加强思想教育。六、开展生产竞赛。

〔35〕 这篇文章原题为《永吉县达屯村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制订秋收分配方案的经验》，是中共吉林省委农村工作部写的，载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吉林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

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秋收分配方案》。文章介绍了吉林省永吉县口前区达屯村在秋收预分方案制订过程中，认真地估算秋后产量，结清劳动帐目和财务收支帐目，使社员心中有底，然后让社员反复讨论分配方法，对原来社章规定的分配方法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修改，最后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确定分配比例。分配方案公布后，鼓舞了社员们的劳动热情，也提高了社干部的信心。

〔36〕 这是中共辽宁省锦县县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通报，原题为《锦县晓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克服困难搞好生产的经验》。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被人讥笑的穷合作社》。文章介绍了辽宁省锦县晓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社主任刘玉如的带领下，勤俭起家，战胜困难，搞好生产的事迹。

〔37〕 这篇文章原题为《彰武县第三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会计互助网》，是辽宁省彰武县第三农业技术推广站一九五五年八月写的，载辽宁《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参考资料》第九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

〔38〕 这是中共山东省曲阜县委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报告。文中讲的合作社，是山东省曲阜县第三区陈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

〔39〕 这篇文章原题为《荣成县楼下村黎明农业生产合作社制订的三年生产规划》，作者是王厚礼、王可祥，载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山东《大众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做了三年生产规划的合作社》。文章介绍了山东省荣成县青山区蒲头乡楼下村黎明农业生产合作社制定的生

产规划，即在三年内，把现有土地改变成连作间作田一千一百亩，水田三百五十亩，并逐步提高各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并规定了保证规划实现的具体措施。

〔40〕 这篇文章原题为《青年团高家柳沟村支部组织青年学习记工的经验》，载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山东《互助合作通讯》第六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

〔41〕 这是中共山东省莒南县委关于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动社员投资的情况报告，载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山东《互助合作通讯》第十二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拟题为《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

〔42〕 这篇文章原题为《桐城县石河乡小汪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年翻身记》，作者是张世荣，载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六十八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翻身合作社一年翻身记》。

〔43〕 这篇文章原题为《陈学孟是怎样帮助群众办社的》，作者是肖克非，载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六十八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文章介绍了安徽省凤阳县武店镇农民、中共党员陈学孟带头办起本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积极帮助其他群众办社的事迹。

〔44〕 这篇文章原题为《葛世玉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通过生产自救获得巩固与扩大的》，载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四十一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只有合作

化才能抵抗天灾》。文章介绍说，安徽省繁昌县峨桥区浮湖乡葛世玉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四年六月遭受水灾后，将社员们组织起来，大力开荒增产粮食，通过生产自救渡过了灾荒，并巩固和扩大了合作社。在抵抗灾荒中要求入社的中农柯先富说："我们这些中农，就像江里的小船一样，风平浪静的时候，可以平平而过，遇见狂风暴雨，就寸步难行。若不赶快爬上大船（指合作社），就有翻船的危险。"失去母亲的十六岁贫农柯百法在入社后说："我从小靠娘，现在靠社，合作社就是我娘。"

〔45〕　这篇文章原题为《凤阳城西乡支部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培养干部的方法》，是中共安徽省凤阳县委农村工作部写的，载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一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五十八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值得推荐的模范支部》。文章介绍了安徽省凤阳县城西乡党支部培养合作社骨干的经验。他们采取"突破薄弱区，就地培养干部"和"老社带新社，强的带弱的"的方法，培养了大批农业合作社骨干，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46〕　这是中共安徽省滁县地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滁县白庙乡、全椒县三圣乡错误地解散十八个"自发社"的通报，载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一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五十八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拟题为《错误地解散十八个"自发社"的教训》。

〔47〕　这篇文章原题为《肥东芦陈乡青春、陈祠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多余劳动力的解决办法》，是中共肥东县石塘区委写的，载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一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五十八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

〔48〕　这篇文章原题为《昆山县西宿乡的党支部是怎样领导全乡走向合作化的》，是中共昆山县委生产合作部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四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

〔49〕　这是中共江苏省淮阴地委生产合作部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关于沭阳县马厂区沂涛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的调查报告。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拟题为《沂涛乡的全面规划》。

〔50〕　这篇文章原题为《新海连市朝阳乡朝阳大社的发展和巩固》，是中共江苏省新海连市委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大社的优越性》。文章介绍了江苏省新海连市（由新安镇、海州、连云港三个城市合并而成）朝阳乡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从小社发展到大社的经验。

〔51〕　这篇文章原题为《江宁县中前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反革命破坏活动进行斗争》，是中共江宁县委生产合作部写的，载一九五五年九月十日《新华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清除坏人，巩固合作社》。文章介绍了江苏省江宁县中前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坏分子破坏，使社员的生产情绪消沉，后来经过整顿才得以巩固的情况。

〔52〕　这篇文章原题为《前进第一农业社怎样实行集体包耕个人计件制》，载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江苏《农村工作》增刊。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定额包工和评工计分》。文章介绍了江苏省涟水县前进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头在劳动组织上存在干活一窝蜂现象，后来采取临时划片分组，实行包工制，改善评工计分办法，使生产管理逐步地走上正轨

的经验。

〔53〕 这篇文章原题为《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长》，是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文章介绍了浙江省慈溪县岐山乡五洞闸村创办全省第一个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带动全乡实现合作化的经验。

〔54〕 这篇文章原题为《邓家乡怎样运用中心社带动互助组和个体农民开展生产运动的》，载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七日编印的《浙江农村工作通讯》第五十一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合作化模范邓家乡》。文章介绍的经验主要是：一、运用中心社，带动互助组和单干农民进行生产，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二、组织农民实地参观，介绍中心社的生产合作经验。三、以中心社为核心，发动生产竞赛，进一步开展农林业生产运动。

〔55〕 这篇文章原题为《余姚县龙南乡根据群众路线办社的经验》，是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合作网的制度应当在全国推广》。文章介绍了浙江省余姚县龙南乡在农业合作化工作中建立互助合作网的经验。他们按照农业合作社的分布情况，将全乡划分为三片，组成三个互助合作网，每网挑选一个基础好、骨干强、地点适中的社作为“中心社”，由党支部的三个委员分工负责，推动了全乡农业生产的发展。

〔56〕 这篇文章原题为《千鹤农业社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复收复种中劳力不足的困难》，载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编印的《浙江农村工作通讯》第六十期。收入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文章介绍了浙江省建德县莓口乡千鹤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动妇女参加劳动的经验，主要做法是：㈠帮助妇女合理地安排时间和分工。㈡执行男女同工同酬，合理评工记分。㈢解决妇女参加生产中的特殊困难，有重点地试办托儿组。

〔57〕　这篇文章原题为《平湖县新仓乡供销合作社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常年互助组签订结合合同的初步经验》，载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三月四日编印的《浙江农村工作通讯》第四十九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订立结合合同》。

〔58〕　这篇文章原题为《凤鸣乡处理山林入社政策推动春耕生产的总结》，载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日编印的《浙江农村工作通讯》第五十九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有成片林木地区的合作社必须迅速处理山林入社的问题》。文中介绍的浙江省龙泉县凤鸣乡关于处理山林入社问题的做法是：一、统一干部认识，着重讲明林木是农民的劳动成果和山林入社自愿的原则，经过征求意见，修正山林折价的办法，确定：⑴合理提高林主的分益比例。⑵纠正柴爿无代价入社的偏差，确定给林主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报酬。⑶根据林木生产的不同情况、土质好坏、交通难易等条件，合理确定分益比例。二、通过乡互助合作代表会议，进一步宣传政策，介绍典型经验，有重点地处理山林入社问题。

〔59〕　这篇文章原题为《上华社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发动社员增养毛猪》，载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编印的《浙江农村工作通讯》第五十五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

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文中介绍的浙江省上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养毛猪的经验是：(一) 对社员加强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性的教育，鼓励社员私养毛猪。(二) 用公有分养的办法，帮助有困难的社员增养毛猪。(三) 发挥集体优势，社里养猪四十只。(四) 引导社员开辟新的饲料来源。

〔60〕 这篇文章原题为《“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是福建省福安县楼下乡工作组写的，载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六日《福建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题目改为《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文章介绍了福建省福安县楼下乡一个以贫农为领导骨干的合作社和一个以中农为领导骨干的合作社的对比发展变化，“贫农社”在社长李佬同的带领下，克服农具少、底子薄的困难，团结互助，使生产发展。而另一个“中农社”，由于团结互助搞不好，各顾各的，分配也不合理，并发生排斥贫农的现象，社里的生产就搞不好。

〔61〕 这篇文章原题为《先锋农业社整顿巩固的初步经验》，是中共福建省龙溪地委生产合作部写的，载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福建《农村工作通讯》第十三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整社的好经验》。文章介绍了福建省华安县龙峰乡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针对社里存在的问题进行整顿的经验：(一) 依靠支部，训练骨干，端正态度，明确做法。(二) 从检查评比生产、组织劳动竞赛入手，首先把生产推动起来。(三) 开展四对比、五算帐活动，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四) 进行社章教育，贯彻执行互利原则，检查和处理存在的问题。四对比是：一比社、组、户哪个好；二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个好；三比剥削制度和没有剥削制度哪个好；四比个人发展和共同富裕哪个好。五算帐是：一算灾害帐；二算搞副业增加收入帐；三算发挥劳动积极性增加工分

帐；四算贫农中农合作互利增产帐；五算克服生产、生活困难帐。

〔62〕 这篇文章原题为《新泾区虹南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是李贻钧一九五五年十月七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文章介绍了上海市郊新泾区虹南乡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曲折经历。这个乡在一九五四年秋天前就建立了八个农业合作社，另有四十五个互助组组成的八个联组，秋收后，他们计划再发展七个合作社。但由于上级党委受收缩合作社的方针的影响，对原计划要办的合作社拖延不批，一些富裕中农乘机闹退社，乡党支部面对这种情况犹豫动摇，也不敢支持群众办社。一九五五年九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大办合作社的指示传达后，领导上犹豫退缩的错误做法被纠正了，群众奔走相告，并自动组织起来，积极进行办社的准备，掀起了大办农业合作社的热潮。毛泽东在按语中讲到的三次会议，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五月六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中共中央一九五五年七月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

〔63〕 这篇文章是季音、陶贵章、杨国森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写的。文中介绍了上海市郊大场区塘南乡白遗桥蔬菜生产合作社由初级社转到高级社、由小社合并为大社的经验，主要是：1、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从党内到党外，由骨干到群众，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2、妥善处理转社、并社的具体问题。3、组织统一生产。

〔64〕 这篇文章原题为《一个工人家属多的郊区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吴强、翟贵肇一九五五年十月七日写的。收入《中国农

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文章介绍了靠近上海钢铁厂、国棉八厂的上海市吴淞区泰兴乡发动工人家属，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

〔65〕 这篇文章是戴星明、王树人、董俊明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写的，文中介绍了上海市西郊诸翟乡解决剩余劳动力的经验。这个乡根据耕地少、劳动力有剩余的情况，除组织社员把大量劳动力用到土地加工、积肥等农业劳动上外，还注意发展多种经营，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66〕 这篇文章原题为《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降低生产成本的经验》，作者是董铨、邵健、桂世杭。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

〔67〕 这篇文章原题为《安阳县南崔庄的党支部依靠贫农带头办社，实现了全村合作化》，是中共河南省安阳地委合作运动办公室写的，载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日《河南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

〔68〕 这篇文章原题为《郏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是中共河南省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写的，载中共河南省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九月四日编印的《互助合作》第十五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

〔69〕 这是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荥阳县在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处理社员问题上发生偏差的通报，载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一日《河南通讯》第二百九十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拟题为《荥阳县胡乱地清洗社员犯了错

误》。通报中说，河南省荥阳县在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有不少合作社在处理社员问题上发生了偏差，清洗了一些不应当清洗的社员。这种做法不仅使敌人有机可乘，而且影响了农业合作化的顺利发展。在处理社员问题上，必须慎重。对于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要求入社的，应当允许，已经入社的，不应当命令他们出社，他们的土地可采用租佃形式，由社内耕种；对于某些有污点的农民，应当加强教育改造，也不应当命令他们出社；对于有历史问题的农民，凡是已经交代的，只要劳动、守法，积极生产，取得农民同意，都不应当清洗出社，但是不能让他们参加领导工作和要害部门的工作，而且在生产中应当对他们加以注意和考验，凡没有交代的，应当由政府命令他们交代。

〔70〕　这篇文章，是中共河南省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写的，载一九五五年十月三十日《河南日报》。文章介绍了河南省许昌地区在一九五四年冬季和一九五五年春季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把有经验的社干部和积极分子组成办社辅导团，帮助合作化基础薄弱的地区进行巩固社和建社工作的经验。

〔71〕　这篇文章原题为《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耕牛喂养使用的制度和经验》，是中共湖北省襄阳地委书记赵修写的，载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湖北农村》第一百零六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喂养和使用耕牛的经验》。

〔72〕　这篇文章原题为《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社的严重问题及整顿巩固的做法与经验》，作者是周敬文，载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编印的《互助合作》第九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

的》。文章介绍说，武塘农业合作社在建社之初，由于在社务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中没有树立起贫农的领导优势，致使生产搞得不好，产生了中农占便宜、贫农吃亏的严重问题。乡党委发觉后，对这个社进行了整顿，通过“两查”（查生产计划、查禾苗好坏）、“三算”（算季节、算劳动力、算肥料），搞好生产补救，并深入进行阶级政策教育，大力培养贫农骨干，形成了以贫农为优势的领导核心，加强了社员间的团结，巩固了合作社的组织。

〔73〕 这篇文章原题为《中共湘潭县清风乡支部领导农业社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的情况与做法》，作者是顾建鹏，载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湖南农村》第一百一十三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

〔74〕 这篇文章原题为《如何解决农业社剩余劳力出路问题》，作者是任培吾，载一九五五年四月三日《湖南农村》第一百一十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湘阴县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文章中介绍的湖南省湘阴县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的经验是：一、在水田、旱地精耕细作，增加劳力投入；二、扩大复种面积；三、加强社内的基本建设，适当地安置劳动力，为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四、合理安排没有入社的茶园的生产，不使与社内生产冲突；五、开展多种经营。

〔75〕 这篇文章原题为《萍乡县年丰乡易瑞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扩大》，是中共江西省委第二书记刘俊秀写的，载中共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编印的《农村建设》第九十六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模范合作社》。文章介绍了江西省萍乡县年丰乡胡家坊村易瑞生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社两年取得的成绩，并分析了当前社内还存在

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76〕　这篇文章原题为《南溪乡罗巷农业社议订社章前后》，是中共江西省南昌县第七区委工作组写的，载中共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二月二日编印的《农村建设》特刊第十四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合作社议订社章》。文章介绍了江西省南昌县南溪乡罗巷农业生产合作社议订社章的情况。这个社在没有订社章时，做事没把握，无章可循，感到办社处处碰钉子，于是社务委员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决定从检查合作社生产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入手，发动社员把社章订好，他们通过思想教育，使社员树立了当家作主的观念、团结生产的观念和敌情观念，经过十天的酝酿和讨论，这个社订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社章。

〔77〕　这是广东省中山县群众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梁祥胜的谈话记录整理稿，原题为《我当大社主任四个月的几点体会》，载一九五五年五月编印的《中山县巩固农业社经验》。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我当大社主任的经验》。

〔78〕　这篇文章原载一九五五年《华南青年》第十六期，是青年团广东省粤中区工委工作组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写的。

〔79〕　这是中共广东省琼山县委一九五五年十月十日给广东省委的报告。

〔80〕　这篇文章原载一九五五年五月八日《华南日报》，作者是王修平。文中介绍了广东省阳江县边海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合作社的带头作用，在和自然灾害作斗争中有计划地发展农业和副业生产的情况。

〔81〕　这篇文章是中共台山县委合作部写的，原载中共广东省

粤西区委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九日编印的《粤西通讯》第九十期。

〔82〕　这篇文章原题为《广宁县江[土布]乡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了多种经济》，是中共广东省广宁县委江[土布]乡工作组写的，载中共广东省粤中区委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八日编印的《粤中通讯》第二百五十四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广宁县江[土布]乡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了多种经济，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文中介绍了广东省广宁县江[土布]乡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多种经济的经验。主要是：㈠向社员分析本社的情况和特点，引起他们对发展多种经济的重视，明确方针政策，消除思想障碍。㈡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发挥群众的智慧，并制订多种经营的方案。㈢加强具体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行动起来。㈣正确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合理定出各种工种的底分，保证农业和副业合理发展。

〔83〕　这篇文章原题为《莫寿全农业社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的经验》，作者是杨志庆，载一九五五年二月七日《广西农村》第一百三十四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岑溪县莫寿全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合理化建议的经验》。文章介绍了广西省岑溪县马路乡莫寿全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一九五四年夏收夏种后发动社员提合理化建议的经验，具体做法是：由社员民主选举代表，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在集中代表收集的各方面的建议后，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作出决议，再召开社员大会审查通过代表大会的决议，付诸实施。

〔84〕　这篇文章是新华社记者李朝写的，载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四川日报》。文章介绍了四川省在互助联组的基础上发展农业合作社的经验。

〔85〕　这篇文章是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简阳工作组一九

五五年二月帮助整理的，文中介绍的四川省简阳县解放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的生产计划包括：增产计划，增产措施，总收入、总投资和分配概算等几个方面。在分配概算一项中，文章说：该社全年农业和副业总收入为十二万九千四百元，留公积金百分之九，为一万一千六百四十六元，毛泽东在这里加括号写了一条按语："此项似乎留多了一点，暂时以下超过百分之四为宜。"

〔86〕 这是中共四川省委派往郫县犀浦乡和古城乡的工作组一九五五年四月十日关于在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中贯彻自愿互利政策问题给郫县县委、温江地委和四川省委的报告。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拟题为《郫县犀浦和古城两个乡是怎样处理各项具体问题的》。报告说，这两个乡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分三段进行，第一段为宣传动员，摸清问题；第二段为贯彻执行自愿互利政策，处理各项具体问题；第三段为整理组织和建立经营管理制度。报告重点介绍了该乡在贯彻执行自愿互利政策，妥善处理毛猪、耕牛、农具、自留地、资金、副业生产等具体问题的情况。

〔87〕 这篇文章是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射洪乡工作组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四日写的。文中介绍了四川省简阳县射洪乡在省委、县委工作组帮助下整顿财务管理工作的情况。这个乡在农业合作社工作中由于只重视生产，忽视了对财务管理工作的领导，致使财务管理没有计划，农业和副业投资超过总收入，贷款还不清，财会人员职责不明，帐目混乱等问题。根据这些情况，他们决定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帮助合作社干部从思想上明确财务工作"为生产服务、自力更生、量入为出、勤俭办社"的方针，深入地检查财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第二、制订为生产服务的财务计划，实行经济核算制。第三、建立严格的财务会计制度，加强财务工作的民

主管理。第四、成立会计辅导站，加强对财务会计工作的具体指导。第五、正确处理会计科目。

〔88〕 这篇文章原载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宜宾《农民报》，作者是陈静。

〔89〕 这篇文章原载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五日《贵州工作》第八十二期，作者是柳耀华。

〔90〕 这篇文章原题为《晨光等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进行政治工作的》，是中共贵州省绥阳县委宣传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日写的，载一九五五年一月八日《贵州工作》第六十一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合作社的政治工作》。文章介绍的贵州省绥阳县广大乡晨光、农园、杨家寨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是：一、教育干部认清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二、依靠党支部进行政治工作。三、及时地了解社员的思想情况，通过具体事例，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进行教育。四、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必须生动而新鲜。

〔91〕 这篇文章原题为《对都匀县五区敌人破坏农业社情况的认识和加强农业社保卫工作的做法》，是根据贵州省都匀县公安局一九五五年六月六日来稿整理的，载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贵州工作》第八十五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必须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坚决的斗争》。

〔92〕 这篇文章原题为《贵定县盘江乡平堡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生产建设的三年规划》，是中共贵州省贵定县委盘江工作组一九五五年十月七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合作社的三年生产规划》。

〔93〕 这篇文章原载贵州省民主妇女联合会一九五五年十月编印的《通报》第九十九期。文章介绍了贵州省息烽县养龙司乡堡

子农业生产合作社解决男女同工同酬的做法：㈠召开党、团小组会，提高党、团员对男女同工同酬的认识。㈡向社员进行教育，扭转一些社员和干部的重男轻女思想。㈢向女社员普遍进行一次男女平等、劳动光荣的教育，提高她们的社会主义觉悟。

〔94〕 这篇文章原题为《镇宁县马鞍山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推行季节包工的》，是中共贵州省镇宁县委工作组一九五五年三月十日写的，载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贵州工作》第七十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季节包工》。

〔95〕 这篇文章原题为《西畴县戈木乡东升农业社是如何由混乱走向巩固提高的》，是中共云南省西畴县委写的，载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云南《农村工作通报》第一百一十一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

〔96〕 这篇文章原题为《马龙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副业生产的情况》，作者是张兴华，载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一日云南《农村工作通报》第一百零一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副业问题》。

〔97〕 这篇文章原题为《富民县在互助合作中贯彻耕牛政策的情况与问题》，是中共云南省富民县委生产合作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日写的，载一九五五年云南《农村工作通报》第一百一十八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富民县的耕牛问题》。

〔98〕 这篇文章原题为《王莽村七一农业生产合作联社的领导经验》，是中共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第二处一九五五年八月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长安

县王莽村四个合作社组织联社的经验》。

〔99〕 这篇文章原题为《一个群众自办的农业社》，作者是陈泰志，载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陕西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

〔100〕 这篇文章原题为《中共西乡县杨河坝乡支部领导互助合作的经验》，载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陕西工作》第十八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西乡县杨河坝乡党支部正确地领导了那里的互助合作》。

〔101〕 这是中共甘肃省皋兰县委关于大力全面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的计划，载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甘肃《工作资料》第一百四十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拟题为《皋兰县的三年发展计划》。

〔102〕 这篇文章是车宏彰、黄显德一九五五年八月写的，文中介绍了甘肃省酒泉县银达乡试办民校的经验，主要有：一、要注意吸收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学习，因为他们是农村的骨干，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直接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二、必须依据农事季节安排学习时间，农闲的时候多学，农忙的时候少学或者不学，注意解决工作和学习的矛盾。三、教学内容必须结合实用，最好是教农民常用常见的，使他们既容易懂，又容易记忆和应用。四、政治教员一般应当由党支部书记担任。

〔103〕 这篇文章是中共青海省民和县第五区区委书记胡俊德写的，载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日青海《农村工作参考资料》第十期。

〔104〕 这篇文章原题为《循化县下滩农业生产合作社怎样贯彻执行阶级政策》，是中共青海省委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

改为《改变贫农和中农的不正常关系，有步骤地做到使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上占优势》。文章介绍了青海省循化县下滩农业生产合作社整顿的情况，这个社在整顿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依靠中农、排斥贫农的现象，致使社里贫下中农不占优势，产生了许多问题。他们在下乡工作组的帮助下，进行了整顿，首先明确只有依靠贫农才能办好社；同时教育党员、干部认识到中农和贫农“合则两利，离则两伤”的道理，然后让党员中的贫农去串连教育其他贫农，让党员中的中农去影响一般的社员，使他们认识党的阶级政策，消除顾虑，共同把合作社办好。

〔105〕　这篇文章原载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六日新疆《天南日报》，作者是页汗，文中介绍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色满区委调动乡、村干部的积极性，大力创办农业合作社的事迹。

关于元旦社论和准备召开部分省委书记会议等问题的信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周、刘、陈、彭[1]各同志：

社论[2]写得很好，陈伯达[3]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

我已约陈毅、柯庆施[4]二同志来此，先行商量一下，准备一月五日开会的事情。陈云同志病情如何？不知一月四日能来此否？如未愈，则不要来。谭震林、廖鲁言[5]请通知他们于三日或者四日来此。

请周要尚昆[6]用电话通知辽宁、山西、甘肃、陕西、四川，华东五省，中南六省的省委书记于一月四日到达杭州，准备于五日开始开会两天到三天，谈十七条[7]的增加修改问题。除皖、苏、赣、闽可坐火车或汽车来此外，其余凡可用飞机的，要替他们准备飞机。

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一篇序言[8]，请审阅，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请告田家英[9]同志。

敬礼

毛　泽　东

十二月卅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⑴　周，指周恩来。刘，指刘少奇。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⑵　指《人民日报》准备在一九五六年元旦发表的《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

⑶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⑷　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⑸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⑹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⑺　参见本册第478—481页。

⑻　指毛泽东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见本册第484—487页。

⑼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